香港與國家風雨同舟的抗戰史

孫揚　鄧奕　著

顧問
劉智鵬　劉蜀永

中華書局



香港與國家風雨同舟的抗戰史

孫揚　鄧奕　著



顧問
劉智鵬　劉蜀永

中華書局

目錄

序言 4

前言 6

第一章 侵略 9

國家篇 10

- 日本選擇侵略擴張 10
- 從柳條湖到盧溝橋 17
- 通往珍珠港之路 23

香港篇 28

- 日本侵佔香港的準備 28
- 英國在香港的應戰準備 31
- 十八天香港戰役 35

第二章 暴行 39

國家篇 40

- 屠殺與性暴行 40
- 細菌戰和化學戰 48
- 大規模劫掠 53
- 日軍在根據地的暴行 56

香港篇 60

- 虐殺戰俘 60
- 殘殺平民 64
- 經濟掠奪 67

第三章 抵抗 71

國家篇 72

- 局部抗戰時期 72
- 戰略防禦階段 80
- 戰略相持階段 89
- 中共敵後抗戰 96

香港篇 103

- 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 103
- 港九大隊的建立與發展 110
- 港九大隊的武裝鬥爭 113

第四章 外交 119

國家篇 120

- 苦撐待變的中國外交 120
- 太平洋戰爭期間中國外交的成就 127
- 戰爭後期中國的外交困境 134

香港篇 138

- 中英在新約談判中關於香港問題的交涉 138
- 新約談判後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博弈 142
- 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在香港的實踐 146

第五章 勝利 153

國家篇 154

- 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戰略反攻 154
- 日本投降與各戰區受降 161
- 軍事法庭審判 168

香港篇 173

- 香港受降之爭 173
- 英國重佔香港 176
- 抗戰在香港的迴響 182

結語 188

主要參考論著 190

鳴謝 196

序言

在舉國上下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週年之際，南京大學孫揚教授及其研究生鄧奕合著的新書《香港與國家：風雨同舟的抗戰史》出版，滿足了讀者了解國家抗戰史和香港抗戰史的需求，可謂正逢其時，值得祝賀。

這是一本普及讀物，僅有 9 萬多字，內容卻十分豐富和系統。書中用侵略、暴行、抵抗、外交、勝利等五個篇章串聯起香港和國家共同的抗戰史。關於國家抗戰史，從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講到七七事變；講到日軍戰爭罪行，特別是南京大屠殺、細菌戰、化學戰等；講到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十九路軍抗戰、長城抗戰、平型關大戰、百團大戰、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遠征軍緬甸作戰等。關於香港抗戰史，涉及香港成為援華物資轉運中心；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包括保衛中國同盟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在港活動；日軍虐待戰俘、殘殺平民、強迫歸鄉、經濟掠奪；十八天戰役及英軍投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的軍事鬥爭，營救盟軍戰俘、飛行員，以及與盟軍的軍事情報合作等。

香港史是中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香港從未缺席，抗日戰爭也是如此。本書結構別具匠心，每一部分都分為國家篇和香港篇兩大部分。這有助於讀者了解香港抗戰重大事件的國家背景，更深刻地了解香港同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連的緊密聯繫。

《香港與國家：風雨同舟的抗戰史》是了解香港抗戰史和國家抗戰史的入門參考書，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我們願向關心香港和國家歷史與發展的朋友推薦此書。

劉智鵬　劉蜀永

2025 年 8 月 15 日

於香港地方志中心

前言

2025 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週年。80 年前，在那段崢嶸歲月裏，面對暴虐強敵，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華兒女，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捨身為國，浩氣長存。「中國不會亡！」成為那個時代最強音。中國人民與愛好和平、堅持正義的世界各國人民並肩浴血奮戰，終於迎來勝利。

80 年過去了，如先烈所願，中華錦繡，國泰民安。不過，世界並不太平，不少國家和地區的人們在戰火與恐懼中掙扎。居安思危，回顧那場讓數千萬人失去生命的戰爭，是為了守護來之不易的和平。以史為鑒，人類需要從過去汲取智慧和勇氣，直面當下的困境，擘劃未來的方向。

有史以來，香港同胞始終同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連。抗戰中，祖國猶如驚濤駭浪中的航船，隨時可能傾覆，縱使船上有暫棲角落，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船上的人們惟有同仇敵愾，搏擊風浪，方能駛出危亡險境。在那個波瀾壯闊的年代，從太行山上到太平山下，從大江南北到維港兩岸，民族抗戰的史詩中寫下多少中華英烈、香江兒女的英雄傳奇。

歷史如炬，照亮未來。書寫一部香港與國家風雨同舟的抗戰史，是我們長久以來的心願，為香港青少年提供國家歷史教育素材，是歷史研究者的責任。我們嘗試用侵略、暴行、抵抗、外交、勝利五個篇章串聯起香港和國家共同經歷的烽火歲月，直書侵略者的罪惡和平民的苦難，記下抵抗者的壯烈和盟邦的情義。

希望本書實事求是、通俗易懂，普通讀者可以從中汲取新知，歷史愛好者也能讀出新意。作為普及讀物，本書內容基於海內外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成果，藉此，我們對辛勤耕耘抗戰史、香港史的研究者表達誠摯的感謝和敬意。本書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香港抗戰研究」（20YJC770029）的資助。我們所在的南京大學向來重視並積極推動抗戰史、香港史研究，給予了我們各方面支持。我們在寫作過程中得到劉蜀永教授、劉智鵬教授、陳謙平教授等前輩學者的悉心幫助，感謝劉智鵬教授和劉蜀永教授審閱書稿並提出意見和建議。感謝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周建華總經理、總編輯的大力支持。

作者　謹識

2025 年 7 月 1 日

於南京大學

第一章

侵略

國家篇

中國與日本同處東亞，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正式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 1 世紀。在千餘年的歷史中，友好往來是中日關係的主流。由於中國歷史更悠久，國力也更強盛，日本深受中國影響。特別是在唐代，日本向中國大規模派遣使團，史稱「遣唐使」，他們在中國學習文化和制度，推動日本社會變革。中日民間貿易和交流也十分頻繁，兩國人民共同創造了東亞世界豐富燦爛的物質和文化。然而，從 19 世紀後期開始，日本逐步走上侵略擴張之路，在半個世紀裏對中國發動兩次大規模侵略戰爭，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

1 日本選擇侵略擴張

18 世紀末期，有兩件大事幾乎同時在歐洲發生，這便是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英國工業革命彰顯技術的力量，法國大革命展現人民的意志，「雙元革命」使歐洲和北美的發展大大超越了世界其他地區，開啟了人類歷史的現代化進程。現代化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劇變，卻伴隨着西方殖民擴張傳播到世界各地。時間進入 19 世紀中葉，此時的中日兩國已大大落後於西方，幾乎在同時，兩國都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列強船堅炮利的衝擊下，中日兩國被迫打開國門，不約而同向西方學習，中國啟動「洋務運動」，日本開始「明治維新」。

洋務運動開始於 19 世紀 60 年代，當時，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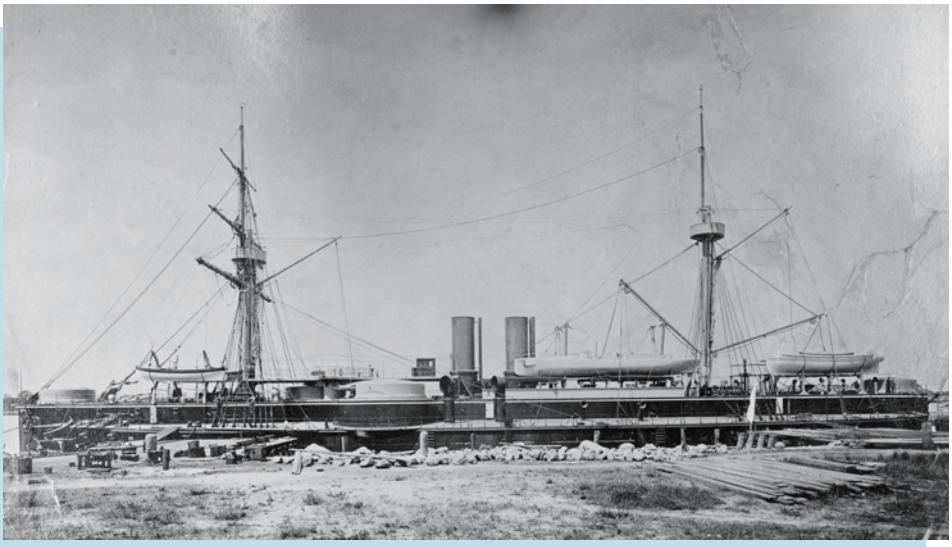
中敗於英法聯軍，且差一點被一場大規模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推翻，對於朝廷來說，可謂「內憂」和「外患」疊加，必須實行改革。推動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大多是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朝廷官員，諸如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他們體會到西方武器的威力，他們的戰功也為自己奠定了權力基礎。洋務運動旨在「師夷長技」，先後提出「自強」和「求富」的主張。自強是指建立軍事工業企業，製造新式武器裝備；求富是指建立民用商業企業，發展實業積累資金。此外，中國積極培養現代化人才，在 19 世紀 70 年代向美國派出四批留美幼童，學習軍事、冶礦、交通等知識。第三批留美幼童中的周壽臣，出生於香港島黃竹坑新圍，他回國後參與修建鐵路，做過外交工作，擔任過唐山路礦學堂的校長，這所學校後來遷到四川，成為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學。到 19 世紀 80 年代，清政府通過向英、德等國購買和自造軍艦，建立起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七」的現代化海軍——北洋水師。

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幾乎同時開始，19 世紀 50 年代，日本處於幕府統治之下，德川將軍控制政權，天皇有名無實。在美國軍艦威脅下，日本被迫「開國」，與列強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不平等條約導致不平等貿易，加劇了日本社會經濟的動盪，幕府漸漸失去聲望。日本西南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等地的「志士」，不甘受列強欺壓，他們接受維新思想，和地方實力派藉擁護天皇的名義發起「倒幕運動」，得到明治天皇支持。1868 年幕府瓦解，新政府建立，開啟一系列現代化改革措施，史稱「明治維新」。中日兩國在改革中都以發展工業、富國強兵為目標，不同之處在於，日本還在制度、法律、教育、文化等層面大力學習西方，比中國改革更加深入和徹底。通過明治維新，日本迅速發展，整個社會呈現積極樂觀的面貌。

可以説，經過 20 年左右的改革，中日兩國的現代化道路都顯示出成功的可能性，但也都面臨着難題。在中國，朝廷的專制腐敗和政治體制的僵化並未得到改善，社會矛盾激烈。而日本是一個人口密集、資源匱乏的國家，現代化發展面臨很多困難。更重要的是，兩國仍然要面對西方列強企圖瓜分東亞的嚴峻局面。然而，很快日本因為朝鮮問題對中國發動戰爭。朝鮮長期作為中國的屬國，深受中國影響，同時保持着自身特色和一定獨立性，歷史上和日本既有密切交流也有激烈衝突。在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朝鮮無法維持之前奉行的閉關鎖國政策，1876 年日本強迫朝鮮簽訂不平等的《江華條約》，打開朝鮮的國門，此後朝鮮又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日本學者加藤陽子認為，中日之所以在朝鮮問題上發生衝突，還需要從中日互相競爭的視角去解讀。因為，到了 19 世紀 80 年代中期之後，日本感受到兩方面的壓力，一是日本看到中國在加強國力，產生了與中國進行現代化競賽的緊迫感；二是當時俄羅斯帝國正在向東方擴張，日本認為其國防安全受到極大威脅。此時，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脱亞入歐」，意思是日本要脱離亞洲的「守舊」而轉向西方的「文明」，主張追隨西方列強對待中國和朝鮮的手段去對待這兩個鄰國。日本認為，如果俄羅斯東擴控制朝鮮，就會掌握日本的生死命運；因此，日本應該控制朝鮮，而前提是要擊敗中國。

1894 年，日本的機會來了。為了鎮壓國內的農民起義，朝鮮請求中國出兵協助，中國出兵後，起義基本平定，但日本不請自來，也向朝鮮派出軍隊。中國建議中日雙方同時撤兵以恢復朝鮮局勢，遭到日本拒絕。日本攻入朝鮮王宮，扶植親日政權。中國匆忙應對，調派軍隊增援。7 月 25 日，日本不宣而戰，在朝鮮豐島海域襲擊中國軍艦，並擊沉清政府租用的英國商船「高陞號」，當時約 1,200 名清軍正搭乘該船增

援朝鮮，其中 800 餘人葬身大海。近代史上中日之間的第一次戰爭爆發了，因為 1894 年是甲午年，這場戰爭被稱為「甲午戰爭」，日本稱之為「日清戰爭」。戰爭在陸地和海洋上進行。在海上，9 月 17 日，北洋水師與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在黃海鴨綠江口附近海域遭遇，經過約 5 小時激戰，中國「經遠」、「致遠」、「超勇」、「揚威」和「廣甲」五艦沉沒，日本「松島」和「吉野」兩艦遭重創。在陸地，日軍擊潰在朝鮮的清軍後，攻佔中國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的要地。北洋水師困於威海衛基地，軍艦被迫自沉或被日本虜獲，最終全軍覆沒。1895 年 3 月，日軍攻陷澎湖，直逼台灣。清政府被迫與日本媾和，4 月 17 日，中日雙方在日本馬關（今下關）簽訂《馬關條約》，主要內容為：中國承認朝鮮「獨立自主」；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島及其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白銀 2 億兩；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等。



北洋水師旗艦「定遠號」鐵甲艦

日本的貪婪刺激了西方列強，俄國視中國東北為勢力範圍，糾集德國和法國反對日本佔領遼東半島。日本迫於壓力放棄遼東半島，向中國索要了 3,000 萬兩白銀「贖遼費」。日本國民對此相當失望，認為陣亡 14,000 人換來的成果卻被俄國破壞了，因而更加仇視俄國。通過甲午戰爭，日本從中國獲得相當於其年度財政總收入三倍的巨額賠款，這些款項的六成被用於以俄國為假想敵的軍備擴充和日本二戰前最大煉鋼廠——八幡製鐵所的建設。而且，日本割佔了中國大片領土，驅逐了中國在朝鮮的勢力，一舉實現「脱亞入歐」夙願，國際地位獲得顯著提升。日本國民情緒受到極大鼓舞，對中國產生輕蔑之感。

甲午戰爭之後，中俄兩國為對付日本一度接近，雙方於 1896 年簽訂密約，中國允許俄國在東北修建鐵路，不僅如此，雙方還於 1898 年簽訂《旅大租地條約》，中國將旅順和大連灣沿海以及陸地上的部分地區租給俄國 25 年作為軍港使用。這些事件都進一步刺激了日本。1900 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包括日本和俄國在內的八個國家出兵干預並佔領北京，清政府被迫與列強簽訂《辛丑條約》，賠款 4.5 億兩白銀。然而，事件平息一年後，本該撤軍的俄軍卻賴在中國東北不走。於是，日本和英國結成同盟企圖威懾俄國。中國也開始質疑俄國，轉而與日本接近，留日學生人數激增。為與俄國爭奪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日本以要求保證東北「門戶開放」為名，得到英美支持，於 1904 年 2 月向俄國發動戰爭。日俄戰爭持續約一年半，主戰場在中國遼東半島，雙方圍繞旅順要塞的攻防戰尤其慘烈，日本在付出巨大傷亡代價後於 1905 年 1 月攻佔旅順。同年 5 月，日本聯合艦隊在朝鮮半島和日本之間的對馬海峽一舉殲滅航行 7 個月、18,000 海里前來增援的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第二太平洋艦隊），至此，俄國無力再戰。9 月，日俄兩國在美國調停下結束戰爭，簽訂《樸茨茅斯和約》。日本通過和約獲得了俄國庫頁島南

部以及俄國在中國的旅大租借地，但沒有獲得賠款，日本國民對此極感失望。日本陣亡了 84,000 人，其中包括第 3 軍司令官乃木希典的兩個兒子，戰爭開支導致國家債台高築，人民負擔沉重，換來的卻不如日清戰爭。

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的心態就越來越畸形了。一方面，日本以一個東亞「蕞爾小國」的身份打敗歐洲列強之一的俄國，開國際先河，民族情緒高漲。另一方面，日本認為自己付出慘重代價阻止俄國佔有中國東北，是東亞、是黃種人的「守護者」，從而產生一種理所應當從中國獲得利益的心理。1910 年，日本正式吞併韓國（朝鮮於 1897 年改國號為「大韓帝國」，正式結束與中國的宗藩關係）。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加入英法等國組成的協約國陣營，並出兵中國山東半島，奪取德國佔據的膠澳租借地（今青島一帶）。此外，日本還獲得德國在太平洋中的一些島嶼。此時的中國剛剛經歷過辛亥革命，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中華民國，但國內政局持續動盪。趁着列強忙於歐洲戰事，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謀求在中國山東、東北、內蒙等地的特權，其中第五號更是險惡，要求中國大量聘用日本顧問、在軍警等方面依靠日本、將多地鐵路建設權交與日本等。袁世凱政府在日本軍事威脅下被迫妥協，答應了除第五號之外的其他內容，這一行徑被中國人民視為「國恥」。一戰中，日本損失極小，僅因為進攻青島死傷千餘人。但是，日本目睹歐洲各國慘狀，產生一種恐慌感，擔心在下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美國、俄國等國家的攻擊，因而更加將控制中國視為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

一戰結束後，1919 年各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會，中國因 1917 年對德宣戰，且派遣十數萬勞工赴歐洲援助英法，因此和日本一樣同為戰勝國。中國提出收回青島，但日本堅持青島是其從德國手中奪取的，應

先由自己統治，這樣，日本就具備了從海陸兩個方向威脅北京的條件。英美列強出賣中國利益，接受日本主張。儘管中國外交失敗，但中方代表顧維鈞在和會上慷慨陳詞，歷數日本謬誤。且日本統治下的韓國掀起反抗殖民統治的「三一運動」，日本在國際社會遭受指責，聲名狼藉，英美等國也開始警惕日本的野心。此時，日本國內出現法西斯主義思潮，1919 年北一輝出版《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對內主張集權，實行軍事統治；對外主張侵略擴張，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綱領，這股思潮與日本一支特殊的力量 —— 軍部 —— 緊密結合。軍部是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等中央軍事機構的總稱，也包括軍隊中的上層人物。軍部聲稱「統帥權獨立」，不僅將軍務攬於一身，也深度介入國家政治生活。因此，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被稱為「軍國主義」。

時間進入 20 世紀 20 年代，日本的「危機」感越來越嚴重。1921 年至 1922 年，美、英、日、法、意等國在華盛頓召開會議後簽署一系列條約，日本被迫將青島交還中國，接受限制海軍發展的協定，英日同盟也終止了。華盛頓會議雖然阻止日本獨霸中國，使中國回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不過日本仍佔有優勢。一戰後日本經濟從景氣轉為蕭條，1923 年發生「關東大地震」，東京和橫濱遭受毀滅性破壞，超過十萬人死亡，震後失業人口激增，1927 年金融危機爆發。20 年代後半期，世界和中國發生劇變，在新興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推動下，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建立第一次合作，發起「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1926 年夏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1927 年春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建立南京國民政府，一面殘酷鎮壓共產黨，一面繼續北伐試圖統一中國。1928 年 5 月，日本藉口保護僑民，出兵山東阻止南京國民政府北伐，不僅造成數千中國軍民傷亡，日軍還殘忍殺害中國外交官蔡公時等人。

總而言之，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後逐漸走上歧途，它以侵略擴張的方式為現代化發展攫取資源，將國內矛盾歸因於外部環境。它一方面狂妄自大，幻想與全世界最強大的美國一爭天下；一方面又恐懼焦慮，擔心遭到列強圍攻。因此，日本將征服中國作為應對未來「危機」的前提，不願看到中國統一和強大。

2 從柳條湖到盧溝橋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從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的，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日本關東軍南滿鐵路守備隊炸毀了瀋陽柳條湖附近鐵路路軌，並嫁禍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藉口，炮轟中國軍營，在短時間內迅速佔領了瀋陽、長春、吉林等重要城市，不到半年，東北三省全部淪陷。



九一八事變中，日軍進攻中國軍隊北大營

中國東北為甚麼會有日本軍隊？日本侵略中國為甚麼選擇在東北動手？前面說過，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獲得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其中包括旅順、大連一帶的「關東州」以及長春至大連的南滿鐵路（即「滿鐵」）。日本為保護其非法權益，成立「滿鐵守備隊」並駐留軍隊，在此基礎上建立「關東軍」。日本將中國東北和內蒙古東部視為勢力範圍，稱這一區域為「滿蒙」，在此大量移民、置產、投資，從而便於攫取中國資源。到 1926 年，日本在滿蒙地區的投資已超過 14 億日圓，其中大部分是滿鐵及其附屬企業，幾乎壟斷了當地煤礦、電力、水運、倉儲等行業。加藤陽子撰寫的《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披露，20 世紀 20 年代和 30 年代之交，「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這種蠻橫無理的主張，竟然成為日本社會「共識」，根據當時的調查，東京大學近九成學生贊同為了滿蒙問題可以使用武力。

同時，一批日本陸軍的少壯派軍官開始策劃將滿蒙從中國分離出去，這些人包括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陸軍省軍務局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陸軍省軍務局中國班長鈴木貞一等。石原等認為，未來世界大戰的「最終戰爭」將是日美兩國各自領導的陣營之決戰，為此日本要做好與美蘇等國長久作戰的準備，只要獲得中國的資源，就可以與蘇聯長期作戰，因此，要將滿蒙打造成為對蘇作戰的基地。當時，中國正在走向統一，東北的統治者是奉系軍閥張作霖，關東軍認為張作霖越來越「不聽話」，於是將他炸死。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於 1928 年底宣佈東北「易幟」，接受南京國民政府領導，此事增加了石原等人推動「滿蒙分離」的緊迫感。1929 年，以紐約股市暴跌為起點，大蕭條在全世界範圍蔓延，日本深受影響，民眾收入大跌，引發強烈不滿。軍部和政客趁機煽動民眾情緒，將國內矛盾引向滿蒙問題，醞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就在這種形勢下爆發了。

面對日本的侵略，東北領導人張學良按照之前蔣介石關於避免中日衝突的指示，未採取抵抗，致使東北三省很快淪陷。此時，蔣介石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正調集大軍「圍剿」中國共產黨在南方的軍隊和革命根據地。同時，廣東的國民黨實力派另立政府與蔣介石對抗。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寄希望於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國際聯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的國際組織，以維護世界和平為任務，成員包括中國、日本、英國、法國等國家。國聯經過調查，雖然認定日本為侵略方，提出的解決方案卻極為軟弱，僅要求「東北非軍事化」，英國還聲稱「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應被承認」。這種綏靖態度不僅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反而助長了其囂張氣焰。日本內閣對關東軍的侵略行為默認甚至縱容，這就更加鼓勵少壯派軍官「暴走」。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侵略野心並未得到滿足。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海軍陸戰隊突然進攻上海閘北，「一・二八事變」爆發。這場突襲看似偶然，實則暴露了日本軍政體系內部的深層矛盾。當時，關東軍在東北的侵略行動取得了「成功」，妄圖獨佔侵華主導權。而日本海軍則試圖在長江流域開闢新戰場，擴大自身勢力範圍。於是，海軍陸戰隊悍然發動了對上海的進攻，中國軍隊奮起抵抗。最終在英美等國的調停下，中日雙方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雖然該協定是一個屈辱的條約，中國正規軍被迫撤離上海市區，但「一・二八事變」讓日本認識到中國人民的抵抗意志，也讓國際社會看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一・二八事變」後，日本在東北的侵略行動進一步加劇。1932 年 3 月，日本扶持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偽滿洲國名義上是「獨立國家」，實際上完全受日本控制，溥儀不過是日本手中的傀儡。日本通過偽滿洲國，對東北人民實施殘酷的殖民統治並攫取大量資源。偽滿洲國建立後，日本並不滿足於佔領東北，開始將侵略



「一．二八事變」中的日本海軍陸戰隊

矛頭指向華北。1933 年 1 月，日軍攻佔山海關。山海關是華北的咽喉要地，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日軍佔領山海關後又進佔熱河，並繼續向長城沿線進犯。儘管中國軍隊在長城各口展開了激烈的抵抗，但最終未能阻止日軍的進攻。日軍侵略華北引起美國、蘇聯和國際聯盟強烈反應，日本不惜與國際社會為敵，於 1933 年 3 月宣佈退出國際聯盟。1933 年 5 月，中日雙方簽訂了《塘沽協定》。該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台等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得越線前進，即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和熱河的佔領，為日本進一步蠶食華北、吞併中國敞開了大門。



中日代表在塘沽談判

《塘沽協定》簽訂後，日本加緊了對華北的經濟侵略和政治滲透，在華北地區扶持親日勢力，策劃「華北自治運動」，妄圖將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從中國分裂出去，建立類似偽滿洲國的傀儡政權。1935 年，日本製造了一系列旨在分裂華北的事件，史稱「華北事變」。這一年，日本藉口中國破壞《塘沽協定》，向國民政府提出無理要求，並從東北調集大批軍隊入關，進行軍事威脅。在壓力下，國民政府先後與日本達成《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何梅協定》規定取消河北省內的國民黨黨部；撤退駐河北的東北軍、中央軍等部隊；撤換河北省主席及平津兩市市長等。《秦土協定》則使察哈爾省的主權大部分喪失。日本還在華北地區扶持漢奸殷汝耕，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宣佈冀東 22 縣實行「自治」。這一傀儡政權完全受日本控制，是日本分裂華北的重要一步。在日本的步步緊逼下，國民政府也逐

漸認識到日本的侵略野心是無止境的，開始調整內外政策，加強軍事準備。

日本原打算繼續以蠶食的方式逐步侵佔中國，然而，由於二二六兵變爆發以及中國對日政策逐漸強硬，日本改變了侵略步驟。1936 年 2 月 26 日，一羣激進的日本陸軍「皇道派」青年軍官發動了一場未遂政變。這些軍官認為文官政府腐敗軟弱，主張推翻現有體制來「拯救國家」。叛軍在凌晨突襲東京多處高官宅邸，殺死內大臣、大藏大臣等多名高官並佔領政府核心區，要求「昭和維新」，讓天皇掌管實權。但天皇認定他們是「叛亂」，下令鎮壓。4 天後叛軍投降，17 名主謀被祕密槍決。兵變後，主張軍國主義的陸軍「統制派」徹底掌控軍部，內閣淪為軍部附庸，外交決策被軍人主導，對華強硬路線再無制衡。兵變暴露日本社會矛盾，統制派為轉移壓力，將加緊侵華作為解決國內危機的出口。1936 年《國策基準》明確以對抗蘇聯和美國為目標，更需要將中國變為其侵略戰爭的基地，華北自治運動全面升級。同年 12 月，中國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日本意識到，中國已經團結起來，無法分而治之，因此準備全面侵略中國。

1937 年 7 月 7 日夜，日本中國駐屯軍在北平郊外盧溝橋附近地區進行軍事演習，聲稱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要求進入中國軍隊駐守的宛平縣城搜查。被中方拒絕後，日軍以「自衞」名義炮擊宛平，與中國守軍交火。儘管志村是因如廁離隊，且在 20 分鐘後即歸，日軍仍藉機擴大衝突，稱中方「挑釁」，要求中國第 29 軍撤出華北。儘管一開始日本就是否擴大事變有爭議，但關東軍等以「保護僑民」為由，擅自派兵「增援」華北，造成擴大侵略的既成事實。7 月 11 日，近衞文麿內閣迫於軍部壓力，同意向華北增派三個師團。7 月底，日軍攻佔北平、天津，宣稱「徹底掃除反日勢力」。就這樣，從東北到華北，從局部衝突到全面戰爭，日本的侵略步伐從步步蠶食轉向鯨吞中國。

3 通往珍珠港之路

以 1937 年七七事變為標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在此之前的 1935 年，中國著名學者胡適曾提出「日本切腹、中國介錯」的論斷。「介錯」是指在切腹者自殺時，在一旁砍下其首級的行為。胡適的大意是，日本侵略中國等於切腹自殺，因為中國會不顧一切拚死抵抗，付出巨大犧牲，日本最終會威脅到蘇聯和英美，它們將幫助中國打敗日本。所以，中國可以算是日本切腹自殺時的「介錯人」。胡適基本準確預見到了歷史的走向，正是因為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導致日美開戰，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戰爭中最終被徹底摧毀。根據日本學者波多野澄雄等人的觀點，日本在 1941 年 12 月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之前，全面侵華的戰略實施大致經歷如下幾個階段。

一是軍事決戰期，從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10 月。七七事變之後，日本沉浸在「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幻想中。軍部求戰心切，期望速戰速決，目標是以優勢兵力徹底摧毀中國武裝力量，攻佔海岸線和重要工商業城市，瓦解中國軍民士氣，逼迫國民政府垮台，最終肢解中國。在華北和中原，日軍沿平綏、平漢和津浦三條鐵路方向進攻，攻佔張家口、保定、石家莊、太原、濟南、徐州、開封等地。同時，日本攻佔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又佔領國民政府首都南京，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之後，日軍沿長江繼續西進，至 1938 年 10 月攻佔「九省通衢之地」武漢。在華南，日軍從廣東大亞灣登陸，一舉攻佔廣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在這一年零四個月中，首都被佔，東部沿海工業帶與長江中下游產糧區盡失，國民政府退入西南內陸，國家似乎已到「山窮水盡」之地步。然而，中國軍民不屈不撓，堅持抵抗，擊碎了日本滅亡中國的美夢。

二是政治主導期，從 1938 年 11 月至 1940 年 6 月。由於中國軍民奮勇抵抗，光是淞滬會戰就持續三個多月，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幻想。至攻佔武漢、廣州後，日本意識到速決戰略無法成功，將戰略重心轉向「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其核心邏輯是：通過扶持親日政權、分裂抗日陣營，降低佔領區統治成本。日本誘導國民黨分裂，希望在國民黨內尋找「合作者」。從 1938 年 11 月開始，日本一連串誘降行動最主要的對象是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1938 年 12 月，汪精衛偕親信陳公博、周佛海等人乘飛機逃離重慶，在越南河內發表「豔電」，主張接受日本條件「實現和平」。1940 年 3 月，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日本為提振汪偽政府聲勢，於 5 月發動宜昌戰役，陪都重慶震動。宜昌自古為進入四川的門戶，日本控制宜昌可切斷重慶的長江補給線，且空軍以宜昌為基地，可對重慶大規模戰略轟炸。中國軍民飽受轟炸摧殘，但並未動搖抵抗意志，汪偽政府在戰略上的意義大打折扣。1939 年 9 月德國入侵波蘭，歐戰爆發，國際形勢風起雲湧。

三是封鎖邊境期，從 1940 年 7 月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全面抗戰爆發後，既出於各自國家利益，也出於道義同情，蘇聯和英美等國以貸款、易貨、出口物資等方式援助中國。由於中國戰事久拖不決，日本大本營判斷，只有斷絕第三國援助中國才能結束中國的抵抗。因此，日本將斷絕中國外援與實施「南進」戰略視作「一體兩面」。戰爭期間，日本面臨「南進」與「北進」的戰略選擇。「南進」即率兵南下進犯東南亞、太平洋，與英美開戰；「北進」即揮師北上入侵西伯利亞，與蘇聯為敵。1940 年 6 月，法國向德國投降，「南進」戰略佔上風。日本見法國不堪一擊，企圖趁機佔領法屬印度支那，這樣不僅可斷絕西方援華，又可獲得當地豐富的資源。於是，日本禁止西方通過滇緬公路（連接中國雲南和英屬緬甸）和滇越鐵路（連接中國雲南和法屬印度支那）運輸援華物資。9 月，

日本派兵進入法屬印度支那北部，試探「南進」。同月，日本和德國、意大利結成同盟，形成「三國軸心」，法西斯瓜分世界野心昭然若揭。在這一階段，日本試圖鎖死中國邊境，使中國徹底喪失外部援助，內部陷入困絕的處境，中國軍民進入抗戰最艱難的時期。然而，日本的侵略行徑進一步刺激了英美，美國越來越警惕日本野心，堅定了援華政策。

最終，日本鋌而走險，邁上通往太平洋戰爭之路。1941 年 6 月，德國入侵蘇聯，蘇德戰爭爆發。日本軍部中一部分人主張趁機「北進」，進攻蘇聯。同時，軍部另一部分人（主要是陸軍省軍務局和海軍的人士）認為現在「北進」太激進，難以成功。因此，他們為阻止「北進」，主張「南進」，呼籲佔領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南進」戰略再次佔上風。7 月 2 日，日本御前會議通過《適應形勢演變的帝國國策綱要》，決定「繼續向南方擴展」，並表示「帝國為達到此項目的，不辭對英美一戰」，日軍隨即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南部。美國立即凍結日本在美國的資產，並於 8 月全面禁止對日本出口石油，英國等國也對日本實施制裁。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嚴重依賴進口資源的國家，這是非常嚴厲的警告和懲罰。美國和英國也開始對蘇聯提供援助，希望蘇聯能撐過 1941 年的冬天。這樣一來，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兩條陣線就變得越來越清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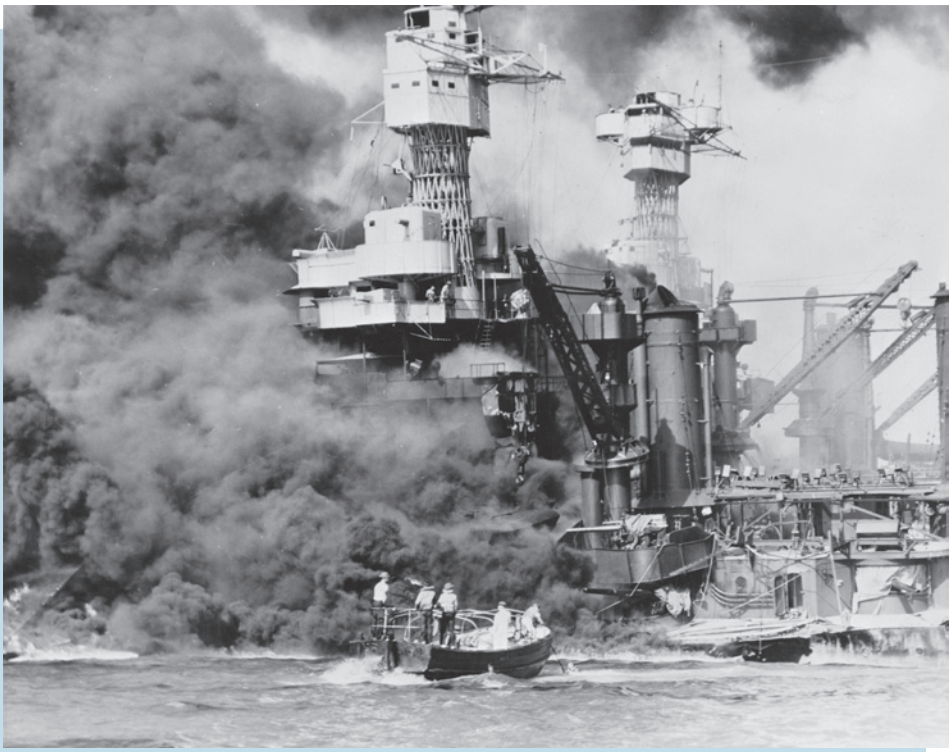
1941 年 9 月 6 日，日本御前會議通過《帝國國策實施要領》，決定如果在 10 月上旬前無法與美國達成外交協議，就對美國等開戰。10 月 18 日，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出任首相。其實，當時日本高層中很多人並不認為東條適合擔任首相，但覺得他能控制軍隊，有決斷力，可以打破曠日持久的僵局。11 月 5 日，御前會議將對英美開戰時間推遲至 12 月初。同時，相持日久的美日談判也在走向最後關頭。由於日本「南進」嚴重威脅西方世界在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利益，美國一方面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繼續制裁日本，一方面與日本展開談判，希望能夠通過

外交途徑遏阻日本進一步擴張，進而解決日本入侵中國以後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造成的一系列問題。美日談判幾經反覆，終陷入僵局。11 月 26 日，美國向日本提出備忘錄，要求日本從中國和法屬印度支那撤軍。日本將這個備忘錄解讀為美國政府的最後通牒，最終決定於 12 月 8 日對美國、英國和荷蘭開戰。

日本的國力與英美等國差距很大，其實並沒有取得勝利的把握，但是，為甚麼最終還是決定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戰爭呢？總體而言，日本軍部認為，經過長期準備，日本在軍艦和飛機的數量上已經基本趕上美國，但美國國力強大，一旦全力生產會很快超過日本。所以，日本要抓住這個稍縱即逝的機會，先發制人。可見，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懷有一種賭徒的心態。

1941 年 12 月 8 日（夏威夷時間 12 月 7 日），日本祕密組建的以 6 艘航母為主力的特遣艦隊逼近夏威夷珍珠港。夏威夷時間早晨，從航母起飛的第一波 180 餘架日機抵達珍珠港上空，對港內美軍戰艦、機場及軍事設施發動空襲。美國海軍「亞利桑那號」（*USS Arizona*）、「奧克拉荷馬號」（*USS Oklahoma*）等戰列艦被魚雷和炸彈擊中，燃起大火沉沒，許多戰機尚未起飛便被炸毀在跑道。約 1 小時後，第二波日機再次發動攻擊，擴大破壞範圍，港內濃煙密佈，多艘艦艇受損或沉沒。整個襲擊持續約 2 小時，美國海軍 4 艘戰列艦被擊沉，十餘艘艦艇遭重創或沉沒，約 2,400 名官兵喪生、1,000 餘人受傷。

偷襲珍珠港得手後，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展開閃電式擴張。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 5 月，日本陸海軍協同迅速攻佔香港、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羣島（今印尼）等地，並重創英國遠東艦隊，甚至將戰火燃至印度洋，轟炸斯里蘭卡。日軍利用盟軍在東南亞防禦薄弱、



珍珠港事件中，美國海軍戰艦中彈燃燒

兵力分散的弱點，以極小代價控制了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廣袤海域，掠奪石油、橡膠等戰略資源，建立起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殖民體系。

然而，這些勝利不過是短暫的軍事冒進，由於挑起太平洋戰爭，日本法西斯徹底淪為與全世界為敵的戰爭機器。中國戰場的長期消耗戰拖住了大量日本軍隊；美國憑藉強大的工業產能迅速轉入戰時體制，展開反攻；英國、澳洲等國對日本展開各種形式的作戰。在 1942 年 6 月的中途島戰役中，日本海軍主力航母艦隊遭到毀滅性打擊，此戰和 1942 年 8 月至 1943 年 2 月的瓜島戰役成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此後，日本逐漸陷入資源枯竭、兵力分散的困境。正如歷史所證明，任何企圖以武力奴役世界的野心，終將在正義力量的聯合反抗下灰飛煙滅。

香港篇

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 1840 年開始，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列強瓜分勢力範圍，英國運用武力征服和外交手段，通過《南京條約》、中英《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不平等條約，先後割佔香港島、九龍，強行租借新界，佔領整個香港地區。雖處殖民統治之下，香港同胞始終心繫國家，積極投身中華民族解放與復興的偉大事業。抗日戰爭爆發後，香港成為援助物資內運樞紐和華南抗日救亡中心，地位日趨重要。日本早有侵佔香港的打算，最終於 1941 年 12 月 8 日發動太平洋戰爭，進攻香港。

1 日本侵佔香港的準備

日本對香港的興趣由來已久，1873 年日本在香港設立領事館，19 世紀中後期，香港成為日本觀察世界的視窗之一。香港也成為東亞革命者川流太平洋各口岸城市的中轉站。1921 年 3 月，日本皇太子裕仁途經香港，朝鮮志士曾籌謀在港刺殺裕仁，但失敗。據鄺智文等學者研究，20 世紀初，日本對香港的諜報工作已經開始。1923 年英日同盟結束後，日本加強對英國的情報工作。二三十年代，大量日本或日偽情報人員進入香港，遍佈各個行業，在告羅士打酒店為歷任港督及港府高層理髮的「山下先生」就是日本情報人員。日本還在香港設立專門情報組織「香港機關」，主要工作是刺探英國在港軍事情報。1936 年 6 月，日本修訂《帝國國防方針》和《帝國軍用兵綱領》，第一次將英國當作

假想敵，設想開戰初期摧毀英國在香港和新加坡的軍事力量。

全面抗戰爆發後，由於香港成為國際援華物資轉運中心，日本視香港為「眼中釘」、「肉中刺」。七七事變後，日本對中國沿海實施封鎖。至 1937 年 12 月，自山海關至法屬印度支那邊界綿延數千海里的中國沿海區域，僅香港、澳門及廣州灣三處海域未遭封鎖。據劉蜀永、劉智鵬、王正華等學者研究，香港是中國進口軍火最重要的口岸，1937 年中國經上海、天津、廣州、九龍等海關進口軍火的價值，九龍關佔總值的 41%，居於首位。至 1938 年 7 月，從外國輸入中國的軍火有 75% 經過香港。1938 年上半年，通過香港轉運的軍火中，來自德國的武器最多，其次依序為蘇聯、捷克、瑞典、比利時、美國、英國、意大利和法國。武器種類方面，德國出口反坦克炮、榴彈炮、手槍、步槍、各類炮彈、槍彈、炸彈等；蘇聯軍火包括坦克、火炮、機槍等；意大利出口飛機零件、炸彈和裝甲車；法國軍火以高射炮彈為主；捷克軍火以機槍和步槍為主。這些軍火是淞滬會戰到武漢會戰時期中國軍隊重要的武器彈藥來源，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物資內運主要依靠廣九鐵路（連接廣州和九龍的鐵路，也稱「九廣鐵路」，今港鐵東鐵綫是該鐵路的一部分），全面抗戰爆發至廣州淪陷前，廣九鐵路和粵漢鐵路（連接廣州和武漢的鐵路）運輸極為繁忙，行車最密時，在途列車達 140 列。廣九鐵路的武器運輸在 1937 年 9 月前半月已達約 200 噸，後半月達約 1,000 噸。據中方統計，1938 年 2 月至 10 月，僅由廣九鐵路輸入的各類物資就有 13 萬噸，包括炸彈、飛機、飛機零件、機槍、雷管、高射炮、野戰炮、魚雷、防毒面具等。此外，香港還是中國辦理易貨物資的輸出口岸。中國戰時以易貨方式換取軍火，中德之間由中央信託局承辦，中蘇之間由易貨委員會主辦。1937 年 10 月至 1938 年 4 月，經香港運出桐油 13,000 多擔。1938 年下半年，中國通過香港外銷茶葉達 1,000 多萬元。

1939 年 1 月，在日本威脅下，港英政府收緊對中國內地出口政策，禁止槍械及軍火經粵港邊界（包括大鵬灣）輸入內地。1940 年，日軍進一步強化封鎖，欲切斷經緬甸、香港、越南等地向中國內地運送物資的多條陸上運輸線。香港同胞利用近岸船隻，將部分禁運物資由海上運往內地。日本「指控」部分香港民船突破日軍沿海封鎖區，向內地運輸禁運品。日本外務省表示，只要香港船隻「走私」與衝破日軍封鎖的行為持續出現，日本就會加強控制香港民船。因此，太平洋戰爭前香港水域及其附近發生大量日軍襲擊民船事件。



日本海軍在中國海域切斷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聯繫，為攻佔香港做準備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將香港視為西方國家援助中國的基地，加緊侵佔香港的準備。日本在《1940 年度作戰計劃》中規劃「香港作戰要領」，準備在戰爭開始後立即用空軍摧毀香港的英軍戰機和軍艦，陸軍先從九龍半島方面進攻，然後攻佔香港島。同時，日本策劃利用香港黑社會從內部進行擾亂顛覆活動，為此，參謀本部第八課派遣阪田誠盛赴港，在三合會中成立組織、提供武器，預備策應日軍進攻香港。1941 年 6 月，參謀本部決定加強對香港的封鎖和武力壓迫，日軍發動廣九作戰，攻佔深圳，封鎖粵港邊境，香港已實際處於日軍包圍之下。7 月，日軍向華南派遣重炮部隊和空軍，為進攻香港做準備。

1941 年 9 月，日本準備一旦對美國談判無果就開戰，陸軍提出「南方作戰」計劃，將香港與馬來亞、菲律賓等列為首輪進攻目標，預計以一個師團兵力攻佔香港。10 月，日本陸軍第 38 師團擬定進攻香港的計劃，準備兵分兩路突破英軍防線，用 12 天左右的時間攻佔新界和九龍，之後經過 5 至 7 天準備，登陸香港島，再用 5 天左右時間肅清島上英軍。據此，第 38 師團預估用 20 餘天時間完成香港作戰。

2 英國在香港的應戰準備

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態度，英國準備如何防守香港？日軍是怎樣攻佔香港的？謝永光、劉蜀永、莫世祥、劉智鵬、鄺智文、蔡耀倫等學者對上述問題進行過精深研究，以下綜合他們的研究成果，向讀者簡要介紹英國在香港的應戰準備以及香港戰役的經過。

香港的防務問題主要取決於英國的對外戰略。20 世紀初英國已失去 19 世紀時的世界霸主地位，1902 年英國與日本結成同盟，以此維

護自身在亞洲的利益。然而，隨着日本走上侵略擴張之路，英日同盟越來越脆弱。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英國海軍已經開始把日本當作假想敵，設想在未來的戰爭中，香港如果遭到日本入侵，需死守等待英國海軍從新加坡馳援。然而，英國陸軍卻認為香港無法死守，只能放棄。英國軍方經過討論和調研，從 1927 年開始逐漸明確，香港防衛目標為：守軍應獨自作戰 45 至 55 天，以待強大的英國海軍艦隊到來增援。為實現這一目標，駐港英軍於 1936 年開始興建醉酒灣防線（Gin Drinker's Line），至 1938 年基本完成。工程以同期進行的城門水塘第三期擴建為掩護，利用水利設施施工掩蓋軍事意圖。防線總指揮部設於城門水塘南側的城門棱堡（Shing Mun Redoubt，又稱城門碉堡），其地下包含數百米隧道，連接數座配備機槍的混凝土碉堡。防線由四大防禦區域構成，起點位於葵涌醉酒灣（今葵涌貨櫃碼頭附近，原海岸線已被填海覆蓋），經金山、城門水塘、筆架山、獅子山、大老山，延伸至西貢牛尾海，全長約 18 公里。主要防禦工事由混凝土機槍堡、反坦克壕溝、地下通訊樞紐、觀察哨等構成。

1936 年，駐港英國陸軍司令巴度苗（Arthur Bartholomew）提出新的防衛計劃，以駐港英軍四個營為基本兵力，援軍抵達時間設定為開戰後第 54 日。英軍估計日軍在初期會投入一個師團進攻香港，守軍四營的分佈為：三營依託醉酒灣防線守衛新界九龍，一營防守香港島。三個守衛醉酒灣防線的步兵營要準備戰至最後，也就是做好全軍覆沒的準備。但是，問題來了，按照這個防衛計劃，當三個營的英軍在醉酒灣防線消耗殆盡，防線便告失守。巴度苗似乎沒有計劃撤回部隊到香港島，而香港島只有一個營的兵力，難以阻止日軍渡海。所以，後來軍方將醉酒灣防線的用途由「最後的防線」改為「遲滯敵軍」，也就是說，最終的目的是要保住香港島以待援軍到來，不要把所有的力量消耗在新界和

九龍，要做好將守軍撤回香港島的準備。

1939 年歐戰爆發，英國無暇顧及亞洲，日本對香港步步緊逼。1940 年，英國殖民地部和港督羅富國（Geoffry Northcote）希望將香港設為「不設防城市」，以免殃及無辜。英國軍方堅持防衛香港，他們並不認為有取勝把握，而是判斷日本在中國戰事沒結束前未必會進攻香港。軍方還認為，主動放棄香港會帶來災難性後果，城市有可能陷入無序狀態而遭到毀滅。因此，英國的目標是儘可能拖延戰爭在亞洲爆發，防衛香港主要出於「道義」責任，最理想的狀態是能守住 130 天，以待戰局變化。然而，被稱為「東方馬奇諾防線」的醉酒灣防線並未達到設計時的水準。香港守軍的主要力量只有四個陸軍營，很難達到防衛目標。1940 年 12 月，樸芳（Robert Brooke-Popham）出任遠東三軍總司令，他向倫敦提出再調兩個陸軍營防守香港，以便非常時期應對亂局。此事引發爭議，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認為樸芳的建議不可取，重申英國必須避免將有限的資源浪費在守不住的地方。劉蜀永等學者認為，英國之所以沒有立即放棄香港，一是減輕駐新加坡英軍的壓力，二是為了大英帝國的面子。1941 年 7 月，駐港英軍司令賈乃錫（A. E. Grasett）卸任，他返英途中經過加拿大，勸說加國政府派兵協防香港。在英國政府努力下，兩個營的加拿大軍隊約 2,000 餘人馳援香港，這樣，香港的守軍就有六個營了。然而，這些加拿大青年最終在香港戰役中陣亡或被俘，此事成為加拿大和英國之間的一個「歷史心結」。

開戰前，新任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C. M. Maltby）最後調整了作戰計劃。他將六個營的部隊分為兩部分，三個營守衛九龍，主要佈防於醉酒灣防線；三個營防守香港島。此時，香港防禦力量大約有 12,000 人，包括陸軍正規部隊六個營，加上後備役性質的香港義勇防衛軍（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s, HKVDC）。駐港皇家海軍有



在深水埗軍營待命的加拿大援軍官兵

驅逐艦 1 艘、魚雷快艇 8 艘、炮艇 4 艘，總人數約 1,600 人。空軍有幾架舊式戰鬥機，基本沒有戰鬥力。在民防方面，港英政府修築了大量防空洞，訓練了一批香港市民充當防空救護員。

預料到日軍即將發動進攻，英國方面曾向中國共產黨提出軍事合作。1941 年 10 月 24 日，英軍遠東司令部派員來到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提出希望中共瓊崖抗日游擊隊炸毀海南島日軍機場，由英方將炸藥運至廣州灣，再由中共方面運往海南島。為此，英方要求中共派人赴香港學習炸藥使用技術，表示願意提供軍火和無線電器材。中共中央批准與英方合作。此後一個多月時間，英方與八路軍辦事處談判五次。12 月 5 日，雙方基本達成一致，準備成立合作辦事機構，以「廣南公司」為名作掩護。英方願意提供瓊崖游擊隊駁殼槍 1,000 枝、衝鋒槍 250 枝

（原文為「輕機」，似指衝鋒槍），另撥給東江游擊隊駁殼槍 500 枝、衝鋒槍 50 枝。然而，此後英方又提出派員監督武器使用、游擊隊不能進入香港等苛刻要求，雙方合作未及展開，太平洋戰爭即爆發。儘管如此，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仍然部署力量，襲擾日軍攻港部隊。日軍發動進攻前，茜坑、馬鞍嶺的抗日自衛隊連續夜襲深圳坑梓、坪山、葵涌的日軍，在烏石岩－龍華－布吉公路沿線，游擊隊襲擊向香港開進的日軍部隊。

3 十八天香港戰役

1941 年 11 月 6 日，日軍大本營命令華南方面軍準備進攻香港，日軍開始在深圳集結。進攻力量由酒井隆中將的第 23 軍旗下的佐野忠義第 38 師團構成，下轄第 228、第 229 和第 230 三個步兵聯隊。參戰空軍為第 1 飛行師團第 45 戰鬥隊。海軍為第 2 派遣艦隊。11 月 30 日，酒井隆收到命令，以攻佔香港為目標，12 月 7 日以後準備隨時突破粵港邊境。英軍於 12 月 3 日獲悉日軍情報，在 12 月 7 日已全部進入作戰部署。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發動偷襲珍珠港後，隨即進攻馬來亞和香港。凌晨 4 時 45 分，英軍情報官監聽到日本即將與英美開戰的情報，部署在粵港邊境的英軍工兵隨即破壞了深圳河上的橋樑，並切斷新界與九龍之間的幹線公路。清晨，日軍空襲啟德機場，英國皇家空軍戰機被摧毀在地面上，日軍取得了香港的制空權。空襲之後，日軍第 38 師團下轄的第 228、229 和 230 聯隊從寶安縣打鼓嶺、羅湖及新田三個方向進入香港境內。



日軍渡過深圳河進攻香港

12 月 9 日下午，第 228 聯隊已經抵達醉酒灣防線的核心區域城門棱堡。按照日軍推測，英軍將會竭盡全力防守醉酒灣防線，因而計劃以一個星期時間準備，等待炮兵集結，用重炮轟擊摧毀英軍防線後，再發起總攻。12 月 9 日晚上，正在偵察英軍陣地的日軍發現城門棱堡防線有漏洞，隨即向防線發起攻擊，英軍對此並無有效防範措施，碉堡內的守軍在數小時之內即潰敗。至 12 月 10 日凌晨 2 時左右，醉酒灣防線的核心城門棱堡陷落了。這個驚人的戰果就連日軍的參謀也難以置信，在他們看來，這座歷經多年修築、複雜而堅固的軍事要塞很難被攻陷。

英軍因兵力不足，沒有反攻城門棱堡。12 月 11 日上午，日軍突破金山防線，打開了通往九龍的道路。為了避免守軍全軍覆沒，當天中午，莫德庇下令英軍放棄九龍，向香港島撤退。12 月 12 日上午，日軍輕易攻佔九龍市區，僅遇到零星抵抗。香港的黑幫份子和漢奸趁亂大肆



日軍進攻尖沙咀

搶掠，他們高呼「勝利」，四處出擊。此時日軍還不清楚英軍正在撤退，出於謹慎，日軍放慢了攻擊速度。12 月 13 日上午，倖存的英軍得以撤回香港島。

日軍佔領新界和九龍之後，沒有立即進攻香港島，而是嘗試對港英政府招降，剛剛上任三個月的香港總督楊慕琦（Mark Young）拒絕投降。之後數天，日軍不斷炮擊和空襲香港島。12 月 18 日晚，日軍三個聯隊在夜色掩護下，先用人力推動木筏悄悄地橫渡維多利亞港，其後用船隻拉動特別製造的登陸艇大規模快速登陸香港島。英軍無力進行反登陸作戰，只能堅守內陸陣地。

英軍將香港島兵力分為東旅和西旅，西旅指揮部設於黃泥涌峽入口處，由加拿大軍羅遜（John Lawson）准將指揮。這個地方位於香港島中央，四通八達，是英軍的戰略核心。但是，日軍登陸後不久就攻入了黃泥涌峽要道。12 月 19 日上午，羅遜率部突圍，戰至陣亡。他是香

港戰役中陣亡的職務最高的軍官。隨後，日軍南下攻佔設於大潭峽的東旅指揮部，並於 12 月 20 日攻佔清水灣，分割包圍東西兩側英軍。至 12 月 21 日，英軍聯合反攻失敗，當時戰況極為慘烈，加拿大兩營部隊傷亡尤其慘重，日軍亦遭到重創。此後，英軍仍然依靠山地防守，至 12 月 25 日已無力支撐。

1941 年的 12 月 25 日在香港的歷史上被稱為「黑色聖誕節」。港督楊慕琦發表聖誕文告，鼓勵士兵奮戰。這一天上午，日軍再次對楊慕琦勸降，楊慕琦回應說：「香港還能抵抗。」午後，日軍對英軍最後的防線發起新一輪炮擊和轟炸。下午 3 時許，莫德庇向楊慕琦表示，英軍已無法抵抗。楊慕琦決定向日軍投降。傍晚，楊慕琦與莫德庇等渡海前往設於尖沙咀半島酒店的日軍指揮部，向第 23 軍司令官酒井隆投降，持續 18 天的香港戰役結束。當晚，東京宣佈佔領香港。12 月 26 日，日軍舉行香港入城式。在英國人統治多年後，香港淪為日本佔領地。

第二章

暴行



國家篇

侵略戰爭往往伴隨着侵略者的暴行，從 19 世紀開始，人類社會試圖採取訂立國際法等形式阻止戰爭和戰爭罪行的發生。20 世紀 20 年代，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簽署了《非戰公約》和《日內瓦公約》，但是日本還是對中國悍然發動侵略戰爭，對中國平民百姓犯下滔天暴行。日本侵略者殺人、強姦，進行人體實驗，實施細菌戰、化學戰，進行大規模搶劫掠奪，可謂無惡不作。這些罪行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災難，成為中華民族一段無法磨滅的傷痛記憶。

1 屠殺與性暴行

侵華戰爭期間，日軍無視國際法，對平民和戰俘進行慘無人道的屠戮，對中國婦女實施令人髮指的性侵害。這一系列的反人類罪行，摧殘了中國人民的生命、踐踏了中華民族的尊嚴。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至七七事變發生前，已有眾多無辜中國百姓遭到日軍屠殺。「平頂山慘案」是其中較早的一例。1932 年 9 月 16 日上午，日軍包圍遼寧省撫順市平頂山村。他們藉口村民支持抗日武裝，將約 3,000 名村民驅趕到村莊西側的平頂山下，用機槍瘋狂向人羣掃射，之後用刺刀殘殺倖存村民。下午，平頂山村附近的栗家溝和千金堡兩村也遭屠戮。屠殺過後，日軍將死難者屍體堆在山崖下，澆上汽油焚毀，隨後又用炸藥炸崩山崖，用落下的土石掩埋屍骨，試圖毀屍滅跡。與平頂山慘案類似的，還有白家堡子大屠殺、南崗頭堡子大屠殺，等等。

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的屠戮暴行更加瘋狂，華北各省平民飽受殘害。1937 年 9 月，日軍攻佔河北保定，保定居民遭屠戮者達 3,000 餘人。同月，日軍攻佔山西朔縣，進入縣城內燒殺搶掠，造成「護城河水三日赤紅」。城內被害居民近 4,000 人，佔當時城內人口將近一半。10 月，日軍進犯河北武清縣崔黃口，大肆抓捕當地居民，100 餘人慘死在機槍與刺刀之下。同月，日軍轟炸河南安陽縣城，炸死居民 1,000 餘人。11 月，安陽縣城淪陷，2,000 餘名居民慘遭殺害。城內火光沖天，大火三天不熄。不少婦女遭到日軍強姦，稍有反抗便被殘害致死。

在江南，日軍在從上海向南京進攻的沿途即開始殺戮平民。日軍 8 月在寶山登陸後，在羅涇屠殺民眾 2,000 餘人，姦淫婦女數以百計，燒毀



日 新 聞

百人斬り〝超記錄〟

向井106—105野田

兩少尉さらに延長戰

【紫金山麓にて十二日淺海、鈴木兩特派員發】

〝百人斬り競爭〟の兩將校

（右）野田巖少尉（左）向井敏明少尉

日本報紙關於「百人斬」的新聞

房屋萬餘間。11 月，蘇州淪陷，日軍入城後大肆縱火搶劫。同月，日軍在無錫東亭殘殺村民千餘人，強姦婦女數百人。日軍還在武進縣城實施屠殺，光是事後被掩埋的屍體就有 4,000 餘具。12 月，鎮江淪陷，城內被殺居民 4,500 餘人，婦女有被輪姦致死者。進軍南京途中，向井敏明與野田毅兩名陸軍少尉甚至展開殺人比賽，他們以用軍刀斬殺 100 名中國人作為「比賽目標」，極其喪心病狂。

12 月 13 日，南京淪陷，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發生。慘劇為甚麼會發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大肆宣揚種族優越論，蔑視中國和亞洲其他各民族。由於軍國主義思想影響，日軍在戰場上漠視生命，無視國際法。其次，日本企圖用暴力手段壓服中國，消除中國人民的抵抗意志。故此聲稱要「暴支膺懲」，一些部隊下達「全部殺掉俘虜」的指令。再次，很多日軍官兵因遭到中國軍民奮勇反抗，產生報復心態，他們心理扭曲畸形，以殺人為樂，感到殺人越多越「光榮」。而且，南京地位重要而特殊。日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攻陷南京前夕曾命令：「南京是中國的首都，佔領南京是一個國際事件，所以必須作周詳的研究，以便發揚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國畏服。」因此，日軍使中國「畏服」的手段之一就是屠殺，可見，南京大屠殺是有預謀、有計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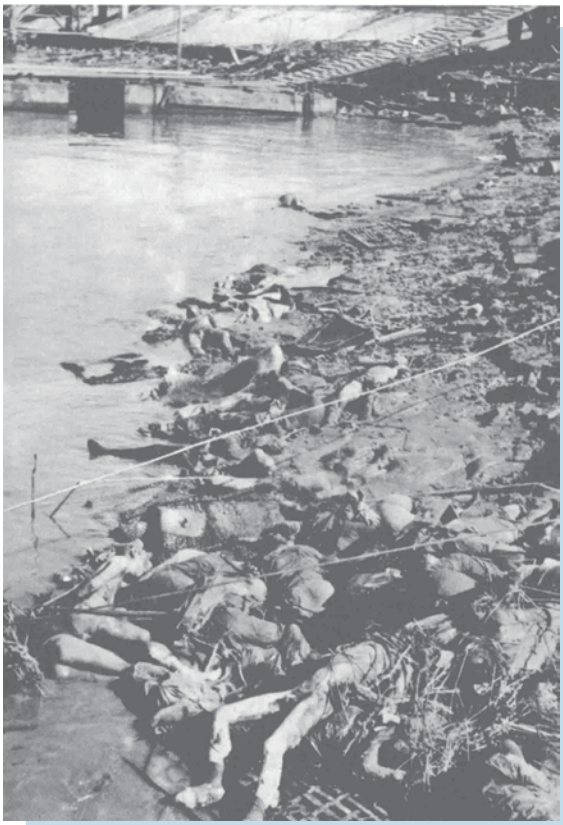
大規模的屠殺持續了至少六週。在這一階段，日軍違反國際公約，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與無辜平民展開了有計劃的集體屠殺。

12 月 13 日上午，佔領太平門的日軍將約 1,300 名戰俘屠殺在太平門附近的城壕裏。日本陸軍第 16 師團第 33 聯隊士兵池端正巳回憶：「他們來到太平門，一個個被解除武裝。俘虜很多，戰利品也很多，所以如何處置這些敗兵、俘虜成了問題。我們部隊人數很少，不滿一百。那麼多俘虜，有一千幾百個人……師團的上級命令是『都處置掉』。」

下關是中國軍隊北撤和難民逃離的重要通道，以下關為中心的南京城北長江邊成為日軍實施集體屠殺最為集中的地區。12 月 13 日下午，日軍佔領下關，用機槍掃射碼頭、岸邊和江中的中國軍民。日本隨軍記者鈴木二郎寫道：「被日本兵追趕得無處藏身的數千名士兵和市民，在這裏被機關槍射殺，血流成河、屍積如山，連寬闊的揚子江的黃色江水也被染成了紅色，江面上漂浮着無數屍體。在倉庫密集的這一地區，到處都能看到進行刺殺的士兵身影。這裏已經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街道。」日軍還將抓獲的中國軍人以及疑似軍人的平民，分批押往長江邊的三汊河口、中山碼頭、煤炭港、草鞋峽、燕子磯等地進行集體屠殺。參加過草鞋峽集體屠殺的日軍少尉宮本省吾在日記中寫道：「12 月 16 日……大隊決定採取極端措施，把約三千名俘虜押到揚子江邊槍殺了。這是只有在戰場上才能看到的場景。12 月 17 日……傍晚回來，立刻出發加入了對俘虜兵的處決。由於已殺了兩萬多人，士兵殺紅了眼。」



南京市民在長江邊慘遭日軍殺害並被焚屍



長江邊堆積如山的屍體

日軍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中肆意殺戮，建康路、白下路、大光路、石鼓路、中山路等地屍體橫陳。日軍第 16 師團第 30 旅團長佐佐木到一少將在作戰手記中寫道：「進行抵抗的人和不願順從的人，當即被無情地殺戮。整天可以聽到各地傳來的槍聲。死屍填滿了太平門外很寬的護城河 …… 下關的繁華街道幾乎全被燒毀。數百輛汽車被扔在江邊馬路上，數百具死屍從岸邊漂流出去。」日軍還以虐殺中國平民為樂，日本士兵東史郎在日記中，記錄了戰友西本的暴行：「大聲哭喊着的支那人被裝進了郵袋，袋口被紮緊，那個支那人在袋中拚命地掙扎着、哭喊着。西本像玩足球一樣把袋子踢來踢去，像給蔬菜施肥一樣向袋子撒



南京青年被日軍捆綁砍殺

尿。西本從破轎車中取出汽油，澆到袋子上，在袋子上繫一根長繩子，在地上來回拖着。稍有一點良心的人皺着眉頭盯着這個殘忍的遊戲，一點良心都沒有的人則大聲鼓勵，覺得饒有興趣。西本點着了火。汽油剛一點燃，就從袋中衝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慘叫聲。袋子以渾身氣力跳躍着、滾動着。有些戰友面對如此殘暴的玩法還覺得很有趣，袋子像火球一樣滿地滾，發出一陣陣地獄中的慘叫。」

日軍在南京喪心病狂地對中國婦女施以性暴行。據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公佈的極為保守的數字，僅在日軍佔領南京後的一個月內，就發

生了約 2 萬起的強姦事件。在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的判決書中，有一段令人觸目驚心的文字：「日軍陷城後，更四出強姦，一逞淫威。據外僑所組國際委員會統計，在 12 月 16 日、17 日，中國婦女遭日軍蹂躪者，已越千人。且方式之離奇慘虐，實史所未聞，如 12 月 13 日，民婦陶湯氏，在中華門東仁厚里 5 號，被日軍輪姦後，又被剖腹焚屍。懷胎九月之孕婦蕭余氏，16 歲少女黃柱英、陳二姑娘，及 63 歲之鄉婦，亦同在中華門地區慘遭姦污。鄉女丁小姑娘，在中華門堆草巷，經日軍 13 人輪姦後，因不勝狂虐，厲聲呼救，當場被刀刺小腹致死。」

除犯下上述暴行外，日軍還在南京大肆縱火、劫掠。南京從戰前中國的「首善之區」，淪為人間煉獄。1947 年，南京國防部戰犯軍事法庭判定：「我被俘軍民被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並焚屍滅跡者，有單耀亭等 19 萬餘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屍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 15 萬餘具。被害總數達 30 萬人以上。」1948 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日軍在南京屠殺的人數達到 20 萬人以上。

南京大屠殺期間，不少國際友人發揚人道主義精神，德國西門子公司駐華總代表拉貝（John Rabe）、金陵大學美籍教師華羣（又譯魏特琳，Minnie Vautrin）等歐美人士組織「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他們救助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他們的善舉彰顯着人性的光輝。

南京大屠殺後，日軍並沒有停止殘暴行徑。而且，日軍在中國製造的四五千起大規模屠殺血案，絕大多數都發生在南京大屠殺後。1938 年 3 月，日軍攻陷河南浚縣，屠戮民眾 4,500 餘人，強姦婦女 500 餘人，焚燒房屋 1,000 餘間。1943 年 5 月，日軍在湖南廠窖鎮實施四天四夜的大屠殺。日軍殘殺中國軍民 3 萬餘人，強姦婦女 2,000 多人，燒毀房屋 3,000 多間，炸沉、燒毀船隻 2,000 多艘。有學者認為，廠窖慘案是

日本在侵華戰爭中製造的第二大慘案，也是二戰時期法西斯日均殺人最多的慘案。除此之外，日軍還犯下金鄉屠城、興縣屠城等諸多罪行，不勝枚舉。

日軍強徵大量中國女性充當性奴隸，為掩人耳目，稱她們為「慰安婦」。根據蘇智良、卞修躍等學者的研究，中國大陸被迫淪為「慰安婦」的女性數量最多，總計在 20 萬人以上。日軍主要通過擄掠中國女性充當「慰安婦」，亦通過偽政權強行向各戶攤派「慰安婦」數額。1940 年 4 月，日軍在河南新鄉的王各莊擄走婦女 82 人，強迫她們充當隨軍「慰安婦」。其中 9 人不堪侮辱，以死抗爭，另有 9 人在短短 3 天內被日軍蹂躪致死。剩下的 64 人則被押至山西大同「慰安營」，直到抗戰勝利才重獲自由。日軍在海南島陵水建立兵營時，強令各村選送 20 多名黎族婦女充當「慰安婦」。這些黎族婦女白天被迫在軍營中從事繁重的勞役，夜間則淪為日軍官兵發洩獸慾的工具，遭受非人的待遇與屈辱。

很多在戰場上被俘的中國女軍人，也被日軍押送到偏遠的前線充當性奴隸。在徐州會戰中，日軍華北方面軍第 2 軍的聯隊長小男一雄，將被俘的 23 名中國女軍人從俘虜營押送至樹林深處，祕密成立隨軍「慰安所」。日軍還在各地以招募女工、洗衣婦、招待員、護士為名，誘騙婦女充當「慰安婦」。1942 年春，日軍假借香港「合記公司」之名，以招募護士、醫務人員為幌子，先後在廣州、香港等地誘騙 300 多名中國婦女，將她們押至海南島石碌的「慰安所」。「慰安所」四周設有鐵絲網，日軍日夜巡邏。一些婦女試圖逃跑，她們被日軍抓回後，被剝光衣服吊打，有的被活活打死。她們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和尊嚴，每人每天只有約 3 兩米飯或幾塊番薯充飢，卻要遭受日軍官兵多次凌辱。抗戰勝利時，這 300 多名婦女中，已有 200 餘人被日軍折磨致死。



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王騰 攝）

2 細菌戰和化學戰

日軍侵華期間，發動滅絕人性的細菌戰、化學戰，慘無人道地進行人體實驗。日軍從事細菌戰的研究與實踐由來已久，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以石井四郎為代表的一批軍國主義份子便大肆鼓吹細菌戰。1932 年，日本建立「細菌研究室」（對外稱「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領導，正式開展細菌戰的罪惡活動。1933 年，「防疫研究室」擴建為「防疫研究所」，成為日本細菌武器的研製中心。

隨着日本侵略行徑不斷擴大，石井四郎向陸軍大臣荒木貞夫遞交報告，要求將研究所全體人員調到中國東北，獲得同意。1933 年 8 月，石井四郎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祕密建立細菌戰基地「石井部隊」，對外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1941 年，該部編號改為「滿洲第 731 部

隊」。731 部隊具備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設施最完備的細菌戰基地。部隊下轄細菌研究部、細菌實驗部、細菌生產部等八個部門，還設有海拉爾等四個支隊和大連衛生研究所等分支機構。

日軍在準備、實施細菌戰的過程中，構建了整體的細菌戰部署體系。除 731 部隊外，日軍還在吉林長春設立「滿洲第 100 部隊」，在北京設立「北支甲 1855 部隊」，在南京設立「榮字第 1644 部隊」，在廣州設立「波字第 8604 部隊」。侵華日軍的各軍團內，還專門設有「防疫給水部」和「獸類防疫部」，實則是在各基地的指導下負責在前線實施細菌戰的野戰部隊。由此，日軍在中國建立了複雜細密的細菌戰網絡。在這一網絡中，731 部隊居於指揮中心地位。石井四郎曾表示，他不僅有權指揮 731 部隊，還有權指揮華北、華中、華南、南太平洋方面的相關部隊。



731 部隊將健康者和染病者關押在一起進行傳染實驗

日軍在準備細菌戰的過程中，不僅利用動植物進行實驗，還以活人為標本，進行滅絕人性的人體實驗。根據原 731 部隊隊員證實，該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各種細菌傳染實驗。731 部隊採取欺騙或強制手段，讓受害者食用摻有致命病菌的牛奶、瓜果，或者直接將病菌注射到受害者體內。他們還將破傷風梭菌以最低致命量的十倍、百倍、千倍接種給受害者，致人死亡。

第二，三種細菌傳染方法對比實驗。1942 年，731 部隊將 45 名受害者作為實驗對象，分別通過注射、植入和內服三種方法，使他們感染鼠疫桿菌，受害者紛紛死亡。

第三，兩種疫苗對比實驗。1942 年，731 部隊選定 20 名中國人，將其中 16 人分為兩組，每組 8 人，對兩組分別注射兩種不同的霍亂疫苗，剩餘 4 人沒有進行注射。20 天後，日軍強迫受害者喝下含霍亂弧菌的牛奶，最終造成 5 人死亡。

第四，凍傷實驗。731 部隊設立凍傷研究班，以活人作實驗材料。他們將受害者帶到零下 30℃以下的室外，使其手腳裸露，直至四肢凍僵。隨後，他們將受害者拉入解凍室，分別用冷水、温水、開水進行解凍實驗。當受害者的凍傷部位被澆上開水時，骨肉瞬間分離。

第五，乾燥實驗。731 部隊將受害者綁在椅子上，放進高温乾燥室裏。在烘烤下，受害者全身冒汗，體內的水分被一點點烤乾。在十幾個小時內，受害者即成為一具乾屍。

第六，毒氣實驗。731 部隊將受害者關進密封的玻璃櫃內，分別注入不同濃度、不同種類的毒氣進行實驗，直到受害者被毒死為止。這種

實驗的受害者多為凍傷實驗的倖存者。此外，731 部隊還用毒氣大規模殺害反抗實驗的人員。

第七，活體解剖。731 部隊常常將受害者屍體大卸八塊，從臟器裏取出菌液，然後將空殼屍體投進焚屍爐。原 731 部隊成員回憶稱，為取得健康少年的內臟，他們甚至進行活體解剖。受害者活生生地被割開皮肉、取出內臟。

此外，731 部隊還進行梅毒傳染實驗、器官移植實驗、人體倒掛實驗、人體換獸血實驗等等，罪行罄竹難書。10 餘年間，至少有 3,000 人遇害。

在此期間，日軍細菌戰基地逐漸具備了作戰能力。731 部隊多次派出遠征隊，協同日軍其他部隊發動細菌戰。其中，浙江地區成為細菌戰重災區。1940 年 10 月 4 日，日軍在浙江衢縣投下含有鼠疫桿菌的大麥、蕎麥、粟米及死跳蚤。11 月 12 日，衢縣爆發鼠疫，至 12 月 5 日，共發現鼠疫患者 21 人，全部死亡。此後，鼠疫大肆蔓延，至 1941 年底，鼠疫波及 13 個鄉 22 條村，死亡人數達到了 1,000 人以上。1940 年 10 月 22 日，在石井四郎指揮下，日軍在寧波空投染有鼠疫桿菌的小麥、麵粉、粟米等物。10 月 29 日至 12 月 6 日共 34 天內，寧波發現感染鼠疫者 99 人，其中僅 2 人倖存。11 月 27 日、28 日，日軍出動 3 架飛機，在金華上空散佈鼠疫桿菌，造成 167 人死亡。1942 年，日軍在浙贛戰役中，調動 731 部隊與榮字第 1644 部隊實施細菌戰，投放大量炭疽桿菌、傷寒桿菌、副傷寒桿菌、鼠疫桿菌，造成浙贛鐵路沿線陸續出現疫情，導致中國軍民大批病亡。截至 1945 年，日軍多次對杭州、紹興、寧波、衢州、金華、麗水、温州等 7 個市 10 多個縣實施細菌戰。浙江感染人數在 30 萬人以上，死亡超過 6 萬人。

此外，731 部隊於 1941 年春派出遠征隊，向湖南常德空投攜帶鼠疫桿菌的跳蚤，導致 400 多人死亡。1942 年 4 月，在廣州南石頭難民收容所，波字第 8604 部隊將副傷寒桿菌放入難民所飲用的湯水中。當時，收容所中關押着大批被遣返回廣州的香港難民。投毒當晚即有人發病，難民隨後紛紛死亡。

除了細菌戰與人體實驗外，日本還在中國有計劃地開展化學戰。1937 年 7 月，日軍下達命令，允許對中國使用化學武器。此後，日軍化學部隊被陸續派往中國戰場。其中，關東軍化學部是最為重要與特殊的一支部隊，它對外稱「滿洲第 516 部隊」，是日本陸軍化學戰研究、訓練機構在中國的支部，常與 731 部隊共同進行毒氣實驗、活體實驗，為日軍發動化學戰提供了重要支撐。



日軍戴防毒面具發射炮彈

日軍在淞滬會戰、武漢會戰、修水戰役、長沙會戰、百團大戰等多場戰役中使用了化學武器。日軍戰報寫道：「使用毒氣的效果尤為明顯：遍地死屍，嘴上雖然扣着防毒口罩，但毫無作用，裏面充滿了鼻涕；據第一線聯絡軍官觀察，（中了毒的）敵人搖搖晃晃，根本無法射擊。」不僅如此，日軍還用化學武器殘害平民百姓。1942 年 5 月，日軍在「冀中肅正作戰」中大肆使用毒氣，殘殺河北定縣北疃村躲在地道內的中國百姓，造成 800 餘人死亡。1942 年 8 月，日軍在河北叩崗村將 42 名男性青壯年趕到一間小屋，隨後向屋內扔入毒氣，造成 21 人死亡。有學者統計，中國軍民因日軍實施化學戰而中毒者，達到 94,000 人以上，其中死亡人數超過 10,000 人。

3 大規模劫掠

日軍在侵華戰爭期間，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劫掠，不僅使中國人民蒙受了巨大物質損失和精神創傷，也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

在經濟方面，日本的劫掠堪稱瘋狂，中國的糧食、食鹽、鋼鐵、煤礦等產業都遭受重創。首先，日本竭力掠奪中國糧食，每到收穫時節，淪陷區偽政府都會出動軍警，強迫農民「出售」除口糧外的全部餘糧，而所謂口糧根本不夠農民果腹。1941 年至 1943 年，日本從華北「收購」稻穀 12.3 萬噸、小麥 72.4 萬噸；1943 年至 1944 年，日本從華中「收購」大米 47.1 萬噸、小麥 68.2 萬噸。在東北，偽滿政府全面壟斷農產品，強徵、低價收購糧食，使東北農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難。1942 年，鶴立縣約 300 人因缺糧自殺；1943 年初，勃利縣有農民約百

人斷糧；10 月，營口市共有 1,989 人因無糧而逃荒；11 月，清原縣約有農民 2,500 人因缺糧逃難。

其次，日本在佔領區強制推行食鹽配給制度，禁止食鹽運往抗日根據地，確保食鹽源源不斷輸往日本。日本還極力壓低輸往日本的食鹽價格，最大限度榨取中國鹽業。此外，日軍還在中國各淪陷區大量掠奪所謂「軍用鹽」。1937 年至 1945 年，日軍從中國掠奪的鹽在 110 萬噸以上，佔中國淪陷區鹽產量的一半，中國損失巨額鹽稅。

再者，中國的礦產資源也遭到了嚴重的掠奪與破壞。安徽省當（當塗）繁（繁昌）礦區是中國的七大鐵礦區之一。從 1938 年起，日方對當繁礦區進行掠奪，將南山礦點作為重要開採區。據統計，1938 年至 1943 年，日本從南山礦點共掠奪礦石 334 萬噸以上。在日本控制的礦場中，中國工人勞動條件惡劣，沒有勞工福利，即使在高溫崗位也沒有防護用品可用，傷亡事故幾乎天天發生。1940 年 11 月，駐焦作的日軍成立「焦作炭礦礦業所」，強吞中國七大煤礦之一的焦作煤礦。他們在礦區建立武裝組織，強迫工人超強度工作。工人常常被迫在井下作業 48 小時才得上井。井下通風、防水、防毒設備極差，安全事故時有發生。日軍侵佔焦作期間，掠奪煤炭資源 500 萬噸以上，破壞煤田資源 1,500 萬噸以上。

最後，日本大肆掠奪中國金融業。1938 年 2 月，日方在華北成立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大量無儲備、不兑現的紙幣「聯銀券」，強制華北人民使用。1941 年 1 月，汪偽政權成立「中央儲備銀行」，發行「中儲券」，強制華東、華中、華南淪陷區的人民使用。日偽濫發「聯銀券」和「中儲券」，導致物價飛漲。此外，對於華資工廠，日本通過軍事管理、委任經營、「中日合辦」（實為日方獨佔）等手段加以掠奪。

在文化方面，日本肆意破壞和摧殘中國文化，掠奪文物與典籍。光是南京一地，被劫掠、破壞的文物數量便不可勝計。根據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報告，該處留在南京的 2,953 箱文物全被日軍劫奪。南京市圖書館以及夫子廟、牛首山佛教寺院都遭到日軍焚毀，朝天宮、南京城牆遭到破壞。光是中山陵一地，日軍破壞所造成的損失就達 300 餘萬元。根據《南京市抗戰時期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記載，南京市損失書籍約 46 萬冊、字畫 7,000 餘件、古物 2 萬餘件、儀器約 1,000 件、標本 2 萬餘件。但該統計數量仍極為有限，南京在文化上遭受的實際損失遠超出此數。

在人力方面，日本強徵中國勞工。1937 年，日方開始在松花江上修建豐滿大壩，為此強徵了 10 餘萬中國勞工。這些勞工在工程中毫無安全保障，終日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卻要承擔超負荷的勞役。據不完



遭到日軍破壞的南京中華門一帶

全統計，至 1943 年 7 月，因修建豐滿大壩死亡的勞工人數已超過 6,500 人。而這僅是日軍迫害勞工的冰山一角。僅 1945 年一年，在東北被強徵的勞工就至少達 60 萬人。除了在佔領區實施殘酷虐待，日軍還將大量勞工輸送至日本本土做苦工。據相關研究者統計，從中國強徵至日本本土的勞工約 40,000 人，抵達時僅存約 39,000 人。這批勞工大多被迫從事採礦、挖渠等重體力勞動，日本工頭不僅稱他們為「亡國奴」，還實施殘酷壓榨。中國勞工每日工作 12 至 16 小時，許多人因凍、餓、疾病或監工虐殺而死亡。至日本戰敗時，死亡的中國勞工已超過 6,000 人。

4 日軍在根據地的暴行

日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實施了一系列殘酷暴行，其中尤以「三光政策」最為臭名昭著。「三光政策」是指日軍對華北等地區中國共產黨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時，實施「燒光、殺光、搶光」的策略；日軍稱之為「燼滅作戰」，「三光政策」是中共對日軍「燼滅作戰」目標和內容的概括。「燒光、殺光、搶光」指的是燒光所有房屋、殺光所有人、搶光所有財物，從而徹底摧毀抗日軍民生存的基礎。最早實施「三光政策」的是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岡村寧次繼任司令官後進一步發展、擴大了這一策略。

1940 年 10 月至 11 月，日軍在對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掃蕩」時接到命令：「這次作戰，與過去完全相異，乃是在於求得完全殲滅八路軍及八路軍根據地。凡是敵人地域內的人，不問男女老幼，應全部殺死；所有房屋，應一律燒毀，所有糧秣，其不能搬運的，亦一律燒毀；鍋碗要一律打碎，並要一律埋死或下毒。」根據這一命令，日軍於 10 月 19 日起在山西昔陽縣、和順縣「掃蕩」，殺害 2,000 餘人。10 月 22 日起，日軍在山

西沁源縣「掃蕩」15 天，燒毀了全縣 95% 以上的房屋，殺害約 5,000 人。

1941 年，日軍繼續執行「三光政策」，位於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腹地的潘家峪村慘遭屠戮。1 月 25 日，3,000 多名日軍和 1,000 多名偽軍包圍潘家峪，逼迫全村 1,500 多人集中在村裏的潘家大院等處，並將大院封鎖。隨後，日軍點燃了院內被澆滿煤油的柴草，並用機槍、步槍射殺赤手空拳的村民。在這場劫難中，潘家峪村共有 1,230 人被殺害，其中婦女兒童 658 名，23 戶家庭被殺絕，全部財物均被劫掠，1,235 間房屋被燒毀。

1942 年，隨着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軍進一步強化「三光政策」。自 5 月 1 日起，岡村寧次親自率領 5 萬餘日軍，在冀中根據地展開大規模「掃蕩」。5 月，日軍在饒陽縣殺害 3 萬餘人。同月，在定縣北疃村，



潘家峪慘案（雷燁 攝）

日軍向地道施放毒氣，全村 1,100 多人被毒死或被槍殺，逃出地道的婦女多被日軍姦殺。6 月，日軍在曲陽縣野北村殺戮 160 餘人，摔死嬰幼兒 9 人，殺光 8 戶人家。日軍的「掃蕩」作戰給根據地造成極大困難，冀中八路軍損失了三成的主力部隊，地方幹部損失三分之二。超過 2 萬名平民慘遭殺害，5 萬餘人被日軍擄往東北地區或日本做勞工。

1943 年，日軍實施「三光政策」力度達到頂峯。4 月，岡村寧次親率 2 萬餘日軍「掃蕩」冀南和冀北。9 月至 12 月，4 萬餘日軍和偽軍又「掃蕩」冀西。日軍「掃蕩」手段愈發殘忍，他們強迫村民在冰雪中赤裸站立至死，還強迫男性村民目睹婦女遭日軍姦殺。在冀西，日軍屠殺 6,000 餘人，燒毀房屋 5 萬餘間，掠奪糧食近 3,000 萬斤，掠走牲畜近 2 萬頭。12 月，日軍在「掃蕩」中突襲祕密轉移到河北阜平縣柏崖村的八路軍部隊。晉察冀軍區鋤奸部部長余光文率部突圍，其妻張立和



曾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鋤奸部部長的余光文，他的妻兒在柏崖慘案中被日軍殘殺

剛出生不久的小兒子被日軍俘獲。因張立堅決不肯說出八路軍的下落，日軍把尚在襁褓中的嬰兒扔進開水鍋中，並用刺刀捅死了張立。當天被殺害的八路軍官兵和平民達百餘名。

除了對華北抗日根據地實施「掃蕩」，日軍和偽軍還對南方各抗日根據地開展「清鄉」。1941 年，日軍為加強對華中、華南佔領區的統治，授意汪偽政府成立「清鄉委員會」，發動「清鄉運動」。在「清鄉運動」中，日軍和偽軍豎起籬笆、鐵絲網建立封鎖線，每隔數百米便修建碉堡，在交通路口設置檢問所，嚴密封鎖「清鄉區」，對抗日根據地進行全盤「清剿」。日軍還令偽警察和特工挨家挨戶搜捕抗日志士，並在淪陷區清查戶口，建立保甲制度，實行連坐。若發現民眾「與匪暗通消息」，即「處以極刑」。同時，日偽還在文化上進行奴化教育，鼓吹「中日提攜，共存共榮」，妄圖消除中國民眾的抗日意識。

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在「清鄉運動」中遭受嚴重損失。1941 年 7 月，日軍和偽軍出動 15,000 餘人開始在蘇南地區「清鄉」，由於缺乏反「清鄉」的準備與經驗，光是 8 月，新四軍至少損失有生力量 2,300 餘人。9 月，日軍和偽軍在蘇北建湖縣殺害村民 205 人，強姦婦女約 300 人，強迫 8,500 餘人充當勞工修築碉堡。1942 年 2 月至 3 月，日軍在蘇州吳江進行「清鄉」，被殺害的民眾不少於 1,700 人。1943 年，日軍「清鄉」重點轉至蘇中。3 月至 4 月，日軍連續發動三次大規模「清剿」。他們四處抓捕壯丁、姦淫燒殺、搶掠財物，還組織所謂「宣撫隊」，宣稱「『清鄉』是保護老百姓」、「只清新四軍不清老百姓」，企圖蠱惑人心。10 月，日軍和偽軍在江蘇南通「清鄉」，抓捕羣眾 500 餘人，其中 480 餘人慘遭殺害。1943 年，蘇北地區再遭「清鄉」，僅鹽城響水縣就有 1,671 人被害，2,607 人被抓壯丁，1,721 名婦女慘遭強姦，8,067 間民房被燒毀。

香港篇

國家飽受日軍鐵蹄摧殘十四年，香港亦未倖免。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歲月中，日軍在香港犯下滔天罪行，他們虐殺盟軍戰俘、殘殺游擊隊員以及香港民眾，大肆進行經濟掠奪，中國與盟國軍民遭受巨大痛苦。

1 虐殺戰俘

據劉智鵬、丁新豹、劉蜀永等學者研究，日軍攻佔香港期間，發生多起殘殺凌虐戰俘事件。1941 年 12 月 18 日，日軍攻佔西灣山炮台，將俘虜的 20 餘名香港義勇防衛軍官兵用刺刀殺害。12 月 19 日黎明，日軍在筲箕灣慈幼會修院屠殺多名英軍官兵和醫護人員。12 月 19 日晚至 20 日清晨，日軍在攻佔黃泥涌峽後，屠殺已放下武器的英軍和傷兵。12 月 23 日，日軍闖入淺水灣酒店，殺害了至少 15 名已經放下武器的英軍和加拿大軍官兵。

其中，最令人髮指的是聖士提反書院屠殺事件。香港戰役期間，聖士提反書院被英軍徵用作戰地醫院。醫院由軍醫伯南克上校（Col. Black）負責，他與軍醫雲妮上尉（Capt. Whitney）及 7 名護士，一同救治、照料被送到醫院的傷兵。在慘案發生前，超過 200 名傷兵被集中在書院的大禮堂接受治療。他們手無寸鐵，大多身受重傷、臥牀不起。書院的塔樓上懸掛鮮明的紅十字旗，外牆漆上碩大的紅十字標誌。1941 年 12 月 25 日凌晨，日軍攻進聖士提反書院，隨即實施屠殺。他們闖進禮堂後，每看見一張病牀，都用刺刀捅下去，將卧病在牀的傷兵

刺死。伯南克和雲妮兩位軍醫試圖向日軍說明情況，指明聖士提反書院此時是戰地醫院，要求日軍停止屠殺。然而，日軍非但沒有理會，反而將他們殺害。此後，日軍對可以走動的傷兵和醫院職員搜身，將他們趕進儲物室。晚上，日軍不斷將婦女帶出儲物室進行輪姦，他們甚至將傷兵的屍體當作墊子。戰地醫院護士長伊莉沙伯．費度（Elizabeth A. Fidoe）以及護士伯格（Mrs. Begg）、史密夫（Mrs. Smith）、畢斯頓（Mrs. Buxton）等多名英國和中國婦女慘遭玷污。同時，日軍槍殺了加拿大士兵軒達臣（E. J. Henderson）、麥凱（Mackay）等人，並大肆洗劫傷兵身上的財物，將手錶、戒指、金錢等掠走。12 月 26 日早晨，加拿大軍隨軍牧師巴萊特（James Barnett）親眼目睹了書院的慘況。他看到共有約 70 人被刺死在病牀上，向日軍抗議的伯南克上校和雲妮上尉屍體殘缺不全、支離破碎。麥凱、軒達臣橫屍於走廊和樓梯，雙眼、耳朵和舌頭均被割去，足見日軍屠殺手法之兇殘。

被關押在戰俘營和拘留營中的盟軍官兵和港英政府公職人員，生活環境極其惡劣，時常遭到日軍的虐待與殺害。在北角戰俘營與深水埗戰俘營，每間木屋最多能夠容納 60 至 70 名戰俘，卻被安排進約 130 名戰俘。木屋設計簡陋，廁所嚴重不足，戰俘甚至要在地上挖坑如廁。戰俘長期被囚禁在空氣不流通、漏水和擁擠的木屋中，導致戰俘營中疾病叢生。眾多戰俘罹患痢疾、白喉等病。深水埗戰俘營關押了 3,000 餘名戰俘，每月患上痢疾的戰俘一度達到 180 人。在香港，687 名戰俘感染白喉，其中 107 人死亡。1942 年，日軍還使用暴力，強制戰俘簽署違反《日內瓦公約》的「不逃走誓約」。日軍強迫 112 名拒絕簽署「誓約」的戰俘在營外過夜，並恐嚇和折磨他們。之後，日軍將仍拒絕簽署「誓約」的戰俘送到赤柱監獄囚禁。



1945 年，赤柱拘留營裏瘦骨嶙峋的俘虜

此外，日軍未經審判即處決出逃戰俘。1942 年 8 月，加拿大軍 4 名戰俘出逃後被日軍抓獲。日軍在對 4 人拷問、毆打後，將他們全部處決。9 月，日軍在深水埗戰俘營發現英軍戰俘布蘭遜（V. Branson）、拜恩（W.G. Byrne）、康納利（P. Connely）、史度沃（J. Stoppworth）和鄧尼（M. T. Dunne）挖掘地道試圖逃走。日軍審問後，於 9 月 14 日將他們全部處決。事實上，日軍《懲處戰俘規例》規定，假如一批戰俘逃走，只有主謀的最高刑罰為死刑，其餘同謀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

佔領期間，日軍強迫戰俘在危險、惡劣的環境下從事他們體力不能勝任的工作，還將他們直接送到日本本土充當苦力。這直接導致了「里斯本丸號」慘案的發生。1942 年 9 月 25 日，日軍將 1,816 名囚禁於深



滿載盟軍戰俘的「里斯本丸號」傾斜沉沒

水坉戰俘營中的盟軍官兵押上「里斯本丸號」客貨輪運往日本，全體戰俘被迫擠在 3 個狹小的貨艙內。兩天後，「里斯本丸號」啟程，並在 10 月 1 日駛經浙江舟山對開海面。由於船隻沒有設置運送戰俘的標誌，美國海軍的一艘潛艇誤將其當作敵船並發射魚雷，「里斯本丸號」被魚雷擊中。當天下午，日本海軍轉移了船上的日本官兵，並將船隻拖到淺水區。為防止船上的盟軍戰俘集體逃亡，日軍用木板和防水布堵住了所有艙口。10 月 2 日，「里斯本丸號」沉沒，日軍不但見死不救，還槍殺企圖逃脫的戰俘。當地中國漁民自發駕駛漁船出海，奮勇救起 384 名戰俘。由於擔心事情敗露，日本海軍也不得不打撈戰俘。在「里斯本丸號」慘案中，828 名盟軍官兵葬身大海。

2 殘殺平民

香港淪陷期間，日本憲兵隊是虐殺平民的主要罪魁禍首，他們常常採用灌水、火燙、電刑、夾棍、「吊飛機」、跪刑、鞭打、斬首、拔指甲等酷刑，迫害殘殺平民。以下，根據《日軍在港戰爭罪行：戰犯審判紀錄及其研究》、《從英國陸軍部檔案看日軍在港戰爭罪行》等論著內容，敍述相關情況。

1943 年 9 月 8 日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九龍地區憲兵隊曾多次濫用酷刑，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將被捕平民帶到京士柏公園斬首。1944 年 6 月 8 日，市民陳勝被日軍逮捕，隨後被拘留在九龍地區憲兵部近 3 個月時間。他因而成為一系列暴行的目擊者。陳勝在被捕一個多月後的一天，看見日軍腰懸佩劍，攜帶十字鎬和泥鏟，從囚室中帶走了 7 個平民。被捕者十分瘦弱、臉部浮腫。其他被捕者詢問憲兵要將這些人帶到哪裏，憲兵說，這些人將被斬首。在一兩個小時後，憲兵返回九龍地區憲兵部。陳勝看見，憲兵的衣服、十字鎬和泥鏟上都帶有泥土，但再沒有看到那 7 名被捕者。據說，7 人被日軍指控在大埔派發反日傳單，但他們否認指控；在未經正式審訊的情況下，憲兵還是將 7 人斬首處決。不久之後，日軍又將九龍地區憲兵部內一名常因疼痛而發出叫聲、可能患病的被捕者帶往京士柏公園斬首。1944 年 6 月 8 日，市民吳勤被日軍拘捕到西區憲兵部，隨後被囚禁 40 多天。日軍對他施以鞭刑和灌水，還強迫他跪在佈滿螺絲釘的地上。日軍將重物壓在他的大腿上，逼迫他在釘板上行走，令他極其痛苦。

香港淪陷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港九大隊在新界展開游擊戰。為了「清剿」游擊隊，日軍常在新界進行大規模「掃蕩」，拘捕大批村民

並施用酷刑，逼迫他們供出有關游擊隊的情報，不少村民因此致殘甚至死亡。1944 年 9 月，日軍九龍地區憲兵隊台籍翻譯林台宜在西貢被游擊隊俘虜，日軍因此在西貢的黃毛應、大藍湖、界咸、蠔涌、大洞、南圍等村進行了大規模的抓捕。界咸村村民李業、尹新奇、劉牛、劉寧、謝佑芳等人被憲兵毆打致死。村長謝恩亦被日軍抓捕，審問期間，他被殘忍地毆打。在日軍的折磨下，謝恩口吐鮮血白沫，左臂骨被打斷，斷骨穿出皮膚，謝恩最終在兩小時後死亡。

1944 年 11 月 7 日，黃毛應村村民鄧戊奎、鄧福、鄧寅發、鄧安、鄧新奎、鄧三秀、鄧石水等人被日軍逮捕，並被帶到村口的教堂接受審問。鄧戊奎稱黃毛應村附近沒有游擊隊，隨即被日軍連續掌嘴，並被竹竿打倒在地。隨後，日軍踩着鄧戊奎的四肢和腹部，將竹竿猛插進他的口中。日軍還將鄧戊奎懸掛在教堂的樑柱下，並在其下方焚燒雜草。當鄧戊奎全力掙扎從高處跌落後，再遭日軍毒打，隨後又被日軍吊起，如此重複 5 次，歷時半小時。鄧戊奎的雙腿被燒傷，一度無法行走。與他一同被捕的村民同樣承受了非人的酷刑。鄧福的脊椎嚴重受傷，鄧安被嚴重燒傷而死亡。

1944 年 3 月，大埔憲兵派遣隊的兩名印籍憲查被游擊隊抓走。5 月，屬於該隊的元州哨站遭到游擊隊襲擊，10 月，該隊的一名翻譯被抓走，日軍因而在大埔展開圍捕。12 月 28 日，大埔南華莆村村民鄭保、鄭貴、林華、林僑惠、林寵錫、林瑞祺、林僑章等人被拘捕，受到嚴刑拷問。鄭保是南華莆村村長，審問期間，他被施以灌水之刑，又被日軍用磚頭砸傷腿部，日軍還用電線綁住他的腳拇趾不停拖拉。鄭保受盡折磨返回囚室後，告訴被捕村民不能承認自己是游擊隊員，否則整個村都會被日軍殺光。第二天，他再次被審訊折磨，並在十餘天後死去。他的遺體被日軍隨意丟棄在林村河旁。

1945 年 6 月 16 日，九龍地區憲兵隊在元朗八鄉附近拘捕游擊隊隊員。日軍先拘捕了上村村長杜月強，又搜查了村民范國良的住所，然後將兩人帶到蓮花地村。日軍指控范國良私藏槍枝、窩藏共產黨，而杜月強則被指控為游擊隊隊員。日軍對二人殘酷折磨後，勒令在場村民排成一行，目睹杜月強被斬首的過程。日軍將杜月強的頭顱砍下，並向其屍體連開六七槍。范國良則被日軍打暈，直到兩小時後才恢復意識。此時日軍已離開，他得以倖免。

1945 年 8 月 19 日至 8 月 26 日，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英軍重佔香港前，大嶼山銀礦灣地區又發生了一系列慘案。日軍藉口搜查游擊隊，屠殺和虐待當地村民。當時整個銀礦灣地區僅有 500 多名村民，被日軍逮捕的接近 300 人。日軍隊長岸保夫用柴枝擊打長老曾壽、林福的頭部和背部，但二人始終沒有供出游擊隊下落。岸保夫命令士兵在沙灘上挖坑，再將曾壽、林福二人押至坑邊，將他們捆綁起來，蒙上雙眼。在眾人面前，岸保夫親手用軍刀將曾壽和林福斬首，再將他們的屍首推入坑中草草掩埋。之後，日軍開始審問銀礦灣村民。他們將所有被捕的男性村民捆綁起來，施用各種酷刑，企圖逼迫他們承認自己是游擊隊員。從 8 月 20 日開始，日軍逐步釋放村民。然而，日軍仍將他們認為有嫌疑的村民綁在涌口灘游泳棚的柱子上，這些村民長時間暴曬在烈日之下，極為痛苦。8 月 21 日晚，日軍突然指控村民蘇保華等人是游擊隊員，將蘇保華等人斬首。8 月 22 日，岸保夫率領 20 多名日軍「掃蕩」牛牯塱村。8 月 23 日，岸保夫再次率領日軍「掃蕩」牛牯塱村，焚毀村中 20 間房屋。直到 8 月 26 日，駐大嶼山的日軍從梅窩撤退，被囚禁的村民才重獲自由。在銀礦灣慘案中，長老曾壽、林福、村民蘇保華、林權、商人梁東昌慘遭斬首，村民曾水娣、林贊和女傭任有遭槍擊身亡，林本泰等 3 人被強徵充當船夫後失蹤。

日軍在佔領期間強徵「慰安婦」，在灣仔駱克道一帶設立多個「慰安所」。此外，日軍還隨意拘捕市民並將他們押解出境，導致大量平民傷亡。全面抗戰爆發後，香港人口因難民湧入激增，1941 年底達到 160 餘萬人。日軍將大量城市人口視作負擔，並在佔領期間執行「歸鄉政策」，強迫市民返回中國內地。1942 年 1 月，日本佔領當局成立「歸鄉指導委員會」，每月都安排火車和輪船，將市民運離香港。政策實施後，歸鄉市民人數遠未達到日本佔領當局目標，1942 年年中，日本憲兵隊開始在街上抓捕平民，強迫他們歸鄉。1944 年底至 1945 年初，日軍更加嚴厲地執行拘捕政策，甚至有憲兵在街上隨意用繩圍捕市民。無論這些被捕市民在香港是否有職業、衣着是否體面，都一律被囚禁在難民營等候遣返。許多香港市民在歸鄉途中，被迫與家人離散，遭受飢餓、疾病、搶劫等折磨。一些市民甚至被日軍丟棄在荒島或海上。日軍對老弱病殘者沒有絲毫同情之心，在歸鄉途中，有日軍將他們殘忍殺害，或直接推入大海淹死，歸鄉之路變成了「死亡之路」。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時，香港人口已驟降至約 60 萬人。

3 經濟掠奪

日本佔領香港的目的，是將香港打造為支援太平洋戰爭的後勤基地。淪陷期間，香港百業蕭條，港口為日本軍事需求提供服務，船塢用於修理日本軍艦，醫院主要收治各地運來的日本傷兵，香港原有的許多工業企業成為日本軍需工廠。1942 年 1 月，日本佔領當局向東京提出《香港九龍金融應急對策綱要》，當中指出，當前首要目標是將同盟國在香港的銀行、錢莊及重要企業資產「充公」。為此，日本在香港採取多種手段進行經濟掠奪。根據《簡明香港史》等論著，相關情況如下所述。

第一，吞沒銀行資產。戰前香港共有 47 家銀行，日本佔領當局准許一些華資銀行復業，並將其控制在日本人或親日人士手中。倒閉華資銀行的資產則被日本人控制或侵吞。另外，日本佔領當局指使日資銀行，例如橫濱正金銀行、日本台灣銀行等，對西方交戰國家在香港的銀行進行「清算」，獲取大量「可兑換貨幣」。

第二，發行軍用手票。軍票是日本發軍餉用的貨幣，它與日圓不同，沒有準備金，只印刷一面，無編號，發行數額不確定，匯率由日軍自行決定。日本佔領當局通過在香港發行軍票，掠奪市民財產。1942 年 1 月，日本佔領當局規定 2 港元兑換 1 元軍票，港元與軍票同時流通。同時，日本人散佈謠言，稱將不承認 10 元以上的港元，大額港元因此大幅貶值。1942 年 7 月，日本佔領當局變本加厲，將港元和軍票的兑換率改為 4 兑 1，並於 1943 年 6 月起硬性規定軍票為香港唯一「合法」的交易單位，港元和其他貨幣一概禁止流通，私藏港元屬違法行為。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為止，共有超過 19 億元的軍票在香港市面流通。日本投降後，所有的軍票一夜之間變為廢紙，港元恢復成為香港法定貨幣，很多持有軍票的香港市民因此失去全部財產。

第三，掠奪大量物資。日本佔領當局將儲存在香港貨倉中的貨物悉數封存，奪取用於戰爭的物資。他們還對香港多種物品實行交易管制，禁止自由買賣，不少存貨成為管制品不得提取，許多香港工商業者無法繼續經營。日軍還在香港發起「獻銅運動」，維多利亞女王銅像、滙豐銀行大廈門外的兩尊銅獅都被運往日本本土，計劃作為金屬資源熔掉。日軍還大規模砍伐林木，使香港多處水土流失，自然生態遭受嚴重破壞。



香港市民被迫去軍票兑換所的擁擠場面

第四，壟斷對外貿易。日本佔領當局通過種種措施，使日資企業控制了香港的商貿活動。1942 年 10 月，日本在香港設立「香港貿易組合」，規定只有該組織成員，才能從事廣東、廈門、澳門和廣州灣地區以外的貿易。當時，82 家加入香港貿易組合的公司全是日本企業，華商若要參與這些貿易，只能與日資公司合作。

第五，奪取重要企業。日本佔領當局以「接管」方式，強行奪取香港的大小船塢與工廠。太古船塢被日本三井株式會社接管，更名為「香港造船所」。黃埔船塢被日立造船株式會社接管，更名為「九龍造船所」。牛奶公司、屈臣氏等英資企業都被日本以各種形式「接管」或控制。

第三章

抵抗



國家篇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中國人民奮起抗爭。從東北大地的局部抗戰燃起抵抗烽火，到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浪潮迭起，直至華北事變後民族危機到了「最後關頭」。1937 年七七事變爆發，全民族抗戰的號角終於吹響。無數抗日志士以血肉之軀築成鋼鐵長城，在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同日寇展開殊死搏鬥，彰顯了中華民族堅忍不拔的頑強意志，表現了中國人民在危難時刻團結一心、眾志成城的抗爭精神。

1 局部抗戰時期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起，到 1937 年七七事變為止，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局部抗戰時期。愛國軍民在東北、華北、上海等地區進行英勇抵抗，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速興起，為全民族抗戰奠定了堅實基礎。

江橋抗戰是中國軍隊有組織、有領導地抵抗日本侵略者打響的第一槍。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軍迅速攻佔遼寧、吉林，黑龍江形勢危急。1931 年 10 月 22 日，代理黑龍江省主席、軍事總指揮馬占山表示，若日軍侵入黑龍江，誓必拚死一戰。11 月 4 日，日軍 4,000 餘人向江橋發動進攻，被守軍頑強擊退。11 月 6 日，日軍增調部隊萬餘人，在飛機、坦克的支援下再度發動猛攻。馬占山親赴前線指揮，但孤軍奮戰，彈藥告罄，守軍被迫撤退。11 月 17 日，日軍調集包括第 2 師團主力在內的全部增援部隊向中國守軍發起總攻，戰鬥持續到 18 日下午。在彈

盡糧絕、孤立無援的情況下，馬占山被迫率部撤退。11 月 19 日，日軍侵佔齊齊哈爾。江橋抗戰雖以失敗告終，但它重創了日軍和偽軍，僅日軍就傷亡 700 餘人。

此外，東北愛國軍警及廣大人民羣眾紛紛組建「愛國軍」、「自衛隊」進行抵抗。這些抗日武裝被統稱為「東北抗日義勇軍」（簡稱「義勇軍」）。到 1932 年夏季，義勇軍在僅僅半年多的時間裏就發展到 30 餘萬人。至 1932 年末，義勇軍攻克縣城 40 餘座，還對瀋陽、長春、吉林、哈爾濱等城市的日軍和偽軍發動進攻。義勇軍通過頑強抵抗，給日軍和偽軍造成大量傷亡，有效牽制了日本的侵略擴張。但是，義勇軍沒有統一編制，缺乏領導與裝備，在日軍血腥鎮壓下遭受重創，於 1933 年基本瓦解。



堅持抗日的東北抗日義勇軍

危難時刻，中國共產黨指明東北抗戰的方向。1933 年 1 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滿洲省委發出《一二六指示信》，要求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同日本帝國主義做鬥爭。根據這一指示，中共滿洲省委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義勇軍為基礎，組建了「東北人民革命軍」。到 1933 年底，中共直接領導的各地游擊隊已發展為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主力。1936 年 2 月，為配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東北各抗日武裝力量被陸續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簡稱「抗聯」)。從 1936 年初到 1937 年秋，抗聯已發展到 11 個軍共 3 萬餘人，開闢了東南滿、吉東、北滿三大游擊區，與日軍和偽軍進行數千次戰鬥並粉碎多次「討伐」。抗聯沉重打擊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統治，鼓舞了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

發動九一八事變後，1932 年 1 月 28 日晚，日本海軍陸戰隊對上海閘北發動全面進攻，「一・二八事變」爆發。第 19 路軍在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指揮下奮起抵抗，在閘北、江灣、吳淞一帶與日軍激戰。危急關頭，國民政府派遣以張治中為軍長的中央軍精銳第 5 軍增援第 19 路軍。2 月 20 日至 22 日，日軍向上海廟行鎮發動總攻。第 5 軍在張治中親自指揮下，浴血奮戰三晝夜，擊退日軍多次進攻，取得「廟行大捷」。3 月初，日軍趁守軍兵力分散之機，在瀏河偷襲登陸，中國軍隊被迫退守蘇州、昆山、嘉定一帶的第二道防線。5 月，中日雙方簽署停戰協定。「一・二八事變」中，日軍投入第 9、11、14、8 四個主力師團及海軍陸戰隊共 77,000 餘人，而中方軍隊僅有 42,000 餘人。日軍三次換帥，卻鮮有進展。中國軍隊堅守 30 餘天，粉碎了日軍「4 個小時佔領上海」的狂妄叫囂。「一・二八淞滬抗戰」給予日軍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最沉重的打擊。

1933 年 3 月初，熱河省城承德淪陷，日軍分兵向長城各口進發，長城抗戰爆發。3 月 9 日，日軍攻擊喜峯口守軍。宋哲元第 29 軍先頭



第19路軍在閘北與日軍進行激烈巷戰

部隊趕到，並於當晚組織大刀隊發起攻擊，奪回了制高點。隨後兩天，第 29 軍與日軍展開激戰。宋哲元再度利用大刀隊夜襲日軍，成功守住喜峯口。此役守軍共殲敵 700 餘人，取得了長城抗戰的首個勝利。在羅文峪、冷口、界嶺口等關隘，中國守軍頑強抵抗，並成功守住陣地。3 月下旬，日軍主力部隊向駐守冷口的商震第 32 軍發起攻擊。4 月中旬，商震部防線被擊破，全軍退至灤河左岸，長城防線告破。5 月中下旬，長城全線失守。

日軍侵佔熱河後，進一步侵犯察哈爾，陸續攻陷多倫、寶昌等地。1933 年 5 月，馮玉祥召集愛國將領吉鴻昌、方振武等，組建「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決意「結成抗日戰線，武裝保衛察省，進而收復失地，求取中國之獨立自由」。從 6 月下旬至 7 月初，同盟軍收復康保、

寶昌、沽源、多倫等地，殲滅日軍和偽軍 1,000 餘人。這是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首次收復失地。然而，由於同盟軍與中共團結合作，國民政府對馮玉祥軍事施壓，加之日軍重新進逼，同盟軍被迫解散。

1935 年 5 月開始，日本對華北地區採取「漸進蠶食」手段，華北面臨被肢解的局面，北平已成「危城」。華北事變激起了全國各界民眾、尤其是北平學生的義憤。11 月，中共地下黨員在北平聯合各個大中學校學生，成立「北平市學生聯合會」（簡稱「北平學聯」）。此時，國民政府在日本壓力下，準備採取妥協方針。12 月 9 日，北平學聯組織學生發起「一二．九運動」，北平各大中學校上千名愛國學生舉行請願示威，提出反對華北自治運動、停止內戰、立即釋放被捕學生等要求。學生在遊行中高喊「反對華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口號。遊行隊伍來到王府井南口時，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30 多名學生



「一二．九運動」中，北平愛國學生的遊行隊伍

受傷。北平各校學生羣情激憤，清華大學救國會發表《告全國民眾書》，宣稱：「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幾天內，數十所學校成立自治會或學生會，多數學校在北平學聯號召下宣佈罷課。12 月 16 日，在北平學聯組織下，北平學生和市民在天橋召開大會並舉行示威遊行，遭到軍警鎮壓，約 300 人受傷，30 餘人被捕。「一二・九運動」得到全國人民支持，抗日救亡運動掀起新高潮。12 月 19 日，上海復旦大學、光華大學、大夏大學等校學生舉行遊行，要求政府保護領土主權完整，保障言論、集會自由。12 月 21 日，上海發起「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組織近千名婦女上街聲援學生愛國運動。同期，南京、蘇州、杭州、武漢、長沙、廣州、西安、太原等地學生也相繼舉行遊行或罷課。

1936 年 5 月至 6 月，全國 20 餘省市 60 多個救亡團體及第 19 路軍代表共 70 餘人在上海召開會議，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救國會」）。會議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等 40 餘名愛國民主人士和愛國知識份子為執行委員。救國會在上海、南京、西安以及兩廣和香港等地組織了大規模的救亡運動。毛澤東兩次致函救國會領導人，充分肯定他們的抗日救國主張，表示願同救國會「在各方面作更廣大的努力與更密切的合作」。然而，由於救國會在全國的影響日益擴大，且「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救國主張與國民政府的反共政策相衝突，11 月下旬，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等 7 人，史稱「七君子事件」。救國會「七君子」被捕，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巨大震動。宋慶齡率先出面組織營救，對國民政府提出強烈抗議。馮玉祥、于右任、李烈鈞等 20 餘位愛國將領和官員聯合致電蔣介石，要求其「鄭重處理」。杜威（John Dewey）、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等國際友人致電聲援「七君子」。中國共產黨發表《對沈、章諸氏被起訴宣



被釋放出獄的「七君子」

言》，讚揚沈鈞儒等「為我中華男女之應盡責任與光榮模範」，譴責國民黨製造冤獄。七七事變爆發後，「七君子」被國民政府釋放出獄。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等進步文化團體，積極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左翼文化團體創辦了《萌芽月刊》、《北斗》、《前哨》、《文化月報》、《文學》、《生活週刊》等刊物，宣揚抗日救國主張。1935 年，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與蕭紅的《生死場》兩部抗戰小說問世，引起轟動。電通、明星、聯華、藝華等左翼電影公司拍攝了《桃李劫》、《風雲兒女》、《春蠶》、《生死同心》、《大路》、《共赴國難》、《民族生存》等抗日電影，反響強烈。田漢、聶耳為電影《風雲兒女》創作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一經唱響便迅速傳遍大江南北，極大鼓舞了中國人民的



電影《風雲兒女》海報

抗戰熱情。此外，《松花江上》、《大刀進行曲》、《打回老家去》、《保衛國土》等抗日救亡歌曲廣為傳唱，深受中國軍民喜愛。

日本蠶食華北，嚴重動搖國民黨統治根基，加之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浪潮持續高漲，國民黨對日政策開始轉變。1935 年 11 月，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大會宣言公開表示：「在和平未至完全絕望之時，絕不放棄和平，如國家已至非犧牲不可之時，自必決然犧牲，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對和平為最大之努力。」此次會議後，國民政府着手全面備戰。1936 年 7 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召開，宣告成立國防會議。會上，蔣介石公開表示：「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

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損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這番表態，進一步展現出國民黨在抗日態度上的轉變。在此背景下，綏遠抗戰爆發。1936 年 11 月，日本關東軍指揮偽蒙軍及其他偽軍，向綏遠發起進攻，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率部奮起抵抗，經過數天激戰成功守住陣地。11 月 23 日，中國軍隊成功夜襲駐守在百靈廟地區的日軍，殲敵 1,300 餘人。12 月初，中國軍隊再度粉碎日軍和偽軍對百靈廟的反攻，並收復了日軍和偽軍根據地錫拉木楞廟。綏遠抗戰三戰三捷，以中國守軍的勝利而告終。

局部抗戰時期中國軍民的抵抗，如江橋抗戰、「一・二八淞滬抗戰」、長城抗戰等，大多以國民政府的妥協或失敗告終，但中國軍民表現出高昂鬥志與不屈精神，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激發了中華民族的抗戰決心。在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5 年 8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組織「全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會議，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1936 年 12 月，國民黨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為迫使蔣介石停止「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西安發動「兵諫」扣留蔣介石。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等人努力下，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為實現全民族抗戰奠定了基礎。

2 戰略防禦階段

以 1937 年 7 月 7 日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為標誌，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進入全面抗戰時期，1937 年至 1945 年的八年全面抗戰大致可分為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

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向宛平縣城發動攻擊，宋哲元部第 29 軍奮起抵抗。7 月 26 日，日方向中方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軍隊在限期前撤出北平。未待中方答覆，日軍便向通縣發起總攻，第 29 軍各部奮勇抵抗，但不敵日軍。7 月 28 日，日軍攻佔南苑，宋哲元被迫率部撤往保定，北平淪陷。同時，中日兩軍在天津激烈交戰。7 月 30 日，天津淪陷。

七七事變激發了全民族的抗戰熱情。1937 年 7 月 8 日，中國共產黨向全國發出通電，提出「只有實行全民族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7 月 17 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演講，指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9 月 22 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提交的《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提出「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按照國共合作的相關協議，8 月 22 日，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後改稱「第 18 集團軍」），朱德、彭德懷分別任正、副總指揮。10 月中旬，南方湘、贛、閩、粵、浙、鄂、豫、皖共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葉挺、項英任正、副軍長。八路軍、新四軍成立後，即開赴抗日前線。

9 月下旬，日軍進犯山西平型關。9 月 25 日，八路軍第 115 師在平型關東北長約 13 公里的公路旁伏擊。日軍進入伏擊圈後，兩軍展開激烈交火。八路軍英勇作戰，1,000 餘名日軍進退不能，大部分被斃傷，少部分殘軍突圍。第 115 師還繳獲大量軍用物資。平型關大捷是全面抗戰以後中國軍隊取得的首次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平型關戰役中，八路軍戰士奮勇殺敵

中日兩軍在華北激戰的同時，戰火又在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燃起。8 月 13 日，中國軍隊第 87 師、第 88 師與日本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在上海八字橋一帶交火，淞滬會戰爆發。8 月 14 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表示：「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上海戰局一度僵持，中日雙方持續增兵，互有攻守。9 月 12 日起，中國軍隊轉入守勢作戰，在北站、劉行、羅店、瀏河鎮一線抗擊日軍。9 月中旬，抵達淞滬的日軍已約 10 萬人，另有火炮 300 餘門、戰車 200 餘輛。中國守軍逐屋爭奪，以英勇的抵抗遲滯日軍推進，戰況極為激烈。9 月中旬至月底，日軍向羅店以西、以南只推進了約 3 公里。9 月下旬至 10 月 1 日，日軍增援的

3 個師團抵達上海。10 月初，日軍強渡蘊藻浜，並向蘇州河推進，中國軍隊逐步退守蘇州河南岸。10 月 26 日，第 88 師 524 團團附謝晉元率該團官兵 400 餘人，進入閘北四行倉庫堅守。當時為迷惑日軍，守軍號稱 800 人，因此被稱為「八百壯士」。守軍與日軍激戰四天四夜，擊退 6 次圍攻，掩護大部隊安全轉移，完成後退入上海公共租界。11 月初，日軍從金山衛登陸，完成對中國軍隊合圍，上海守軍被迫撤退。11 月 12 日，日軍佔領上海除租界外全境。淞滬會戰極其慘烈，中國軍隊傷亡約 25 萬至 30 萬人，日軍傷亡約 6 萬至 9 萬人。中國軍人浴血奮戰，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叫囂，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同情與尊重。

南京淪陷後，日軍侵略規模進一步擴大。1938 年 1 月，徐州會戰爆發。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率部頑強抵禦日軍進攻。3 月中旬，日



堅守台兒莊的中國軍隊

軍在佔領棗莊後，向台兒莊侵襲。李宗仁命令第 2 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固守台兒莊。自 3 月 24 日至 4 月 3 日，台兒莊守軍與裝備佔優的日軍機械化部隊展開激戰，池峯城部官兵與日軍展開肉搏戰、巷戰，成功抵禦了日軍的攻勢。4 月 3 日，李宗仁下達總攻擊令，中國守軍發動全線總攻，重創日軍精銳瀨谷支隊、坂本支隊，日軍殘部向北潰退。台兒莊大捷，是全面抗戰初期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取得的重大勝利，殲滅日軍 8,000 餘人，增強了全國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心。5 月 19 日，中國軍隊在被合圍的情況下主動撤出徐州，日軍未能達成在徐州地區圍殲中國軍隊的企圖。

1938 年 6 月，武漢會戰爆發。為保衛武漢，國民政府集結約 100 萬軍隊，投入作戰飛機約 200 架、艦艇 30 餘艘，確立「戰於武漢之遠方，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的作戰方針。9 月 21 日，日軍第 106 師團孤軍深入江西德安萬家嶺地區。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兼第 1 兵團總司令薛岳集結 3 個軍的兵力，將該師團合圍。第 106 師團陷入絕境，只能靠飛機空投糧食彈藥支撐，並試圖等待第 27 師團解圍。10 月 6 日，薛岳下達總攻擊令，至 10 月 10 日，中國軍隊共殲滅日軍第 27、第 101、第 106 等師團數千人，取得「萬家嶺大捷」，延緩了日軍進攻武漢的步伐。10 月底，日軍完成對武漢合圍，中國守軍被迫棄守。武漢會戰歷時近 5 個月，斃傷日軍近 4 萬人，打破了日軍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妄想。武漢淪陷之前的 10 月 21 日，廣州淪陷，廣州、武漢的相繼淪陷，標誌着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蔣介石發表《我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表示：「望吾國軍民，共矢持久之決心，執行全面攻擊之戰略，不屈不撓，戮力奮鬥！」

在戰略防禦階段，中國海軍和空軍英勇抗敵。當時，中國軍隊海空



德安（萬家嶺）守軍奮勇抵抗日軍

力量十分薄弱，日本海軍兵力超過中國 30 倍，戰機數量為中國 8 倍以上。然而，中國海空部隊不畏強敵，不懼犧牲，為抗日戰爭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1937 年淞滬會戰期間，為封鎖長江航道，阻止日艦西上，海軍總司令陳紹寬在江陰部署封鎖線，先後沉下大小軍艦及商輪 35 艘並佈設水雷。從 8 月 16 日開始，中國海軍在江陰封鎖線抵禦日軍進攻近 3 個月，以失去幾乎全部主力艦隻的慘痛代價，守護了淞滬前線中國守軍的側翼。武漢會戰期間，海軍投入 40 餘艘艦艇參加會戰。陳紹寬先後以「咸寧」、「永綏」、「江犀」等軍艦為旗艦，親自指揮戰鬥。1938 年 4 月，2 艘日艦觸水雷沉沒。6 月 22 日，日軍接近馬當要塞，守軍炮台擊沉日軍汽艇 3 艘。同時，為加強武漢上游荊河、湘江防衛，中國海軍以城陵

磯為重心，組建洞庭湖區炮隊，各處佈雷，並在金口、城陵磯、岳陽等處配備艦隊，以固後防。10 月 24 日，「中山」、「楚同」、「楚謙」、「勇勝」等軍艦遭日機空襲，「中山艦」官兵傷亡慘重。艦長薩師俊被炸斷雙腿，仍堅持指揮戰鬥，最終壯烈殉國，「中山艦」沉沒。武漢失守後，中國海軍在長江、荊河、洞庭湖、贛江、鄱陽湖、甌江、鰲江、閩江、西江等水域密佈水雷，阻擊日軍船艦、截斷交通、配合陸軍作戰。

中國空軍在戰略防禦階段做出重要貢獻。淞滬會戰中，中國空軍對日軍艦船與據點進行轟炸。1937 年 8 月 14 日下午，日軍空襲筧橋機場。中國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高志航率部迎戰，擊落轟炸機 3 架，中國軍機無一損傷，取得抗日空戰的首次勝利。8 月 15 日、16 日，中國空軍繼續迎戰，在 3 日內擊落日機 40 餘架。日軍精銳航空隊損失慘重，



中國「寧海號」巡洋艦。該艦在江陰作戰中浴血奮戰，擊落日機4架，後中彈下沉

不得不儘量改在夜間攻擊，避開中國戰鬥機。8 月 14 日至 31 日，中國空軍出擊 67 次，空戰 12 次，擊落日機 61 架，損失飛機 27 架，取得豐碩戰果。9 月至 11 月上旬，日軍逐漸取得制空權。中國空軍補給困難，但仍不斷發動攻擊，擊落日機數十架。太原會戰中，日軍號稱「驅逐之王」的三輪寬少佐，於 9 月 21 日率戰機 15 架空襲太原。中國空軍第 28 中隊中隊長陳其光率部迎戰，擊落三輪寬座機。9 月 16 日至 10 月底，中國空軍進行了 12 次偵察、42 次轟炸，擊落敵機 3 架、擊傷 1 架，有效支援了陸軍的作戰。1938 年 2 月 18 日，日機突襲漢口。中國空軍第四大隊擊落日機 14 架，大隊長李桂丹等 5 人壯烈殉國。4 月 29 日，武漢再度發生空戰。中國空軍第 4 大隊少尉飛行員陳懷民的座機多處中彈，難以操縱。他迎面撞向日機，與敵同歸於盡。武漢會戰期間，中國空軍共炸沉日軍艦船 23 艘，擊落日機 62 架，炸毀 16 架。5 月 19 日夜至 20 日凌晨，中國空軍第 14 中隊中隊長徐煥升、第 19 中隊副隊長佟彥博等駕駛轟炸機飛臨日本本土上空，空投《告日本國民書》等數百萬張傳單並安全返航。這是日本本土首次受到外國軍機空襲，中國空軍的「人道遠征」在政治、心理上給予了日本侵略者沉重打擊。

全面抗戰爆發後，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域，國民政府於 1937 年 10 月決議遷都重慶。同時，為迅速實現平時經濟向戰時經濟的轉軌，形成戰爭保障能力，國民政府決定對廠礦進行內遷。七七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着手將山東、安徽、河南、河北、江西等地的國營廠礦遷往內地。7 月 24 日，資源委員會提出沿海工業內遷問題，8 月 11 日，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成立。在政府號召下，上海各廠家紛紛響應。到 12 月上旬，上海共已遷出民營工廠 146 家。內遷工廠初期集結地為武漢，一部分工廠經武漢遷往四川，另一部分工廠則直接在武漢建廠復工。1938 年，武漢戰事告急，原本留駐武漢的工廠進一步遷往西南各



中國空軍編隊

省。1940 年底，工礦內遷基本完成，根據行政院報告，經政府協助而內遷的廠礦共 448 家，技術員工 12,080 人，機器材料 70,900 噸，其中屬國防工業範圍的廠家達 60% 以上。沿海工廠內遷保存了中國有限的工業力量，促進了內地工業的發展，為堅持長期抗戰做出了重要貢獻。

為保護高等教育資源、培養人才，國民政府決定對高等院校實行內遷。1937 年 8 月，國民政府頒佈《戰區內學校處置辦法》。1938 年，全國戰時教育協會成立，負責高校遷建工作。1937 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往長沙，合組為長沙臨時大學。1938 年春，因長沙屢遭轟炸，該校遷往昆明，更名為西南聯合大學。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之一部遷至西安，組成西安臨時大學。1938 年 3 月，該校遷往漢中，更名為西北聯合大學，後又改名西

北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等遷往四川，中山大學、同濟大學、華中大學等遷往雲南，浙江大學、湘雅醫學院等遷往貴州。嶺南大學遷往香港。高校西遷保存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為戰時與戰後的中國培養、儲備了一大批優秀人才。

3 戰略相持階段

隨着 1938 年 10 月廣州、武漢的淪陷，日本已佔領中國主要城市和經濟較發達地區。中國人民堅持抗戰，大量消耗了日本的軍事力量和經濟資源。由於戰局擴大、戰線延長，日本用於中國戰場的軍力已接近極限，不得不停止發動大規模戰略進攻，轉而採取以保守、鞏固佔領區為主的方針，抗戰進入漫長而艱苦的相持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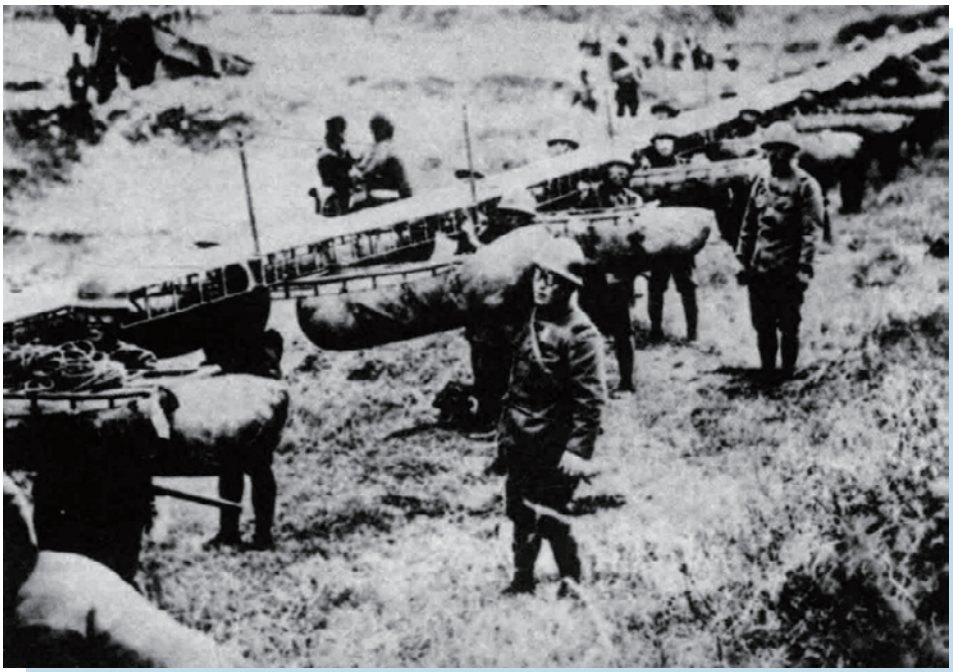
1938 年 11 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南嶽衡山召開軍事會議，對抗戰作出新的部署，重申繼續實施持久作戰的方針，採取轉守為攻、牽制消耗敵人的戰術，粉碎日軍「以華制華」陰謀。會議將全國戰區重新調整劃分：第一戰區，包括河南省北部及安徽省北部；第二戰區，包括山西省全境及陝西省東北部；第三戰區，包括浙江、福建兩省全境及江蘇省、安徽省南部；第四戰區，包括廣東省、廣西省；第五戰區，包括安徽省西部、湖北省北部、河南省南部；第八戰區，包括綏遠省、寧夏省、甘肅省、青海省；第九戰區，包括湖北省南部、江西省西部及湖南省全境；第十戰區，包括陝西省；魯蘇戰區，包括江蘇省北部及山東省；冀察戰區，包括河北省及察哈爾省。

戰略相持階段，正面戰場的主要會戰如下所述。

1939 年 3 月，南昌會戰爆發，日軍在 3 月 28 日攻陷南昌。中國守軍發動「四月攻勢」，第三、第九兩戰區奉命協同反攻南昌。中國軍隊曾一度攻佔南昌機場及車站。然而，由於部隊傷亡嚴重，且日軍第 116 師團發起反攻，中國軍隊最終在 5 月 9 日停止進攻南昌。

1939 年 5 月，隨棗會戰爆發。日軍調集第 3、13、16 三個師團，企圖將中國第五戰區部隊主力殲滅於湖北隨縣、棗陽地區。為牽制和阻擊日軍進攻，李品仙、張自忠分率左、右兵團迎敵。5 月 19 日，守軍收復棗陽，並在 23 日收復隨縣，日軍的戰略企圖未能得逞。

1939 年 9 月，日軍為解除中國軍隊對武漢的威脅，向贛北、湘北進攻，第一次長沙會戰爆發。薛岳命部隊堅壁清野、破壞交通，並在



日軍在隨棗會戰中傷亡慘重

長沙東側地區集結主力，成功阻擊、伏擊日軍。日軍損傷慘重，無力再戰。在會戰中，中國軍隊成功守住長沙，取得「湘北大捷」，日軍殲滅中國第九戰區部隊主力的目的落空。

1939 年 10 月，在第一次長沙會戰勝利的鼓舞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制訂《國軍冬季攻勢作戰計劃》，準備將 80 多個師投入反攻，規定第二、三、五、九戰區為主攻，第一、四、八、魯蘇、冀察等戰區擔任助攻，以晉南與華中為攻勢重點地區。12 月，冬季攻勢發動。中國軍隊出擊 960 次左右，投入兵力約 50 萬。日軍承認，中國軍隊「攻勢規模之大和行動之頑強是前所未有的」。然而，由於中國軍隊實力遠不及日軍，冬季攻勢未能扭轉戰局。

為切斷中國通往越南的國際補給線，迫使國民政府投降，日軍在 1939 年 11 月於廣西欽州灣多處登陸，桂南會戰爆發。11 月 24 日，日軍強渡邕江，攻佔南寧，隨後繼續北犯，攻佔通往賓陽的崑崙關。12 月上旬，中國支援部隊抵達廣西前線，並在 12 月 17 日開始反攻。第 5 軍軍長杜聿明率部反攻崑崙關，經慘烈苦戰，付出 14,000 餘人傷亡的重大代價，於 12 月 31 日收復崑崙關，取得「崑崙關大捷」。1940 年 10 月，日軍主力進佔越南，中國軍隊轉入反攻，並於 10 月底收復南寧。

1939 年冬季攻勢結束後，日軍圖謀報復，決定攻佔湘北棗陽、宜昌，進而威脅重慶。1940 年 5 月，日軍第 11 軍先後對棗陽、宜昌發起攻勢，棗宜會戰爆發。日軍攻佔棗陽後，第 33 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率部渡過襄河，深入日軍後方，遭兩路夾擊，張自忠壯烈殉國。6 月中旬，日軍攻佔宜昌。此後，中日兩軍久戰疲憊，重回對峙狀態。棗宜會戰結束後，日軍又於 1941 年 1 月發動豫南會戰，試圖通過長途奔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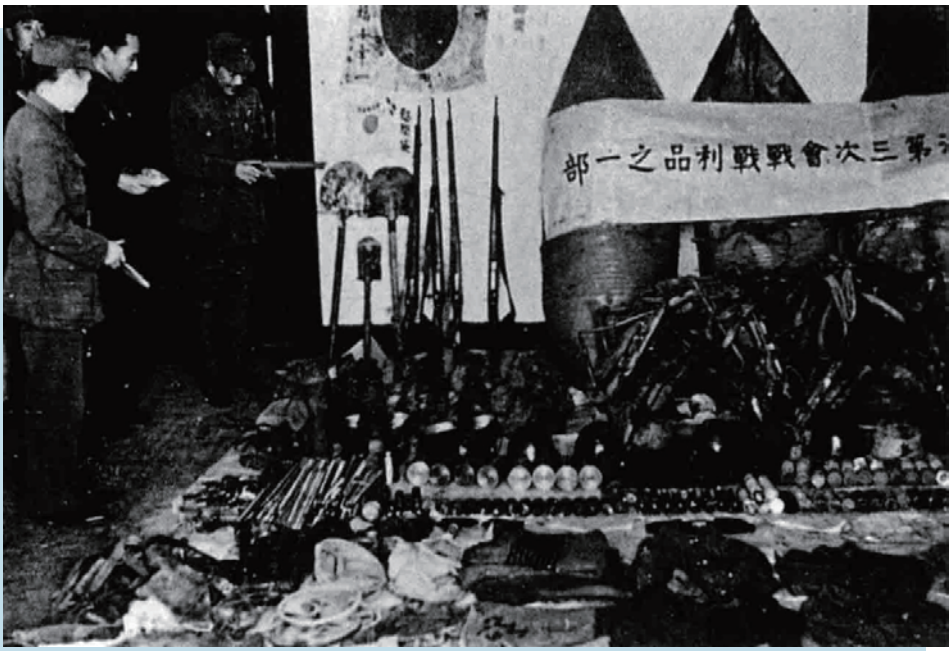
方式，圍殲豫南附近中國守軍主力。守軍留下少數兵力正面抗擊，並將主力轉至兩翼，擊退日軍。

1941 年 3 月，日軍為消耗中國軍隊戰力、擴大贛北佔領區，決定打擊第九戰區，上高會戰爆發。防守贛北的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羅卓英採取誘敵深入的戰術，將日軍第 34 師團誘入上高地區合圍，痛殲日軍。上高會戰中，中國軍隊兵力與日軍相近，裝備遠遜日軍。此役不僅摧毀了日軍攻佔上高的企圖，而且殲敵萬餘人，被視為正面戰場上的「空前捷戰」。

1941 年 5 月，日軍進攻位於晉南、豫北交界處的戰略要地中條山，中條山會戰爆發。日軍派出兵力 10 餘萬人，並調集兩個飛行團，以兩翼鉗擊、中央突破的方式，從東、北、西三個方面向中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衞立煌部發動全面進攻。中國守軍消極防禦，陣亡 4 萬餘人，被俘 3 萬餘人，損失極為慘重。

1941 年 9 月，日軍第 11 軍為消滅中國第九戰區主力，再度對湘北、贛北發動大規模進攻，第二次長沙會戰爆發。第 74 軍軍長王耀武率部與日軍激戰，損失慘重。9 月底，日軍一度攻入長沙城。隨後，中國守軍增援抵達，截斷日軍後方補給線，給予其沉重打擊。日軍被迫於 10 月初後撤，雙方重回對峙態勢。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駐廣州地區日軍向香港進攻。為策應香港作戰，牽制中國守軍南下支援，日軍第 11 軍發動第三次長沙會戰。12 月下旬，日軍強渡新牆河，攻至汨羅江南岸，中國守軍英勇抗擊。1942 年 1 月 4 日，第九戰區各部對長沙城郊的日軍實施包圍總攻擊，日軍彈盡糧絕，傷亡慘重，被迫北撤。北撤途中，日軍遭守軍截擊，又被切斷退路，極為狼狽。此役勝利，不僅激勵了中國軍民的抗戰信心，還鼓舞了盟軍的抗日士氣。



第三次長沙會戰中，中方繳獲的戰利品

1942 年 4 月，美國陸軍航空隊杜立德（James Doolittle）率 16 架轟炸機從航空母艦起飛空襲日本東京等地，部分美機迫降於浙江。為防止美軍利用浙江的機場實施「穿梭轟炸」，日軍於同年 5 月發動浙贛作戰，意圖摧毀麗水、衢縣、玉山等地的機場羣，殲滅中國第三戰區，打通浙贛路。浙贛會戰歷時百餘日，日軍雖一度打通浙贛路、破壞機場，但自身損失慘重，共計傷亡 17,000 餘人。第 15 師團師團長酒井直次中將騎戰馬踩中地雷，酒井斃命。

1943 年 5 月至 6 月，為打通長江航線、侵奪洞庭湖產糧區並擊破重慶門戶，日軍向中國第六戰區進攻，鄂西會戰爆發。第六戰區沿長江一線部署了 4 個集團軍，5 月底，日軍進入中國軍隊的反擊圈，第六戰

區各部發起全面反擊。中國守軍以傷亡 4 萬餘人的代價，擊退了日軍對長江要塞的進犯，取得「鄂西大捷」。

1943 年 11 月，日軍向戰略要塞常德發起全面進攻，常德會戰爆發，中國守軍余程萬率部浴血奮戰。12 月 3 日，常德陷落，除余程萬率一部突出重圍外，守城官兵大多壯烈犧牲。第六、第九戰區部隊繼續反攻作戰，並於 12 月 9 日收復常德。

戰略相持階段後期，中國軍隊在豫湘桂會戰中遭遇潰敗。由於在太平洋戰場陷入困境，日軍醞釀「一號作戰」，計劃打通中國大陸南北，與被切斷海上交通的南洋 50 萬日軍聯繫起來，利用這一地區內的豐富



常德會戰中，中國士兵冒着日軍炮火衝鋒

資源，從事長期戰爭。1944 年 4 月，日軍開始執行「一號作戰」，豫湘桂會戰爆發。豫湘桂會戰由豫中、長衡、桂柳三階段會戰組成。豫中會戰為第一階段。4 月 17 日，日軍共 14 萬餘人強渡黃河，並於 4 月下旬迅速佔領鄭州、洛陽地區。5 月 9 日，日軍打通平漢線。長衡會戰為第二階段。5 月下旬，日軍共 20 餘萬人，以攻佔湘桂鐵路為目標，向長沙、衡陽地區進攻，中國守軍依託新牆河、汨羅江、撈刀河逐次抵抗。6 月 18 日，長沙失守，第九戰區決定在衡陽與敵決戰。第 10 軍軍長方先覺奉命死守衡陽，守軍與日軍拚死激戰，多次擊退攻勢，給予日軍重創，至 7 月 20 日，日軍戰死 3,860 人。8 月 8 日，彈盡援絕的方先覺命令部隊放下武器，日軍佔領衡陽。桂柳會戰為第三階段。日軍攻佔衡陽後，於 11 月 11 日攻陷桂林、柳州。11 月 25 日，桂南重鎮南寧失陷，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目的基本達到。12 月 2 日，日軍攻佔獨山，這成為抗戰期間日軍深入中國腹地最遠之處。豫湘桂會戰之時，中國軍隊在實力上已遠遠超過抗戰初期。在其他反法西斯戰場節節勝利之際，中國軍隊卻遭遇慘敗。數十萬軍隊折損，20 餘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大後方近三分之一的工礦企業遭日軍蹂躪，數十個用於轟炸日本的機場被摧毀，數千萬百姓遭受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這場會戰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國民黨消極抗戰且統治腐敗。

國民政府除了在正面戰場抵抗日軍外，還從 1942 年 2 月起，派出剩餘的精銳部隊組成遠征軍陸續開入緬甸，承擔防禦任務並協助盟軍作戰。3 月 8 日，中國遠征軍第 5 軍第 200 師先頭部隊到達東吁，接替英軍防務。第 200 師艱苦戰鬥，保衛東吁長達 13 天，遲滯了日軍在緬甸的攻勢，給予了日軍沉重打擊。4 月中旬，被圍於仁安羌的英軍彈盡糧絕。中國遠征軍應英軍請求，派新 38 師第 113 團前往救援。4 月 18 日拂曉，劉放吾率團向日軍攻擊。經兩晝夜激戰，攻克所有日軍據點，救

出被圍的盟軍及盟國人士 7,000 餘人，取得「仁安羌大捷」。仁安羌之役是中國在抗戰中罕見的以少勝多的戰役，遠征軍以一個團的兵力、傷亡 500 餘人的代價，擊敗日軍兩個聯隊、斃傷 1,200 餘人，極大鼓舞了中國和盟國的士氣。然而，遠征軍和盟軍最終未能阻擋日軍攻勢，日軍乘遠征軍後方空虛，進佔臘戍，後又相繼攻陷畹町、芒市、龍陵，先頭部隊直抵惠通橋，截斷了遠征軍退回國內的通路。英軍的倉促撤退使遠征軍處於險境，遠征軍失利後分別向雲南和印度撤退。部分遠征軍部隊退入人跡罕至、蚊蚋成羣、生存條件極為惡劣的野人山和高黎貢山地區，損失慘重。師長戴安瀾率第 200 師在轉移途中遭遇日軍伏擊，身負重傷，壯烈殉國。遠征軍入緬時約 10 萬人，撤回滇西和到達印度的只有 4 萬人左右，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付出了巨大犧牲。

戰略相持階段，中國空軍在南昌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棗宜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鄂西會戰、常德會戰等戰役中，均能有效配合陸軍作戰，打擊日軍侵略氣焰。其中，1943 年 6 月 6 日，中國空軍第 4 大隊飛行員周志開冒着被日機轟炸的危險起飛，單機向日機攻擊，先後擊落 3 架、擊傷 2 架敵機，取得豐碩戰果。

4 中共敵後抗戰

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在廣闊敵後戰場開展抗日游擊戰，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游擊戰為何具有高度戰略價值？游擊戰在人類歷史中很早就存在，面對強敵，抵抗者往往通過游擊戰以小博大、以弱勝強。學者黃道炫認為，日本挑起全面戰爭時並沒有預見到，他們會遇到中國人民如此頑強和如此廣泛的軍事抵抗。因為中

國擁有如此廣闊的地域、如此豐富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日本自感軍力不足，認為在中國軍、政、民一體的「敵性地區」，僅能保持着「點」與「線」的狀態。因此，中共通過靈活機動的游擊戰，在「面」上活動、生存。在這種特殊的軍事政治形勢下，游擊戰獲得非同一般的地位，上升到戰略和政略高度，成為戰爭史上獨特的案例。

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召開洛川會議，擘劃全面抗戰路線。10 月下旬，八路軍挺進五台山地區，創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此後，八路軍和各地黨組織又陸續建立晉綏、晉冀豫、冀魯豫、晉西南、山東等多個抗日根據地。1938 年 5 月至 10 月，新四軍先後建立蘇南、皖南、皖中、豫東等抗日根據地。在戰略防禦階段，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各抗日根據地軍民有效牽制了日軍在正面戰場的進攻，支援了友軍作戰。



八路軍第115師挺進敵後，開展游擊戰爭

全面抗戰初期，全國軍民都面臨一個重要問題：抗戰究竟能不能取得勝利？戰爭還要持續多長時間？面對當時存在「亡國論」和「速勝論」兩種思潮，1938 年 5 月，毛澤東撰寫了《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兩篇重要著作，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批評兩種錯誤思潮。毛澤東論證了中國能夠、也必須經過持久抗戰取得勝利的客觀依據。他指出，日本雖然具有很強大的戰爭力量，但它發動的戰爭是非正義的，只會加劇其本身的內外矛盾。而且日本是小國，它的人力、物力不足以支持長期戰爭。中國雖然是弱國，不能速勝，但中國正處於向前進步的歷史時期，抗戰是進步的正義的戰爭，能夠喚起全國人民的熱情，利用中國地大、人多的有利條件來支援長期戰爭，並將得到國際上的廣大援助。毛澤東還指出，在相持階段，游擊戰將成為我方主要的作戰形式，相持階段是最艱苦的，時間也最長，中國抗戰力量主要是在這個時候生長。

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八路軍進一步鞏固抗日根據地，發展抗日游擊戰，嚴重威脅了日本對佔領區的控制，干擾了日本對華戰略目標的實現。對此，日本華北方面軍展開「燼滅作戰」，頻頻發動「掃蕩」。1939 年至 1940 年間，華北地區日軍出動千人以上「掃蕩」抗日根據地的次數多達百餘次，投入總兵力達 50 萬人以上。面對殘酷的日軍，八路軍展開反「掃蕩」作戰。1939 年 11 月，晉察冀軍區楊成武部在黃土嶺利用有利地形，對突入該地的日軍獨立混成第 2 旅團進行伏擊，殲滅日軍 900 餘名，擊斃旅團長阿部規秀中將。1940 年，冀中軍民在粉碎春季「掃蕩」後，發起保衛麥收的戰鬥，共計殲敵 800 餘人。晉西北根據地軍民在夏季反「掃蕩」中戰鬥 250 次，殲滅日軍和偽軍 2,500 餘人，收復了興縣、臨縣、方山等淪陷地區。山東根據地軍民抗擊日軍對魯中的進攻，制定新策略打擊消耗敵軍，進一步壯大了自身力量。反「掃蕩」的同時，根據地軍民實施「交通破擊戰」。從 1939 年 12 月

至 1940 年 6 月，在根據地人民配合下，八路軍第 129 師進行了長邯公路、平漢鐵路、白晉鐵路、武沙公路 4 次大破擊，給予日軍沉重打擊。至 1940 年，日軍有 9 個師團、12 個旅團被牽制在華北，導致日軍無法實現戰略意圖，整個戰局陷入被動。

為打破日軍的「治安肅正」計劃，粉碎其封鎖、分割各抗日根據地的企圖，八路軍在 1940 年夏秋之際主動出擊，投入 105 個團，對日軍佔據的交通線和大小據點進行毀滅性打擊，史稱「百團大戰」。百團大戰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 8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作戰重點是破擊正太鐵路。第二階段從 9 月 22 日至 10 月上旬，繼續擴大了第一階段的戰果，重點殲滅交通線兩側和深入根據地的日軍據點。第三階段從 10 月上旬至 1941 年 1 月，主要針對日軍在晉東南、晉察冀、太岳、晉西北等根據地的報復性「掃蕩」展開反擊。百團大戰共進行了大小戰鬥 1,842 次，殲滅日軍 20,645 人、偽軍 5,155 人，俘虜日軍 281 人、偽軍 18,407 人，破壞了日軍在華北的主要交通線，拔除了深入根據地的部分日軍據點。日軍承認，八路軍「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需要長時期和鉅款方能恢復」;「石太路破壞極為嚴重，規模之大無法形容」。百團大戰是八路軍在敵後戰場發動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略性進攻戰役，牽制了侵華日軍華北戰場近半數的兵力，確立了敵後戰場在全國抗戰大局中的戰略地位。

在反「掃蕩」中，華北根據地軍民還開創了「地道戰」等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一般認為，地道戰最早起源於冀中地區，初期以躲避敵人搶糧食、抓壯丁為目的。隨着日軍強化「掃蕩」作戰，冀中軍民不斷總結地道戰戰法，發展出村與村、戶與戶相連的地道系統，構建起「地下長城」。冀中軍民不斷改進和發展地道功能，地道不但可以藏兵藏糧，



破擊正太路的八路軍戰士

還可以充當傷患收容所、兵器修理廠、印刷廠等。地道還與地上工事連接，在重要地點設置槍眼。

戰略相持階段，華中抗日根據地進一步發展擴大。1939 年，新四軍確立了「向北發展，向東作戰，向南鞏固」的具體發展方針。在蘇南地區，新四軍鞏固了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並成立「蘇皖支隊」，進入蘇皖邊的天長、六合等地活動。同時，新四軍堅守皖南根據地，數次擊退日軍。在皖東地區，新四軍第四、第五支隊不斷發展壯大，並在 1940 年發展至 1 萬餘人。此外，新四軍進一步鞏固豫皖蘇邊區，並在

1939 年挺進鄂中、豫南地區，成立豫鄂邊區。1940 年，新四軍與八路軍會師，創建蘇北根據地。

1941 年以後，日軍和偽軍不斷對華中地區進行「清鄉」和「掃蕩」。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軍民積極展開鬥爭。1941 年 8 月，日軍投入 1 萬餘人，對蘇中進行大「掃蕩」。新四軍先後作戰 20 餘次，在一個多月的反「掃蕩」鬥爭中，殲滅、俘虜日軍和偽軍 3,000 餘人。1943 年 3 月，為掩護民眾和黨政機關安全轉移，新四軍第 3 師 7 旅 19 團 2 營 4 連的 82 名官兵在淮陰劉老莊抗擊數倍於己的日軍和偽軍，在擊斃日軍和偽軍 170 餘人後，全部壯烈犧牲。新四軍和華中根據地軍民頑強抵抗，粉碎了日軍和偽軍摧毀抗日根據地的圖謀。

在華南，廣州淪陷後，日軍佔領廣九鐵路兩側 10 多座縣城。中共廣東地方組織領導成立惠（陽）寶（安）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和東（莞）寶（安）惠（陽）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1940 年 9 月，這兩支游擊隊改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第五大隊，戰鬥在廣九鐵路兩側和大嶺山、陽台山地區，創建了東江根據地。中共地方組織還在粵中、雷州半島、潮汕等地區組織和發展抗日武裝。長期戰鬥在海南島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瓊崖縱隊，發展了瓊崖根據地。

學者黃道炫認為，中國共產黨以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為基礎，通過黨政軍民的總體戰，成功完成持久作戰的目標。無論山地還是平原，中共都頑強堅持，打破了日軍完全佔領中國的妄想，使其始終處於敵後軍民的抵抗和威脅之下，而中共則在戰略和政略結合指導下的持久堅持中不斷壯大發展。

全面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抗日武裝對敵作戰 12 萬餘次，消滅日軍和偽軍 171 萬餘人，其中日軍近 53 萬

人，對減輕正面戰場壓力、爭取抗戰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抗日根據地軍民為勝利作出巨大犧牲，中共領導的各類抗日武裝共計傷亡 61 萬餘人。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等一批傑出將領壯烈殉國，八路軍僅團以上幹部就犧牲了 728 人。據不完全統計，八路軍、新四軍犧牲（含病故）的旅以上幹部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東北抗日聯軍及其前身部隊犧牲（含病故）的師以上幹部至少 270 人。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5 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楊靖宇、趙尚志、左權、彭雪楓、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殉國將領，八路軍「狼牙山五壯士」、新四軍「劉老莊連」、東北抗聯八位女戰士、國民黨軍「八百壯士」等眾多英雄羣體，就是千千萬萬抗日將士的傑出代表。中國人民以錚錚鐵骨戰強敵、以血肉之軀築長城、以前仆後繼赴國難，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雄壯史詩。



新四軍在華中敵後英勇抗擊日軍

香港篇

祖國危難之際，香港成為全國抗日救亡中心之一。香港淪陷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港九大隊成為當時活躍在香港敵後唯一成建制的抵抗力量，許多香港同胞加入其中，他們為自由正義而戰，為抗戰勝利作出犧牲和貢獻。

1 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

九一八事變之後，香港同胞即已開展抗日救亡運動。1932 年上海「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上海中華醫學會呼籲香港方面給予支持。香港中華醫學會迅速組織了一支 20 餘人的醫療護理隊前往上海，救治傷兵。1935 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後，「香港抗日救國會」迅速成立，成為香港較早成立的抗日救亡團體，參加者主要是學生與工人，會員人數從起初的 200 人擴大到 2,000 人左右。1936 年綏遠抗戰爆發後，香港工人、學生、商人紛紛行動，組建「港僑賑濟綏遠難民會」、「香港各界救國聯合會」等團體，向內地運送了大批抗戰物資。

全面抗戰爆發後，香港成為華南抗日救亡中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簡稱「香港八辦」）和支持的保衛中國同盟，是香港從事抗日救亡的代表機構。為加強對外宣傳、爭取國際社會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支持，周恩來向英國駐華大使卡爾（Clark Kerr）提出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並獲同意。1938 年 1 月，廖承志赴香港同潘漢年等人共同創建香港八辦，地址位於香港島皇后大道中 18 號 2 樓，對外稱

「粵華公司」，以經營茶葉生意作掩護。廖承志擔任香港八辦負責人。

香港八辦的主要任務，是接收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和國際友人支援抗戰的錢款和物資，同時在香港採購八路軍、新四軍所需的各種物資。這些抗戰物資，先存放於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租下的兩個倉庫中，再由聯和行（華潤集團前身）安排，分批運往八路軍、新四軍的部隊與各抗日根據地。最初由公路運輸，從香港經廣東北上運至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廣州淪陷後，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簡稱「桂林八辦」）設立，聯和行利用西江航道，建立香港—梧州—桂林—貴陽—重慶的水上交通線。1938 年冬，香港八辦收到藥品和醫療器械 130 箱，由香港水運經淡水、惠州、老隆至桂林八辦，再轉運延安。因戰局惡化，香港八辦又開闢了經越南河內或海防的迂迴線路。1939 年 10 月，香港八辦收到



1941 年的皇后大道中，據研究者最新考證，左起第三座建築是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所在地（Harrison Forman 攝，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Libraries 收藏）

南美華僑捐贈的西藥及東南亞華僑捐贈的卡車和轎車，全數轉交桂林八辦。除接收大量捐贈物資外，香港八辦還擔負起聯繫海外華僑的重任。香港八辦印刷《華僑通訊》，向海外傳達國內抗戰消息，許多華僑青年通過辦事處安排，回國參加八路軍和新四軍。

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是一個連通海內外、以戰時救濟為目標並支援長期抗戰的組織，其核心人物是孫中山夫人宋慶齡。1937 年 12 月宋慶齡到香港後，憑藉自己的聲望和影響，着手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宋慶齡與廖承志商議後，決定設立保盟，香港八辦對此給予大力協助。1938 年 6 月 14 日，保盟在宋慶齡寓所的小客廳中正式宣告成立，總部設於香港島西摩道 21 號。

保盟最重要的工作是為抗戰募集款物，成立第一年就募集到 25 萬港元，用於購買藥品和醫療器械。1939 年至 1940 年，保盟收到捐款 19 萬餘港元、25 萬餘元法幣。為救濟河南災民，保盟在重慶發起「賑豫國際足球義賽」，募集 12.5 萬元法幣。為賑濟廣東災民，保盟舉辦國際音樂會，募集 19 萬元。此外，保盟還募集 80 萬元支援在重慶的貧病作家。宋慶齡通過保盟贈送給延安一輛外國友人捐贈的大型救護車，內有 1 張手術台、7 張病牀。保盟還向前線送去醫藥救濟物品上百噸，護送白求恩（Henry Bethune）、柯棣華（Dwarkanath Kotnis）等外籍醫生和多批醫療隊到根據地，並在那裏建立了 8 所國際和平醫院、48 所分院，為根據地培養了大批衛生工作者。1939 年 4 月，保盟接到新四軍急需單人蚊帳和奎寧等藥品的求助信。宋慶齡很快募集了 6,000 碼蚊帳用料、20 萬片奎寧、12 萬劑預防霍亂的疫苗、2,000 個消毒包等緊急援助物資。5 月，宋慶齡得知長江流域的抗日隊伍寒衣匱缺，發起「兩萬條毛毯運動」。許多國際友人和海外僑胞慷慨解囊，捐贈毛毯、衣物和資金。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保盟總部遷往重慶。在國民黨限制與封鎖之下，宋慶齡克服困難，通過各種途徑將捐款安全送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她還得到美方協助，將一架大型 X 光機運往延安。抗戰勝利後，宋慶齡建立「中國福利基金會」作為保盟後繼組織，支援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福利基金會改名為「中國福利會」，繼續從事婦幼保健等工作。從香港開創的保盟事業，一直延續至今，澤被後世。

除香港八辦與保盟外，香港同胞以各種方式參與到抗日救亡中。1937 年 9 月 20 日，香港學生賑濟會（簡稱「學賑會」）成立，其骨幹



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合影，右起：廖承志、傅朗思（Norman France）、司徒永覺夫人（Hilda Selwyn-Clarke）、宋慶齡、廖夢醒、鄧文釗、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

成員有不少是中共黨員。廣州淪陷後，學賑會先後組織了 4 個回鄉服務團共 200 餘人回到內地參與救亡工作。團員大多是青年學生，他們毅然放棄在香港相對安定的城市生活，奔赴茂名、高州、電白等地投身抗戰宣傳和教育工作，並將港澳、南洋等地的救濟物資運送到戰區難民和貧苦農民的手中。香港婦女團體是一支特殊而重要的抗日救亡力量。中國共產黨深入香港女工羣體，開辦識字班和夜校、開展抗戰宣傳、動員婦女回鄉服務。國民黨政要及夫人建立「新生活運動香港婦女工作委員會」、「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香港分會」等組織，開展募捐慰勞、兒童救濟、救亡宣傳等活動。香港婦女利用各種紀念日組織演講和遊行，為抗戰募集物資，成立「香港中國婦女兵災籌賑會」，通過義演會、賣物會、餐舞會等籌措物資，並親赴前線慰問傷兵。

香港同胞慷慨解囊，為抗戰籌募了相當可觀的資金。1938 年 8 月，香港各界聯合發起「八一三獻金運動」，共籌得 20 多萬港元。同時，香港島中環、灣仔兩區的瓜菜果販發起義賣活動，籌款賑濟傷兵和難民，其他各區小販爭相仿效，魚販、花販亦參與其中。至 9 月，這一活動已獲得獻金超過 100 萬港元。1941 年 5 月，國民政府在香港勸募公債，各界熱烈響應。華商會動用 10 萬元購買救國公債；普益商會在救國獻金運動中捐款 4 萬元，第二年又獻金 5 萬餘元；鮮魚行總商會積極參與購買國防公債、獻金運動、徵募寒衣等活動，捐款超過 10 萬元。酒樓茶室商會用於購買國防公債、救國獻金的款項也達到 10 餘萬元。

為救濟來港難民，香港各團體付出巨大努力。僅從 1938 年初至 5 月，東華三院就為 2,648 名內地難民提供了食物與住宿。此外，東華三院積極援助難民返鄉，至 1940 年共援助難民 6,073 人返鄉。香港崇正總會在粉嶺設置施賑處，每日施米，前來領米的難民不下數萬。香



香港大街上，市民高懸救國標語，舉行義賣，援助祖國抗戰

港救亡團體還直接深入內地開展工作，香港惠陽商會向博羅等地撥款 4,000 元，香港鶴山商會專門派員到鶴山施賑大米 600 包，並帶回難童 100 名。

隨着抗日救亡活動的開展，香港成為華南抗戰文化中心。全面抗戰爆發後，嶺南大學、廣州大學、廣東國民大學、南華大學等學校遷港復校，眾多學者和文化人南下香港。1939 年 3 月 26 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9 月 17 日，中國文化協進會成立。這兩個團體分別受中共和國民黨影響，既合作，也競爭。在上述背景



1941 年秋，王瑩（左一）、金山（左三）在香港利舞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後，帶妝與漫畫家丁聰（左二）、《大地》主編馬國亮（右一）合影（丁聰先生收藏，劉蜀永教授提供）

下，香港社會文化逐漸繁榮起來。南來影人和香港影人拍攝了大量抗日題材電影，包括《血濺寶山城》、《游擊進行曲》、《白雲故鄉》、《大地晨鐘》、《最後關頭》等。薛覺先、馬師曾主演的《最後關頭》，每次在香港上映皆盛況空前。1935 年至 1941 年，香港一共出產 98 部愛國電影，其中包括 75 部粵語片、6 部國語片、16 部新聞紀錄片和 1 部動畫片。中國旅行劇團、中華藝術劇團、中國救亡劇團、中華業餘劇團、中國新興劇社等內地專業劇團在港演出，進一步推動了香港劇壇的發展。1939 年，廣東戲劇協會第一劇團為紀念八一三淞滬抗戰，連演《自由魂》、《海上風雲》和《烽煙萬里》，盛況一時。王瑩、金山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場場爆滿，香港社會國族意識空前高漲。1941 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收緊言論管控，《光明報》、《大眾生活》、《時代文學》等

刊物在香港復刊或創刊，這些報刊主張堅持抗戰到底、實踐民主政治。1941 年 4 月，廖承志、夏衍、范長江等在香港創辦《華商報》，該報成為中共在香港重要的文化陣地。

1941 年 12 月，香港淪陷。中共中央指示開展祕密大營救，通過中共地下黨組織和港九大隊前身的武工隊將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救出香港、送往後方。當時，營救路線主要有三條。陸上兩條，包括由九龍經荃灣、元朗進入寶安游擊區，由九龍經西貢到惠陽游擊區；海上一條，由長洲坐船至澳門、海豐等地，再進入內地其他地方。皖南事變後避難桂林的田漢與逃離香港的文化人重逢，得知祕密大營救之後，他與洪深、夏衍聯合創作話劇《再會吧，香港！》。田漢不僅撰寫了話劇第四幕，還創作了同名主題歌的歌詞，他在這首被稱為「香港的《義勇軍進行曲》」中這樣描繪香港：「你是享樂者的天堂，也是革命戰士的沙場。這兒洋溢着驕淫的美酒，也流淌着英雄的血漿；這兒有出賣靈魂的名姬，也有獻身祖國的姑娘。這兒有迷戀着玉腿的浪子，也有擔當起國運的兒郎。這兒有一攫萬金的暴發戶，也有義賣三年的行商。一切善的在矛盾中生長，一切惡的在矛盾中滅亡。」

2 港九大隊的建立與發展

香港淪陷後，中國共產黨堅持敵後鬥爭，成立港九大隊、開闢港九游擊區。1941 年 12 月 8 日，日軍進攻香港，中共中央指示廖承志營救滯留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接到指示後，廖承志要求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儘快派出精幹力量進入香港展開營救。在此之前，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已經決定乘日軍攻港時向香港發展，開展敵後游擊戰。

日軍進攻香港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王作堯部和曾生部分別派出武工隊進入新界。1942 年 1 月下旬，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在寶安縣召開幹部會議，決定將進入新界的武工隊合併，成立港九大隊。2 月 3 日，港九大隊在新界西貢黃毛應村正式成立，蔡國梁任大隊長，陳達明任政治委員，黃高陽擔任政訓室主任。

表面上看，香港似乎並不適合開展游擊戰，這裏人稠地狹、山小林稀、海港阻隔，敵軍可以利用城市交通便利迅速行動，游擊隊難以生存發展。不過，香港雖然人口密集、建築林立，但人煙稀少的山地和星羅棋佈的鄉村卻佔整個陸地面積的絕大部分，許多離島也可成為游擊隊藏身之處。在當時，港九市區雖然交通便利，但通往鄉村的公路數量有限。港九大隊進入新界後最初立足於西貢、沙頭角等地。西貢位於新界東部，是港九大隊初期活動的中心。西貢圩是當地政治、經濟中心，卻沒有公路與市區連接。九龍只有一條通往坑口的公路，前往西貢圩要經過牛池灣、飛鵝山、濠涌、白沙灣，再步行經過約 20 公里的羊腸小徑方能到達。所以，日軍要面對如此複雜的環境，實際兵力不足分配。軍警林立的香港，其實空隙頗大，這就予以港九大隊一定的生存空間。此外，不少游擊隊員家在新界，便於游擊隊利用親緣、鄉緣生存發展，沙頭角石涌凹羅氏一家 11 人參加港九大隊抗日活動，被譽為「香港抗日一家人」。

港九大隊在挺進新界之初，即着手清剿土匪，重建秩序，在新界站穩腳跟。1941 年 12 月日軍進攻香港後，土匪在新界地區大肆劫掠。蕭天來、黃竹青等匪幫到處搶劫勒索、強姦婦女；陳乃壽、張明仔等海匪拉起二三十人的隊伍，在海上勒索漁民。新界實際處於無政府狀態，生產生活無法正常進行。1942 年春節，當地鄉民只能依靠採摘山地中的

野百合果腹。港九大隊在西貢和沙頭角地區清剿、抓捕土匪，召開公審大會，將鄉民組織起來成立武裝自衛隊。此外，港九大隊還充分利用海洋生存發展。游擊隊挺進新界後即成立了一支 19 人的海上小隊，起初由兩艘小型風帆木船和一艘拉網漁船組成，以西貢糧船灣為基地。海上小隊在大鵬灣清剿海匪，並從漁民中物色、培養有威信的「領海人」，引導他們組織漁民。香港淪陷半年後，新界匪幫在港九大隊的打擊下逐漸分化瓦解，港九大隊的實力也得到加強。黃毛應村僅有 14 名青年，其中 6 人參加了游擊隊。烏蛟騰村的青年、婦女和兒童，有九成參加抗日救亡工作。游擊隊在完成剿匪之後，以抗日宣傳作為工作重點，向新界鄉民講述日軍在市區的暴行，揭露鄉民受到日軍盤查打罵的事實。隨着日軍頻繁對新界鄉村進行「掃蕩」，鄉民抗日熱情高漲。同時，港九大隊還為新界與內地間的貿易往來提供便利和保護，緩解了新界鄉村糧食匱乏的困境，並從中獲取了相對穩定的經濟來源。鄉民與游擊隊之間愈發結成緊密的命運共同體。

據《港九大隊志》考證，港九大隊的名稱和隸屬關係經歷數次演變。最初，港九大隊是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轄下的 5 個大隊之一。1943 年 12 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成立，並於 1944 年秋成立數個支隊，因港九大隊有着歷史及地理上的特殊性，改稱「港九獨立大隊」，歸東江縱隊司令部領導。1944 年冬，部隊整編，改為隸屬於東江縱隊第二支隊，並恢復「港九大隊」名稱。江南指揮部成立後，港九大隊一度由其領導。日本投降前後，港九大隊又改稱為「港九獨立大隊」，重新歸屬東江縱隊司令部領導。

隨着實力不斷壯大，港九大隊朝着正規化的方向發展，各地區的武裝部隊先後建立起中隊編制，包括大嶼山中隊、沙頭角中隊、西貢中

隊、海上中隊、市區中隊、元朗中隊、中華中隊、卓覺民中隊。其中前 6 個中隊一直在港九新界活動。港九大隊仿照八路軍和新四軍，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大隊設政治委員並建立政訓室，分管組織、民運、統戰和國際事務。各中隊設政治指導員，小隊設政治服務員。大隊設黨總支部，各中隊設黨支部。港九大隊各中隊一面擴軍充實力量，一面進行軍事訓練。例如，大嶼山中隊每天早晨都組織全體戰士進行軍事訓練，並派人赴總隊學習後擔任軍事教官，提高部隊的射擊、投彈、刺殺和爆破技術。港九大隊大部分使用英製武器彈藥，例如李 - 恩菲爾德（Lee-Enfield）步槍、路易斯（Lewis Gun）機槍等，這些武器大多是香港戰役時被英軍丟棄的。此外，港九大隊還從打撈水雷中獲得炸藥。英軍認為，港九大隊雖然生活水平極低，但整體士氣高昂、裝備精良、領導有方。

3 港九大隊的武裝鬥爭

1952 年，美國海軍一篇獲獎的戰史研究論文提出，在太平洋戰爭中，日本被一系列推進式和累積式相結合的戰略擊敗，前者是美軍一路向西的「蛙跳式」作戰，後者是持續消耗日軍的空襲、破襲作戰。港九大隊的武裝鬥爭就屬於後者範疇。總體而言，港九大隊主要針對小股敵軍或據點進行伏擊和破襲，從而有效干擾了日軍的戰略部署，這種「千刀殺一人」的戰略，逐步癱瘓了香港作為日本太平洋戰爭後勤基地的功能，加速了日本崩潰。根據《港九大隊志》一書考證，港九大隊主要經歷了如下重要戰鬥。

1942 年 7 月至 8 月的一天，沙田短槍隊隊長黃冠芳、副隊長劉黑

仔帶隊在獅子山山腳遭遇日軍。游擊隊員果斷跳入引水渠掩蔽，待日軍走近後立即開槍攻擊。此次突襲，短槍隊共擊斃日軍軍官 1 名、士兵 2 名及印度兵 1 名，並繳獲短槍 1 枝、長槍 2 枝、軍刀 1 把、軍大衣 1 件。

1943 年 3 月 3 日下午，日軍出動粉嶺警備隊 32 人與沙頭角警備隊及憲兵隊 50 餘人到沙頭角一帶突擊「掃蕩」，包圍港九大隊政訓室在老龍田晏台山的駐地。儘管敵我勢力懸殊，游擊隊員仍奮力與日軍搏鬥。曾福拿起衝鋒槍掃射日軍，掩護其他隊員突圍，當場擊斃兩名日軍；炊事員鄭生用步槍迎擊日軍；年僅 13 歲的交通員温觀友勇奪日軍步槍，身受重傷；政訓室主任黃高陽與日軍搏鬥，沿山坑向南涌方向突圍。在遭遇突襲的情況下，游擊隊員仍擊斃日軍少尉 1 人、士兵 1 人。游擊隊多名戰士壯烈犧牲，曾福、邱國璋、符志光 3 人在激戰中犧牲，陳冠時、彭泰農、陳坤賢受傷被俘後被殺害。

1943 年 5 月，一天夜間，大嶼山中隊中隊長劉春祥等 7 名游擊隊員，從大嶼山東涌乘帆船前往屯門龍鼓灘開闢新根據地。當帆船行至龍鼓洲、沙洲海域時，遭到兩艘日軍炮艇伏擊。劉春祥等人臨危不懼，英勇應戰，帆船不幸被日軍擊沉，劉春祥等 7 人及船家梁克全家 5 人壯烈犧牲。

1943 年秋，沙田短槍隊進駐西貢界咸村。一天上午，村民向部隊報告蠔涌有一輛可疑的軍用汽車，車上有 3 個人，其中 1 人為日軍。劉黑仔接報後，懷疑是日軍正在偵察游擊隊，立即率部探追，將他們捕獲。審問後發現，其中的日本人是華南派遣軍司令部高級特務東條正芝。劉黑仔等將他們押往大隊部。經審訊後，游擊隊將東條正芝處決。

1944 年 2 月，日軍為搜捕美軍飛行員克爾（Donald Kerr）中尉，「掃蕩」沙田、西貢。為牽制敵軍，劉黑仔率數名隊員化裝進入九龍塘，擊斃憲兵隊翻譯，並在九龍城處決特務蕭九如。之後，短槍隊又夜襲啟德機場，炸毀飛機 1 架、油庫 1 座。短槍隊的行動震懾了敵偽，劉黑仔更是成為聞名港九的傳奇人物。據港九大隊情報，參與「掃蕩」的敵人閒聊時說：「你知道劉黑仔的名字嗎？人家用快制駁殼，你用爛炮仔，幾粒子彈，怎夠人打呢？」

1944 年 4 月，為牽制日軍，粉碎「掃蕩」行動，市區中隊進行「紙彈戰」，在多處散發傳單，揚言游擊隊將攻打日軍指揮機關。此外，市區



1944 年 2 月，劉黑仔、黃冠芳率短槍隊潛入啟德機場，刺死值班日軍並炸毀飛機一架（陳挺通作品，沙頭角抗戰紀念館提供）

中隊還決定爆破九龍窩打老道 4 號火車橋。由於日軍封鎖了水陸通道，游擊隊員將炸藥和雷管藏在竹竿裏面，成功運送到市區。4 月 21 日，隊員梁福等人將由 14 斤炸藥製成的定時炸彈安放在火車橋上。深夜 12 時正，定時炸彈爆炸，火車橋的橋墩被炸得粉碎，橋身向上傾斜。爆破行動使原本前往新界和寶安「掃蕩」的日軍被迫撤回市區，大大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同月 13 日，劉黑仔等突襲了牛池灣日軍哨所，擊斃日軍和偽軍 3 人。同一天，沙頭角中隊夜襲吉澳島，成功拔除日軍在島上的據點。

1944 年 10 月，大嶼山中隊應羣眾要求，夜襲大澳偽警察局。中隊 30 多名隊員進入大澳後，掃清了周邊零散的敵人，隨後在內線的配合下打開警察局大門，衝上二樓宿舍。熟睡中的偽警員聽到「繳槍不殺」的喊話後，紛紛舉手投降。游擊隊在沒有開槍的情況下成功俘虜了 30 多名恃強凌弱、欺壓百姓的偽警員，並繳獲 39 枝槍和一批彈藥。

1944 年冬，港九大隊決定突襲窩塘日軍兵營。窩塘位於觀音山山腳下，駐有一個工兵班日軍，沙田短槍隊經過仔細偵察，派遣 13 名游擊隊員在夜間潛入日軍兵營，朝熟睡中的日軍開槍。在夜襲中，12 名日軍被全部擊斃，短槍隊還繳獲輕機槍 1 挺、步槍 10 枝、手槍 1 枝以及一些糧食。

1945 年 5 月，盟軍在太平洋地區轉入反攻，日軍加緊在大嶼山修建堡壘。牛牯塱村村民向大嶼山中隊報告，駐梅窩地區的日軍強徵鄉民到牛牯塱山上挖洞，鄉民苦不堪言。經過調查後，大嶼山中隊的 10 餘名隊員，在 5 月 6 日晚向日軍據點發動突襲。他們衝入敵軍營房開槍射擊，最終擊斃 6 名日軍（包括一名中尉軍官），並繳獲 5 枝步槍、1 枝短槍、1 把劍與一些彈藥。

除了在陸地上戰鬥，港九大隊的海上武裝將大海變成機動靈活的戰場，他們屢次擊沉或俘獲敵船，破壞日軍的海上交通運輸線。1944 年 8 月 16 日，海上中隊在中隊長王錦指揮下，於黃竹角海面擊沉敵船 3 艘，斃敵 25 人，傷敵 13 人，繳獲機槍 2 挺、衝鋒槍 4 枝、步槍 21 枝及手槍 4 枝。1945 年 8 月，海上中隊 3 艘武裝船，與日軍展開交火，最終擊沉敵船，殲滅日軍 40 餘人，繳獲各類武器、無線電收發報機等軍用物資。1944 年 5 月至 1945 年 8 月，在一年多時間裏，大嶼山中隊海上隊俘獲敵偽電扒 20 多艘，繳獲大批物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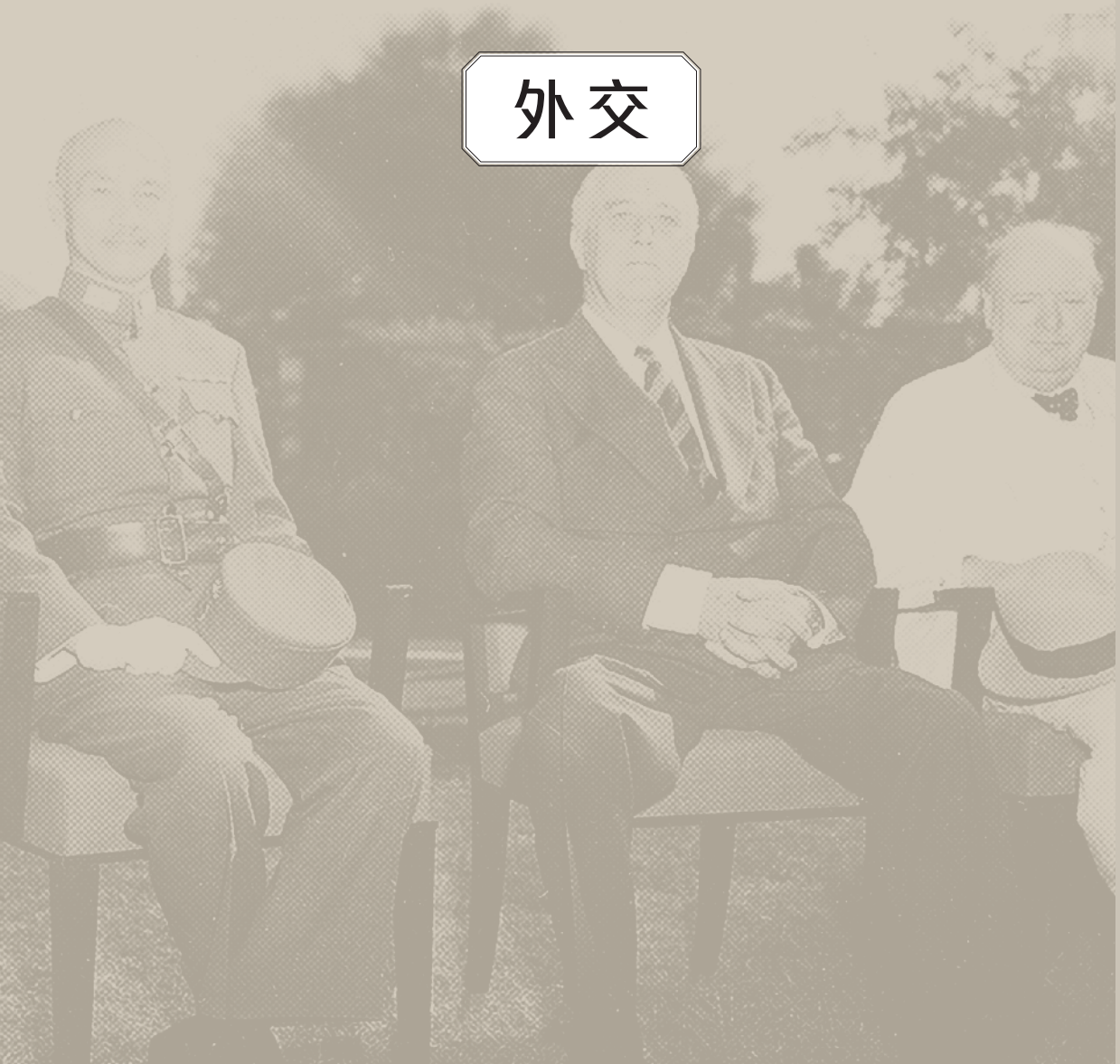
海上中隊作戰使用的木船（羅歐鋒 攝）

港九大隊的敵後鬥爭獲得香港同胞的廣泛支持。日軍經常在新界進行「掃蕩」作戰，試圖消滅港九大隊。當敵人進村「掃蕩」時，村民們千方百計掩護游擊隊員，不少村民因此被日軍殺害。平時，游擊隊員深受村民關懷與照顧，許多隊員居住在村民家中，一些村民對待年紀較小的隊員就像對待自己兒女一樣親切。在香港同胞的支持下，港九大隊與敵偽戰鬥 50 餘次，斃傷日軍 100 餘名，斃傷漢奸、偽警及間諜 70 餘名，俘虜、受降日軍和偽軍 600 餘名。據不完全統計，港九大隊有 115 名烈士為保衛香港壯烈犧牲。

日本投降後，按照上級命令，港九大隊撤離香港。為維護社會穩定，港九大隊應英方請求留下一些幹部和戰士，協助恢復新界秩序。1945 年 9 月 28 日，港九大隊發表撤退宣言，游擊隊寄語香港同胞：「我們希望你們光榮的鬥爭能引起國際人士應有的尊敬，獲得應有的自由、和平與幸福生活。」

第四章

外交



國家篇

抗日戰爭既是中華民族救亡圖存、抵抗日本侵略的軍事鬥爭，也是中國爭取平等國際地位、奠定戰後大國地位的外交鬥爭。常言道「弱國無外交」，實則弱國更需要且更依賴外交智慧。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根本上是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成果，而中國政府採取務實靈活的外交方針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一面拚死抵抗，一面不懈推動各國援華制日，可謂「苦撐待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被承認為盟國「四強」之一，積極參與擘劃戰後國際秩序。抗戰時期的中國外交既取得輝煌成果，也留下深刻教訓，為 1949 年以後中國真正恢復大國地位提供了歷史經驗。

1 苦撐待變的中國外交

王建朗等學者認為，抗戰初期，除了中日兩個交戰國，與東亞事務有密切關係且發生重要影響的國家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英美等國，它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形成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締造國，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二是德國，它受到「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限制，要求打破既有國際秩序；三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它受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排斥，要求建立平等新秩序。這三類國家是當時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家。

當時，中國外交面臨的局勢是：英國在華利益雖在列強之中首屈一指，然而，英國面對納粹德國擴張已力不從心，故而對日本採取綏靖

退讓態度。美國深陷孤立主義，在日本侵華問題上，美國雖同情中國，卻往往表示無能為力。中德關係一度密切，德國用武器換取鎢砂等資源，幫助中國訓練軍隊。但納粹上台後，德日親近，德國對華政策逐漸轉變。至於蘇聯，日本長期以蘇聯為假想敵，蘇聯對此心知肚明，積極主動援華，希望中國拖住日本，消耗其國力。抗戰前期的中國外交，就是要明智而妥善地處理與這三類國家的關係，爭取一切可能的力量。因此，親近美英、爭取蘇援、中立德國、孤立日本是中國外交的基本方針。

在中英關係方面。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後，日本的侵略已直接威脅到英國在華利益，然而，即便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Hughe Knatchbull-Hugessen）被日軍炸傷、英國皇家海軍和僑民在長江遭到日軍襲擊，英國仍對日本忍氣吞聲。英國外交重點在歐洲，面對納粹德國崛起，歐洲局勢日益嚴峻，英國不願在東亞過於得罪日本，因而時常妥協退讓。1939 年 7 月，英日雙方簽訂了《有田—克萊琪協定》，即英國實質上默認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1940 年 7 月，英國在日本施加壓力下，宣佈 3 個月內禁止通過緬甸向中國運輸軍械、彈藥、汽油、載重汽車、鐵路材料等物資。由於滇緬公路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物資內運國際交通線，英國此舉極大地傷害了中國。儘管如此，中國仍然不懈努力，呼籲英國政府認清形勢、放棄對日本的綏靖政策。而日本肆意在東亞擴大侵略，挑戰英國的底線。英國在妥協的同時，也開始回應中國的訴求，進行一些援華活動。1938 年 12 月，英國宣佈向中國提供 50 萬英鎊貸款（後來擴大為 300 萬英鎊）。此後，英國陸續宣佈向中國提供總計 1,500 萬英鎊的貸款，其中包括 1941 年 3 月向中國提供的 500 萬英鎊平准基金貸款，幫助中國穩定幣值。此外，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英之間開始試探軍事合作的可能性，就組訓游擊部隊，協防香港、緬甸等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磋商。

在中美關係方面。中國抗戰初期，美國避免捲入中日衝突，甚至美

國海軍「帕奈號」（*USS Panay*）炮艦在長江遭到日軍襲擊，也沒有引發美國武裝介入。不僅如此，美國還在向日本出口石油、鋼鐵、橡膠等重要戰略物資。中國委任與美國淵源深厚的胡適擔任駐美大使，開展對美宣傳，積極爭取美國同情和支援。1938 年 11 月，日本提出建設「東亞新秩序」口號，美國意識到日本野心難以遏制，對日本發出語氣強硬的照會。12 月，美國宣佈向中國貸款 2,500 萬美元，由於這筆貸款通過中國對美出口桐油償還，又被稱為「桐油貸款」，此舉標誌着美國邁出了援華的第一步。1939 年 7 月，美國宣佈終止《美日商約》，消除了對日禁運的法律障礙，此後兩年中，美國政府先後四次向中國提供貸款，總額達 1.45 億美元。例如，1940 年 4 月和 10 月，中美兩國先後達成「華錫借款」和「鎢砂借款」協定，美國次遞向中國提供 2,000 萬美元和 2,500 萬美元的貸款，中國則以出口錫和鎢砂作為擔保。1941 年 3 月，美國訂立《租借法案》，不久後宣佈中國可以獲得租借援助。此外，美國政府還派出以馬格魯德（John L. Magruder）為團長的軍事代表團使華。1941 年 4 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命令，允許美國預備役軍人和退役人員前往中國參加戰鬥，同意中國通過美國《租借法案》貨款購買美國戰鬥機。8 月，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軍官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在昆明成立美國志願航空隊，這支戰鬥機部隊以「飛虎隊」聞名，幫助中國迎擊日本空軍。

在中德關係方面。全面抗戰爆發後，在處理對華和對日外交問題上，德國政府存在分歧。以希特拉為首的納粹勢力傾向於與日本維持同盟關係，外交部、經濟部和國防軍則試圖在中日戰爭中保持中立。在淞滬會戰中，中國參戰的精銳部隊裝備德製武器、受過德式訓練，在德國顧問擬定的作戰方案指導下與日軍作戰。而且，抗戰初期，中德貿易還在進行，德國軍火仍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也在繼續活動，並參與制定對日作戰計劃。日本對此非常惱火，多次對德國外交施壓。而德國



來華參戰的美國志願航空隊隊員

為最大程度保護本國利益，力促中日兩國停戰。1937 年 10 月，德國政府指派其駐中國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駐日本大使狄克遜（Herbert Dirksen）分別向中日兩國政府表示，德國願意為中日兩國停戰和締結和約進行斡旋。日本攻佔南京後提出更加苛刻的條件，1938 年 1 月，德國調停失敗，中德關係逆轉。這説明，德國在中日之間戰與和的問題上，它希望兩國和平；如果非要在中國或日本之間選擇的話，它選擇日本。4 月，德國開始禁止對華出售武器，7 月，德國撤出在華軍事顧問。儘管如此，中德之間一直通過祕密管道維持着一定的貿易關係。



1938 年初，陶德曼（左二）與中國駐意大利前大使劉文島（左一）等人在漢口留影

在中蘇關係方面。全面抗戰爆發後，中蘇關係密切。1937 年 8 月，兩國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抗戰前期，蘇聯向中國提供了三次貸款，總數計 2.5 億美元；中國以桐油、鎢、銻、茶葉等實物償還。中國用這些貸款向蘇聯購買了飛機、火炮、坦克、槍械和彈藥以及大量其他軍用物資。蘇聯援華的目的是以中國遏阻日本，但不願公開與日本為敵。儘管如此，蘇聯還是以航空志願隊的名義派出 2,000 餘名官兵支援中國抗戰，其中有 200 餘人在中國犧牲。蘇聯航空志願隊在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地上空與日軍進行多次激戰，對日軍進行了多次轟炸行動，包括空襲台北松山機場等。此外，蘇聯還向中國派出了上百名軍



在支援中國抗戰時犧牲的蘇聯空軍志願隊轟炸機大隊大隊長庫里申科

事顧問和數千位技術專家，他們有力地支援了中國的抗戰。1938 年和 1939 年，蘇聯和日本先後在張鼓峯地區和諾門罕地區發生激烈軍事衝突，兩國關係一度瀕臨全面戰爭邊緣。

從 1939 年 9 月德國入侵波蘭到 1941 年 12 月日本突襲珍珠港，這兩年多的時間，世界格局劇烈變化，學者鄧野稱之為「顛簸的年代」，中國對各大國、尤其是對德國和蘇聯的外交經受世界變局的考驗。大國關係重新分化、重新組合，最終，大國之間分別完成了各自的國家結盟，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兩條陣線，由模糊變明朗。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抗戰與世界大戰融合成一體。

1939 年 9 月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根據鄧野的研究，蔣介石一開始主張立即對德宣戰，試圖將中國與英、法等國「捆綁」，實際目的是拉英、法加入中國的抗日陣線。但這一主張在國民政府內部遭到反對，因為蘇德兩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蘇聯緊接着德國之後也出兵波蘭，歐洲形勢似乎形成「蘇德陣營」和「英法陣營」的對抗局面。這時，中國如果對德宣戰，將有可能得罪當時大力援助中國抗戰的蘇聯。因此，歐戰爆發後，中國對德外交採取了克制的立場。11 月，蘇聯入侵芬蘭，蘇芬戰爭爆發。12 月，國際聯盟投票表決是否開除蘇聯會籍，中國投了棄權票。因為，如果投贊成票，蘇聯當時是對中國援助最大的國家，中國此舉顯然有違道義；如果投反對票，則英、法等國就會不滿中國。儘管如此，蘇聯仍對中國投棄權票不滿。1940 年夏，德國在歐洲取得節節勝利，國民政府中一些親德人士主張「聯德聯蘇」，甚至提出中國退出國聯，這一觀點在國民政府內部遭到強烈反對。9 月，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締結同盟協定，三國軸心形成，中德關係日趨冷淡，蘇德關係逐漸惡化，但蘇日關係卻有所緩和。1941 年 1 月，皖南事變發生，蘇聯對國民政府實行反共政策不滿。4 月，為防範一旦與德國開戰後陷入東西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蘇聯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在條約附件的共同宣言中，蘇日兩國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為爭取蘇聯繼續援華，國民政府對此保持克制。6 月，德國入侵蘇聯，蘇德戰爭爆發，蘇聯自顧不暇，無力援助中國抗戰。7 月，德國公開承認南京汪精衛偽國民政府，中國隨即宣佈與德國斷交。可以說，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抗戰到了最艱苦困難的時刻。

2 太平洋戰爭期間中國外交的成就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轉捩點。此後，中國外交的重點轉變為在爭取國際援助的同時，衝破近代以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束縛，爭取平等國際地位，積極參與戰後世界秩序籌劃。

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與美國和英國結成正式盟友，中國國際地位顯著躍升。其標誌是「四強」（Four Powers）一詞的使用。在 1942 年初美、英、蘇、中四國領銜簽署的《聯合國家共同宣言》發表後，「四強」一詞便出現了。宣言簽署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對中國代表宋子文表示，歡迎中國位列「四強」之一。這應是中國最早聽到的「四強」之說。此後，中國開始從「大國」的角色和地位思考戰後國際秩序的建構。然而，中國的大國地位並非名副其實，國家實力仍舊積貧積弱。從某種程度上說，使中國成為名義上的大國是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戰爭期間，美國需要中國拖住日本，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國的地緣與軍力。另外，美國希望戰爭結束後，一個親美的中國可以在東亞維護美國利益。

美日開戰雖然讓中國看到勝利希望，但中國嚴峻的戰局沒有得到根本性緩解。根據齊錫生等學者研究，整個戰爭期間，蔣介石一直盼望並預言日蘇開戰，他認為，只有蘇聯對日作戰才能對中國解困起到真正作用。珍珠港事件後，羅斯福通過駐美大使胡適轉告蔣介石，希望中國保持克制情緒，避免公開慶祝美日開戰。羅斯福的看法代表了相當一批美國軍政要員對中國的偏見，他們認為，中國人懷着「坐順風車」的心態，以為自己不用盡全力便可依靠美國戰勝日本。這種以美國為中心的認識影響到美國制定對華政策。事實上，中國為承擔國際義務不得不將



美國空運大隊飛躍駝峯航線，向中國運送戰略物資

殘存的精銳部隊組成遠征軍入緬作戰，使得中國承擔了新的軍事壓力。在軍事和經濟援助方面，中國從美國得到的遠遠低於預期。飛越喜馬拉雅山的駝峯航線運載量極為有限，中國也未能進入盟國軍火分配委員會。太平洋戰爭初期，中國得到的美國飛機數量遠不如英國、蘇聯和加拿大，甚至比埃及還少。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並未氣餒，而是主動運用名義上的「四強」地位，爭取恢復大國地位。根據王建朗等學者研究，中國的外交努力具體落實在四個層面：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訂立平等新約，衝破國際舊秩序的束縛。二是鞏固邊疆，加強中央與邊疆地區的聯繫，捍衛對新疆和西藏的主權。三是謀劃戰後對日處置，努力收回國家利權，參與戰後國際新秩序的建構。四是積極參與籌設戰後國際組織，為中國在未來國際組織中爭取有利地位。

在廢除不平等條約方面，不平等條約體系最主要的體現莫過於列強在華租界和租借地，以及治外法權和各種特權。美英在華特權由於日本全面侵華而被大幅削弱，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華租界和租借地已完全落入日本之手。1942 年夏，中途島戰役的勝利使得太平洋戰場局勢轉變，美國採取主動，提出儘快與中國談判廢除治外法權。中國抓住契機，與美英展開關於訂立平等新約的談判。1942 年 10 月 10 日，美英兩國政府分別通知中國大使館，宣佈自動廢除不平等條約，並願商訂平等新約。中美新約談判從 10 月 24 日正式開始，進展較順利，儘管美國還無意完全放棄諸如內河航行權、沿海貿易權和軍艦遊弋權之類特權，但由於中國一再堅持，美國最終放棄上述特權。1943 年 1 月 11 日，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 Hull）與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在華盛頓簽訂了《中美平等新約》。中英新約談判則比較艱難，雙方矛盾主要在於香港問題，相關內容後文將詳細解説。中美、中英平等新約規定，之前不平等條約中有關由美英方面管轄其在華人員及公司的一切條款，一概撤銷作廢；《辛丑條約》取消，終止該條約及其附件給予美英的一切權利；美英在華租界的行政管理權歸還中國政府。美英還宣佈，放棄有關中國通商口岸制度的一切現行條約權利，現有在中國領土內設置的美英所有法院停閉；放棄關於在中國領土內各口岸僱用外籍引水員的一切現行權利，放棄關於其軍艦駛入中國領水的一切現行條約權利，放棄其民用船舶在中國領水內沿海貿易及內河航行特權。

簽訂平等新約，最初僅限於美英兩國，此後其他國家紛紛跟進。1943 年 8 月至 1945 年 5 月，中國先後與巴西、比利時、挪威、加拿大、瑞典、荷蘭等國簽署了關於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事件的平等條約。法國、丹麥、瑞士、葡萄牙等國在戰後也陸續與中國訂立平等新約。中國在法理上掙脱了近代以來加諸自身的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束



1943 年 1 月，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左）與美國國務卿赫爾（右）簽訂中美新約

縛，恢復了之前喪失的一部分國家主權。中國在國際法中已不再處於被歧視的地位，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平等合法的地位得到公認。

在鞏固邊疆方面，中國面臨的邊疆問題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新疆、西藏地方當局以及當地民族分裂勢力謀求割據或獨立；第二，蘇聯和英國兩國分別對新疆和西藏懷有戰略圖謀和侵略野心。中國在抵禦日本入侵的同時也一直致力於向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伸張國家權力，宣示對新對藏主權。在新疆問題上，1941 年蘇德戰爭爆發，原先投靠蘇聯的新疆統治者盛世才與蘇聯之間關係持續惡化。蘇聯在戰爭初期不斷敗退，無暇顧及新疆問題，盛世才決意政治投機，脱離蘇聯控制，轉向國民政府。從 1942 年下半年起，國民政府黨政軍勢力開始全面進入新疆。在外交上，國民政府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建立外交部新疆外交

特派員公署，處理新疆涉外事務。在軍事上，國民政府要求蘇軍駐哈密部隊撤出新疆，並派遣大批軍隊入新，起到穩定和威懾的作用。在經濟上，國民政府調派內地管理、技術人員規劃、指導新疆建設，設立中央銀行迪化分行等機構，掌握新疆財政和貿易大權。在政治上，國民黨重建新疆省黨部，成立中央訓練團新疆分團，並從內地調來大量幹部，基本實現了對新疆的控制。在西藏問題上，1943 年前後，面對英印政府鼓動西藏地方當局拒修中印公路以及西藏地方當局擅自成立「外交局」等嚴重事件，國民政府採取強硬態度，據理力爭。抗戰後期，英印政府又對藏東南門隅、達旺、察隅、珞隅等地區進行領土擴張，國民政府面對英印政府的侵略行徑，通過外交途徑表示嚴正抗議，並制定相應的計劃與方案，預備在中印劃界談判中解決邊境領土爭端。

在謀劃戰後對日處置方面，中國的目標是清算自晚清以來日本的一系列侵略行徑，力求最大限度地收回國家利權，因此，中國外交努力主要落實在參加開羅會議以及通過會議取得成果上。1943 年 11 月，中、美、英三國首腦蔣介石、羅斯福和邱吉爾在開羅會晤，並達成《開羅宣言》。該宣言規定：「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羣島等，歸還中華民國。」然而，在琉球問題上，蔣介石卻錯失良機。羅斯福在討論領土問題時一再提問，中國是否想要琉球羣島。蔣介石卻回答說，中國願由中美兩國在國際機構委託下共同託管琉球羣島。根據《蔣介石日記》，他判斷羅斯福提出琉球問題是一種試探，不要琉球的主要目的是「以安美國之心」。此外，羅斯福曾就戰後是否應該廢除日本天皇制徵求蔣介石意見，蔣介石表示，此將涉及日本政府組織問題，為避免在國際關係上犯遺恨千載的任何錯誤，這個問題應該留待戰後由日本國民依照自身的意思決定。



開羅會議期間蔣介石（左）、羅斯福（中）與邱吉爾（右）合影

在參與籌設戰後國際組織方面，中國最初的設想是大國應當在未來的國際組織中佔主導地位，而中國理所應當佔有一席之地。1943 年 11 月，美國提出，戰後需要建立三個機構：第一，成立一個由四國組成的警察委員會；第二，成立一個處理除軍事問題以外所有問題的執行委員會；第三，成立一個總機構，在這個機構中每個國家都可以暢所欲言，小國也能發表自己的意見。警察委員會則只由美、英、蘇、中四國組成，中國對「四警察」方案十分讚賞。1944 年 8 月，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召開，通過了關於建立普遍性國際組織的議案，並建議將這一組織正式定名為「聯合國」。議案規定了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聯合國大會、安全理

事會、祕書處等主要機構的組織和職權，以及關於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和關於國際經濟與社會合作的各種安排。在會議中，中國建議在協調國際爭端時應當適當考慮國際法原則和正義；聯合國大會應當承擔國際法編纂和發展任務；經濟和教育理事會應當擴大到教育和文化合作，這些建議均被與會各國接受。會議同時確認中國將成為未來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1945 年 4 月至 6 月，舊金山會議（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召開，來自 50 個國家的代表完成了起草《聯合國憲章》的絕大部分工作。中國派出了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內、由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 10 人組成的代表團出席會議。中國作為第一個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受害國，得到了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的榮譽。中國在聯合國成立大會上成為享有否決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由「四強」而位居聯合國「五常」。



中國代表顧維鈞（左）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



舊金山會議中，董必武（前排）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3 戰爭後期中國的外交困境

抗戰時期中國在外交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因為現實國力、時代局限、內外環境、國民黨領導人認知能力與執政水平等因素，中國外交在戰爭後期也面臨着種種困境。

抗戰後期，國軍在一些戰場上的表現令人失望。1944 年，日軍在中國戰場發起整個抗戰期間最大的一次攻勢作戰「一號作戰」（中國稱為「豫湘桂會戰」），國軍潰敗，大後方遭受慘重損失，引發國際局勢和國內政局雙重變動。在盟國整體戰略格局中，國民政府的重要性進一步下降，成為美英與蘇聯競逐之下的一枚棋子，可以說，豫湘桂會戰是國民黨統治走向衰落的轉捩點。

豫湘桂潰敗深刻地影響了中外關係，美國政府對國民政府的信心大大降低。在會戰進行之時，爆發了「史迪威事件」。1944 年 7 月 6 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要求任命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指揮包括共產黨軍隊在內的一切抗日中國軍隊。蔣介石先是對此容忍，要求羅斯福派員協調矛盾。9 月 6 日，赫爾利（Patrick Hurley）奉命來華協調蔣介石和史迪威的關係。此時，在滇西戰場作戰部隊的使用問題上，蔣史之間又發生嚴重分歧。羅斯福發出了一封由馬歇爾（George Marshall）起草的措辭強硬的電報，向蔣介石提出「讓史迪威毫無約束地指揮你方的全部軍隊」，否則，「你和我們為了挽救中國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將付諸東流」。蔣介石非常憤怒，他要求美國立即撤換史迪威。羅斯福最終妥協，將史迪威召回，任命魏德邁（Albert Wedemeyer）接任。史迪威事件的直接後果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給美國朝野留下了十分惡劣的印象，美國輿論對重慶的批評空前尖銳，美國政府對中國的信任和支持程度大大降低。因此，美國調整了其遠東戰略，相當一部分美國政界、軍界人士認為，重慶政府低能且難以合作，為了儘快戰勝日本，減少美國軍人的犧牲，必須敦促蘇聯儘快對日作戰。

同時，中蘇關係惡化，新疆問題變得複雜。1942 年國民政府的勢力進入新疆後，當地政治形勢愈加複雜，族羣矛盾愈加尖銳。在中央與地方關係、各族羣間關係、經濟政策、社會政策等方面，國民政府沒有能力處理好這些尖銳而複雜的矛盾。蘇聯從 1943 年開始，積極幫助新疆少數民族建立各種祕密團體，培養青年知識份子成為骨幹，他們聯絡當地宗教領袖，借助其在中下層民眾中的號召力進行廣泛社會動員，與暗流湧動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聯繫。蘇聯向新疆少數民族提供大量武器，為武裝暴動培訓軍事幹部，並派軍事顧問參與領導和組織新疆游擊活動。1944 年 11 月，在蘇聯的策動和直接參與下，伊寧暴動發

生，民族武裝攻陷伊寧城，並成立所謂「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伊寧暴動前後，在北疆其他地方也發生了暴動。從 1945 年 7 月起，在蘇聯援助下，民族武裝在北、中、南三線同時展開攻勢作戰。在北線，攻入塔城區，到 8 月下旬又進一步向阿山區進攻。在中線，民族武裝於 9 月初先後攻陷烏蘇、精河等國軍重要據點，抵達瑪納斯河西岸。在南線，民族武裝於 7 月越過天山，8 月至 9 月攻陷拜城、庫爾干、阿克蘇舊城等地。至 1945 年 9 月，民族武裝勢如破竹，前鋒距迪化只有百餘公里，國民政府在新疆的統治岌岌可危。此後，經談判形勢緩和，但新疆問題成為蘇聯索取中國權益至為重要的砝碼。

1945 年 2 月，美、英、蘇三巨頭羅斯福、邱吉爾和史太林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會面，召開會議討論戰後世界秩序和列強利益分配方針。雅爾達會議及會議形成的《雅爾達協定》是列強背着中國召開和達成的。中國雖號稱「四強」之一，卻完全被置之於外，蔣介石作為中國的國家領袖、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不僅事前被蒙在鼓裏，就連在協定簽署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對於協定的內容也是毫不知情。雅爾達會議的目的之一是美英雙方希望蘇聯儘早落實對日宣戰的時間，蘇聯則為此提出諸多要求，除了要得到日俄戰爭時沙俄失去的利益，還有許多內容涉及到中國的主權，如：保持外蒙古現狀；大連列為國際港，保障蘇聯在該港的特權；蘇聯恢復租借旅順港為其海軍基地；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中蘇兩國合組之公司聯合經營等。羅斯福為了儘快讓蘇聯出兵以減輕美軍的傷亡，對於史太林的要求並未加以拒絕，只是認為上述涉及外蒙古、大連商港和旅順軍港以及中東鐵路、南滿鐵路的相關協定需要徵求蔣介石的同意，而史太林則建議此事應由羅斯福向蔣介石通告，並保證獲得其同意。以往的不平等條約是由中國自己承認和簽署的，《雅爾達協定》的主要特點在於，它是在中方毫不知情的情況下，

由三個大國私下決定，因此，它更不平等。1945 年 8 月，國民政府與蘇聯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國喪失大量國家利益，在外蒙古問題上，中國被迫妥協。20 世紀 20 年代，外蒙古在蘇聯支持下宣佈獨立，但歷屆中國政府皆未承認。在中蘇條約附件，即《中蘇關於外蒙古問題的換文》中，國民政府聲明，如果外蒙古經過公民投票證實其獨立願望，則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1945 年 10 月，外蒙古舉行公投確認獨立意願，1946 年 1 月，國民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

儘管戰爭後期中國外交面臨一系列困局，不可否認，正是在抗戰中，中國國際地位提升，向恢復大國地位邁出堅實的步伐。中國衝破了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束縛，為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奠定了基礎。中國收復失地得到保證，國家統一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中國因「四強」躋身「五常」，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於世界秩序擁有了發言權。這些，都是了不起的外交成就。



雅爾達會議中的邱吉爾（前排左）、羅斯福（前排中）和史太林（前排右）

香港篇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歷史曾為國民政府提供過收回香港的短暫契機，但是，由於國家實力孱弱、國際局勢詭譎，國民政府收回香港的努力最後無果而終。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建立聯合英美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東江縱隊及港九大隊與英合作實施國際大營救，與美聯手通過情報合作制敵，加速了戰爭勝利進程。

1 中英在新約談判中關於香港問題的交涉

中華民國建立後，朝野有識之士一直試圖衝破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收回列強在華租界和租借地。新界即是租借地之一，1898 年英國通過《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租新界 99 年。新界有時又被稱為「九龍租借地」。1919 年巴黎和會期間，中國最早提出希望收回的租借地中就包含「九龍租借地」，也就是新界。此後，以收回新界為突破口，進而收回整個香港地區，是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一種策略。這種策略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進入到外交實踐階段。

1941 年 12 月，香港淪陷，為中國提供了收回失地的可能性。前文述及，美國對華政策目標之一是使中國成為名義上的大國，但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援助實際上大大低於其對歐洲戰場的援助。因此，為了從政治上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美國主動推動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然而，英國卻與美國有較大分歧，英國秉持殖民帝國舊觀念，輕視中國的國際地位，不願放棄在華特權。不過，基於協調一致的對華外交考量，英國

也同意有條件地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在華特權，尤其是在華租界和租借地，基本上都落入日本之手，香港也在日本佔領之下。因此，英美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也是順水推舟作人情。

目前所能見到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最早一份有關收回香港的計劃，在蔣介石 1941 年 12 月 20 日的日記中有所體現，他主張：「對英要求其承認西藏、九龍為中國領土之一部。」蔣介石日記中的「九龍」應當是指「九龍租借地」，即新界。據駐英大使顧維鈞回憶：「我到倫敦任職不久便接到訓令，要我研究並試探英國對香港問題的態度。」

1942 年 10 月，英國政府宣佈自動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並願商訂平等新約。不過，此時英國並沒有打算將香港歸還中國。英國外交部政務次官勞（Richard Law）在國會下議院回答質詢，針對有議員提問政府是否會把香港歸還給中國，勞非常肯定地說：「不還！我們提出的廢約只是廢除治外法權。」這是英國政府對中英新約內容是否會涉及歸還香港問題第一次公開而明確地否定答覆，這個答覆也定下了英國政府的交涉底線。

那麼，國民政府又是怎樣面對這個問題的呢？英國下議院質詢香港問題的有關消息引起了中方的極大關注，10 月 18 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處提交了一份《關於收回香港問題》的文件，這份檔案預測和判斷了英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的政策，分析了中英兩國在香港問題上的利害關係，並提出了在新約談判中交涉香港主權的策略。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處主張將香港（包括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司地方一區）和新界區別對待，在新約談判中向英國政府提出收回作為租借地的新界，而不提收回整個香港地區。

這樣，新約談判開始之前，中英雙方都為香港問題定下了基調。英國堅持不討論香港問題，認為廢除在華租界和租借地以及治外法權無涉新界。而中國試圖以收回租借地為憑據，在談判中單獨提出收回新界。

1942 年 10 月 29 日，英國駐華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向國民政府外交部提交了中英新約草案，草案雖然宣佈廢除英國在華租界和租借地以及治外法權，但並未提到香港問題。國民政府於 11 月 13 日將對案送交英方，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在草案的第五條中增加了兩項：廢止 1898 年簽署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將新界移交中國。然而，對於中方所提要求，英方拒不接受，且態度強硬。倫敦內閣會議表示，有關領土的問題在戰爭中不予考慮。英國外交部於 12 月 23 日、24 日兩次電告薛穆，新界問題不屬於新約談判範疇，中國政府如果同意，英國願意在戰後考慮租借新界的「期限」問題。

12 月 25 日上午，薛穆面見外交部部長宋子文和外交部次長吳國楨，向他們轉述了倫敦給自己的指示。吳國楨當即指出，新界問題屬於新約談判範疇，宋子文也表示，有關考慮新界「租期」的說法，中方是不能接受的。薛穆建議由國民政府事先照會英國，表示新約談判無涉新界問題，但中國保留戰後提出這個問題的權利。

12 月 25 日下午，在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長王寵惠的寓所，宋子文、吳國楨、王寵惠、王化成、顧維鈞等人商討對策。討論開始之前，宋子文將上午與薛穆的會談紀錄分發給與會者。總體來說，討論焦點集中於兩個方面，一是在英國堅持在新約中不討論新界問題的情況下，是否還要繼續提出該問題；二是若新約無涉歸還新界的內容，蔣介石是否會批准條約。吳國楨和王寵惠都認為，蔣介石不會在新界問題上讓步，傾向於秉持強硬立場，堅持解決新界問題。而顧維鈞則表示，依他的經

驗，英國同樣不會在這一點上讓步，並強調如果條約談判失敗，會給中國帶來負面影響。顧維鈞建議先由英國發表聲明承諾兩點：一是有將新界歸還中國的意願，二是隨時準備進行有關於此的談判。與會者最終同意了顧維鈞的看法，決定由王寵惠起草方案，報送蔣介石。

12 月 27 日晚，宋子文、吳國楨、王寵惠和顧維鈞與蔣介石共進晚餐，商議具體對策。顧維鈞向蔣介石強調，他認為英國打算真心誠意歸還香港，但他們正在打仗，處於生死存亡關頭。英國建議締結新約是「送上門來的禮」。然而「該送來的禮物應當一次送來；可是英國願意分兩次送」。因此，中國應當「先收下這第一份禮為宜，可以在收禮的同時暗示一下我們在等待着第二份禮的到來」。最終，蔣介石對宋子文、顧維鈞等表示，如果堅持收回新界會導致談判失敗，他就不再堅持了。不過，中方要求英方在談判前發表一個聲明，表明有打算歸還新界的意



1943 年 1 月，中國政府代表宋子文和英國政府代表在重慶簽訂中英新約

願。對此，英方予以拒絕。12 月 31 日，蔣介石最終同意簽署中英新約，並同意中方以照會的形式提出保留日後與英方談判新界問題的權利。

中英兩國於 1943 年 1 月 11 日在重慶正式簽署《中英平等新約》，該條約未包含香港問題。蔣介石之所以同意讓步，一是顧維鈞説服了他，蔣介石或許認為戰後中國有收回香港的希望。二是當時日本表示要將原英美租界「交還」給汪精衛偽政府，蔣介石擔心此舉將提升汪偽政府聲望，所以急於與英美簽訂新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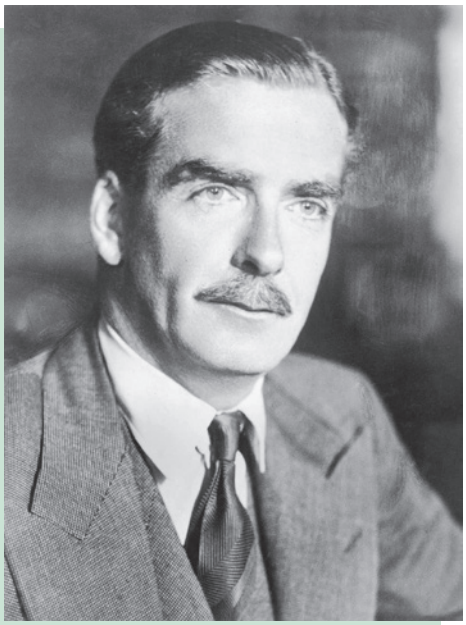
2 新約談判後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博弈

雖在新約談判中讓步，但國民政府並未就此放棄收回香港。作出妥協之時，蔣介石已經在考慮解決問題的新出路，他在日記中寫道：「晨五時醒後，考慮與英國訂新約事……一俟戰後用軍事力量由日軍手中取回，則彼雖狡獪，亦必無可如何。此乃為最之手段。如彼無所要求，則我待簽字以後，另用書面，對彼説明交還九龍問題，暫作保留。以待將來繼續談判，為日後交涉之根據。」從中可以解讀出至少兩層含意：第一，新約簽署並不代表香港問題塵埃落定，中方應當在簽約之後表明日後將重新提出香港問題；第二，香港畢竟尚處敵手，且在中國戰區之內，若用軍事手段從日本手中取得，英國也無可奈何。這是蔣介石對香港問題設想的「兩手」，即一手外交，一手軍事。

新約簽訂後兩個月不到，一個收回香港的具體設想開始醞釀。1943 年 3 月，在美國訪問的宋美齡告知蔣介石，羅斯福認為香港主權應屬中國，但可劃定為「自由港」。此後，羅斯福會見宋子文，再次提出「自由港」建議。3 月 19 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專就此事召開臨時會

議，決議「英如交還香港後，我國可自動宣佈香港及舊九龍割讓地為關稅自由港」。宋子文轉告羅斯福，表示中國政府接受「自由港」建議。然而，「自由港」方案實在是有些一廂情願，英國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Eden）赴美與羅斯福會晤，表示他拒絕接受這個建議，方案就此擱淺。

儘管「自由港」方案一提出即遇挫折，但國民政府並未就此止步，而是進一步規劃收回香港，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當屬外交部歐洲司官員張紀培提交的《香港九龍問題》報告。在報告中，張紀培提出了收回香港的甲、乙兩項辦法，前者主張一併收回整個香港地區，後者則提出可先收回「九龍租借地」，同時加強海關緝私並敦促英方改善香港華僑待遇。兩個途徑均是與英國直接磋商，訂立專約，至於談判的時機、提出的方式等均未涉及。外交部這份報告的政治意義遠大於實際價值，缺乏基本技術層面的操作規劃。



時任英國外交大臣艾登。艾登於 1955 年至 1957 年擔任英國首相

1943 年開羅會議期間，蔣介石與羅斯福會談，蔣介石提出，戰爭結束後，英國不能帶着治外法權回到香港、廣州、上海。羅斯福對此積極回應，認為美國應當鼓勵中國實現統一、民主、強大。羅斯福對史迪威說，戰後英帝國的特權應該在香港取消，中國宣佈香港為「自由港」，各國享有平等的貿易權利。但當羅斯福提出這一建議之後，蔣介石卻謹慎地表示應該也讓邱吉爾參加會談。羅斯福在會外與邱吉爾談到美國對香港的方案，邱吉爾斷然拒絕。

那麼，外交一手如此，軍事一手又如何呢？蔣介石的想法可能具有兩重含意，其一是單純從戰爭角度出發，完成消滅日軍、收復香港的軍事目標；其二是造成中國軍隊佔領香港的既成事實，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勢必難以重佔香港。目前公佈的資料僅能證明中國戰區為實現殲滅華南日軍，攻佔廣州、香港的軍事目標，曾制定相關作戰計劃。

1945 年 2 月，駐華美軍作戰司令部負責人柏德諾（Haydon Boatner）向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簡稱「陸總」）提交了一份從速攻佔廣州、香港地區的作戰計劃，其要點是：盟軍從海上登陸雷州半島，利用湛江港作為補給基地，以主力部隊向東進攻廣州與香港，但陸總認為此方案過於冒險。因此，陸總於 7 月 14 日制訂了《攻略桂林、雷州半島、衡陽、廣州、香港作戰指導案》，該方案分三個階段完成，攻佔廣州、香港的開始時間定為 1945 年 12 月 1 日，該方案特別強調，國民政府希望美軍在攻佔香港的軍事行動中能夠支援配合。然而，這個軍事計劃只完成了第一階段攻佔桂林部分，因為日本宣佈投降，攻佔廣州和香港的作戰方案終止實施。

英國重佔香港的準備則詳盡、具體和務實許多。中英新約簽訂後，英國政府在多個場合聲明不會在戰後放棄香港的立場。1945 年 4 月，

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途經倫敦時，奉羅斯福之命與邱吉爾討論香港問題。邱吉爾對赫爾利說：「除非跨過我的屍體，否則別想把香港從大英帝國的版圖上抹掉。」

但是，日軍佔領香港的現實和中國收回香港的訴求仍然使得香港的未來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英國殖民地部於 1943 年成立「香港計劃組」負責籌劃重佔香港。起初這個小組只有 9 名成員，但他們均是曾在香港任職的資深英國官員。成立的第一年，香港計劃組還隸屬於「馬來亞計劃組」（The Malayan Planning Unit），但很快便獨立建制。到 1944 年 9 月，港英政府前官員麥道高（David Macdougall）出任香港計劃組組長，組員也增加到 28 人。香港計劃組的核心是「民政事務組」（The Civil Affairs Unit），這是一個祕密組織，其實就是重佔香港後的港英政府核心團隊。

然而，怎樣將香港計劃組派遣到香港並重建行政機構是關鍵問題。在當時，英國並沒有預見到日本會很快投降。所以，一切重返香港的計劃都基於一個前提 —— 中國軍隊有可能在美軍的協助下攻佔香港。英國難題在於，如何在不引起中方注意的情況下，將英方相關人員部署至香港，並成功實現恢復英國統治的目標。1945 年 4 月，駐華美軍公共關係部門負責人歐姆施特德（George Olmsted）建議英國為他的部門配備一名英國軍官，以便處理重佔中國港口城市時面臨的經濟接收問題。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建議藉此機會派遣一個英軍聯絡組跟隨美軍進入香港。但是，只是派一個聯絡組又能起多大作用？英國政府各部門對此意見不一。

1945 年 8 月初，日本有可能在短期內投降的跡象開始顯露。英國設想了三種可能性：第一，英國或美國太平洋艦隊從海上登陸佔領香港；第二，中國軍隊在美軍協助下由陸路佔領香港；第三，「不受蔣介

石領導的中國非正規部隊」佔領香港。對於前兩種可能性，殖民地部準備派出香港計劃組「在恰當的時間」隨同軍隊進入香港。殖民地部最為擔心的是第三種可能，即中國的非正規部隊佔領香港，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可能是日本突然宣佈投降，而蔣介石的軍隊來不及到達香港。對於這種情況，殖民地部建議，一旦出現日本即將全面崩潰的情況，軍方應當立刻派出艦隊駛往香港。香港計劃組將隨同艦隊出發，或在艦隊出發之後直接前往香港。殖民地部力主直接派艦隊前往香港，其指出，香港在日本突然投降的情況下，有可能發生大規模騷亂。英國不僅會失去威信，也會在重新恢復統治上遭遇極大困難。因此，一旦獲悉日本即將投降，應當立即派遣 2 至 3 支快速艦隊駛往香港。與此同時，中國戰區擬訂攻佔廣州、香港的軍事方案被英方獲悉。所以，英國軍方也力主儘快派遣艦隊。在日本準備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資訊被證實之前，英國殖民地部和軍方已為重返香港定下了基調，即無論香港由中國軍隊佔領還是出現其他任何情況，英國都應當派遣軍隊從海上登陸香港，出兵香港的建議實質上已經形成了。

3 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在香港的實踐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並非全國性執政黨，當時中國外交的主體是國民政府。中共自成立之後逐漸形成獨立自主的對外方針，在抗戰時期提出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主張。1935 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共產國際指示各國共產黨要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建成統一戰線反對法西斯。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並結合本國實際，中共提出「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此後 6 年間，國內外局勢激烈震盪，在國際統一戰線問題上，就是否聯合英美，中共幾經曲折反覆。至 1941 年

6 月，蘇德戰爭爆發，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條陣線由模糊變得明朗，中共聯合英美的方針基本確定。中共中央號召：「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

香港很早就成為中共貫徹國際統一戰線方針的地點。全面抗戰爆發後，國際統一戰線工作重點是聯合西方進步人士，將香港打造為海外抗戰宣傳陣地和援助物資接收中心，負責具體實施的是 1938 年成立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和保衛中國同盟。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英國就協防香港尋求與中共建立軍事合作關係，但由於英方要求過於嚴苛，雙方合作未果。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共中央書記處當即指示，應當與英美建立「廣泛的真誠的」反日反德的統一戰線。具體方式是在廣東、海南、越南及南洋各地，與英美合作組織游擊戰爭。12 月 9 日中共中央指出，中國必須實現的任務是「與英、美及其他抗日諸友邦締結軍事同盟，實行配合作戰，同時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

1942 年 2 月，中國共產黨成立港九大隊、開闢港九游擊區，使國際統一戰線的構想落地。香港能夠作為國際統一戰線的落地之處，關鍵在於它是中國大陸和太平洋兩大戰場連接點，華南與太平洋戰場西部緊密相連，盟軍在此活動頻繁。在此背景下，中共確立了在香港與英美合作的方針。

與英軍合作營救外方人士是國際統一戰線人道主義貢獻的集中呈現。香港淪陷，守軍投降，至 1942 年 2 月，共有 10,947 名官兵成為戰俘，包括 5,072 名英國人、1,689 名加拿大人、3,829 名印度人和 357 名其他國籍人士。戰俘營生存環境極其惡劣，1942 年營中死亡官兵人數幾乎與在香港戰役中陣亡的一樣多。但淪陷初期，戰俘營管理混亂，有戰俘乘機逃出。不過，若得不到幫助，出逃的戰俘也很難到達安

全地帶。港九大隊與英軍建立合作源於香港大學教授、香港義勇防衛軍中校賴廉士（Lindsay Ride）等人被港九大隊前身的武工隊營救，賴廉士意識到，沒有港九大隊的幫助和允許，英軍無法進出香港。

賴廉士經批准後成立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 BAAG），於 1942 年 8 月派遣小分隊進入新界找到港九大隊，雙方建立聯絡機制，開展了約一年的正式合作，取得以下幾方面成果：第一，軍事偵察，雙方對各戰俘營、啟德機場、廣九鐵路、公路與港口等重要目標進行詳細觀察和拍攝。第二，建立情報交通站，雙方於深圳沙魚涌、西貢和九龍設立代號為「X」、「Y」和「Z」的三個交通站，以便在惠州和香港兩地傳遞情報，開展情報合作。第三，雙方共同營救盟軍戰俘和盟國平民，在正式合作的一年內，有 40 餘名盟國人士成功獲救。此外，英方為港九大隊提供醫療援助，曾贈送奎寧等三種西藥共 4,000 粒，



英軍服務團團長賴廉士，圖為 1962 年他獲頒爵士勳銜時所攝

並派遣軍醫培訓游擊隊醫護人員，1943 年 3 月港九大隊政訓室遇襲後，也曾將傷患送往英軍服務團惠州醫院治療。

雙方合作亦有矛盾。英方不顧實際，策劃大規模戰俘營救計劃，計劃在夜間向亞皆老街和深水埗兩個戰俘營空投物資裝備並空降，同時轟炸港九多處軍事目標，乘機營救。然而，駐華英軍並無軍力去實施計劃，空降空襲依靠美軍，接應護送有賴港九大隊，後續撤離還需國共雙方配合。該計劃實施將給港九大隊造成巨大傷亡，最終被擱置。此外，英方對港九大隊提供經費物資的承諾口惠不實。1943 年 8 月，在國民黨當局壓力下，英軍服務團終止與港九大隊合作。不過，港九大隊依舊本着人道主義精神繼續營救盟軍戰俘和盟國平民，為英軍過境人員給予便利。據不完全統計，東江縱隊共營救盟國人士 89 人，其中大部分是港九大隊營救的。賴廉士向東江縱隊表示：「如果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們是不會做出甚麼工作來的。」他告訴英國軍方，中共游擊隊「從不求回報，也不接受任何超出服務費用的報酬」。

與英軍正式合作終止後，游擊隊在美軍要求下開展情報合作。香港之所以成為雙方並肩作戰之處，原因在於港九游擊區同時也是美軍航空兵的作戰區域。為獲得準確的目標情報和營救被擊落的飛行員，美軍需要得到游擊隊協助。1944 年春，美軍第 14 航空隊中尉克爾（Donald Kerr）在香港上空執行任務時被擊落，得到港九大隊營救。第 14 航空隊一架轟炸機在大亞灣襲擊日軍運輸艦時被擊落，飛行員拉韋爾（George Laverell）等 5 名官兵被漁民救起後送至東江縱隊司令部，並被游擊隊護送回後方。1944 年夏，美國戰略情報局在印度招募到熟悉粵港情況、戰前在華南傳教的歐戴義（Merrill Ady）博士，指示其藉克爾等獲救的契機前往香港，與中共游擊隊聯繫。歐戴義同年 10 月抵達東江根據地，雙方建立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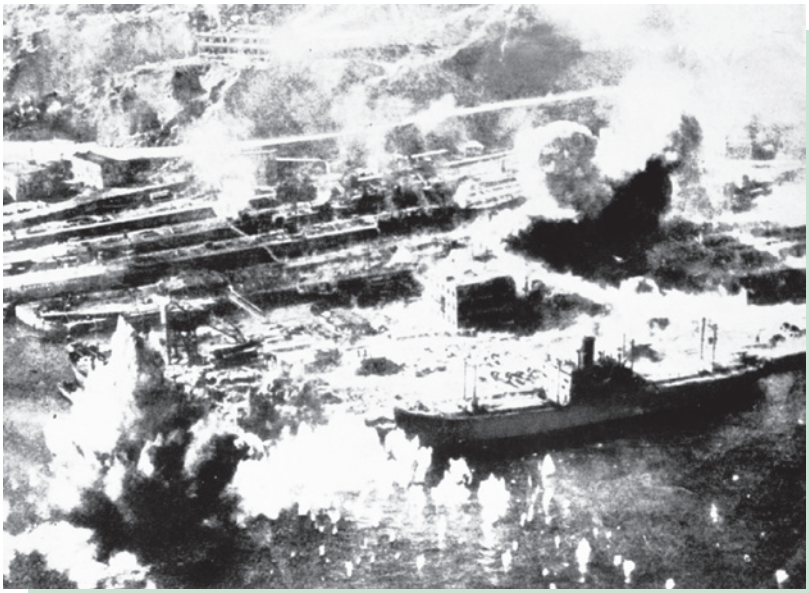


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左二）在土洋村東江縱隊司令部送別克爾中尉（左一）

東江縱隊與美軍的合作以情報工作為軸心，游擊隊通過情報搜集協助盟軍達成戰略和戰術目標。首先，廣泛搜集情報，為戰略層面研判提供關鍵資訊。在約 11 個月時間裏，東江縱隊提供的重要情報主要有三大類：一是軍事設施情報；二是日軍部隊移動情報；三是香港日本佔領當局情報。此外，游擊隊還提供了上百張日軍飛機零件圖紙。歐戴義認為，東江縱隊提供的最重要情報是對日本在戰爭結束之際意圖的評估。美國戰略情報局局長多諾萬（William Donovan）對雙方合作予以極高評價。其次，提供作戰目標情報，實現合作制敵。雙方並肩作戰的代表成果是 1945 年 1 月 15 日美軍空襲香港的行動。港九大隊事前提供轟炸目標資訊，事後回饋轟炸效果，這些情報幫助美軍向維港中的日軍船

隻、九龍和昂船洲的沿岸設施和燃油精煉廠投下炸彈。空襲中，港九大隊救援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並護送至後方。最後，配合美軍登陸。1945 年 3 月，東江縱隊協助美國海軍測量大亞灣至汕頭海岸，發現了日軍在汕頭及東山島的防禦設施並繪製簡圖，證明日軍已在華南沿海構築了與塞班島同樣的洞穴工事。然而，美軍最終還是放棄了登陸計劃。

戰爭末期，美國逐漸從「扶蔣用共」轉向「援蔣壓共」，給雙方合作蒙上陰影。游擊隊與美軍的合作亦遭到國民黨當局阻撓破壞。歐戴義的報務員是國民黨特務，在大鵬灣附近，歐戴義一行甚至遭到國民黨軍隊襲擊，游擊隊犧牲多人。歐戴義評價中共：「我非常尊重這些人，對他們充滿了感情。他們做了偉大的事情，他們重新贏得了民族的尊嚴……幾代人以來，第一次沒人再欺辱他們的國家。」東江縱隊情報工作負責人袁庚也稱這段經歷是雙方結下的「不解之緣」。



1945 年，盟軍戰機空襲太古船塢

第五章

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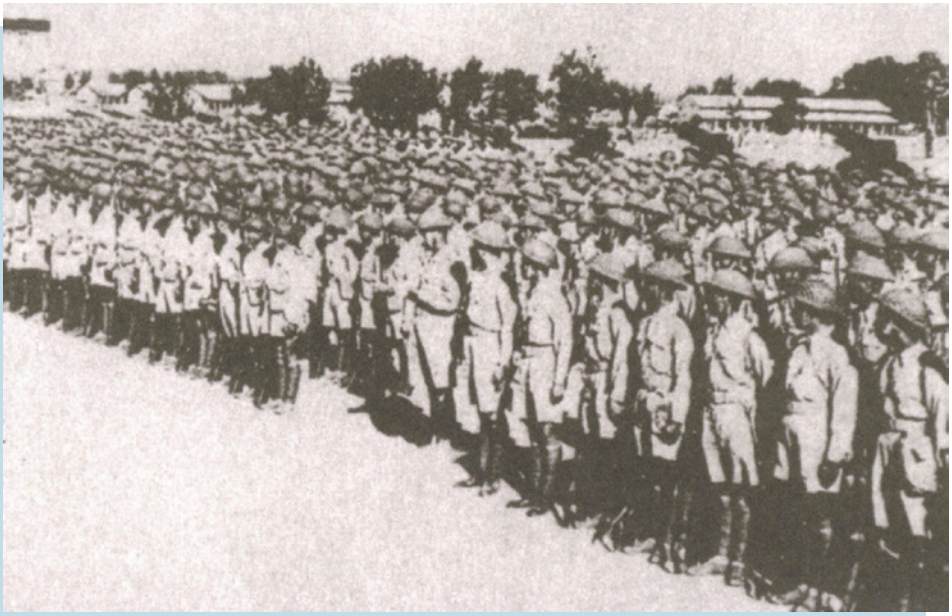
國家篇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 1943 年後，蘇德戰場、北非戰場和太平洋戰場都發生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戰役，反法西斯同盟國陣營佔據戰略主動權。1943 年秋至 1944 年，隨着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國戰場迎來戰略反攻的契機。從 1944 年開始，部分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陸續展開反攻作戰。1945 年 8 月，經過 14 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中國軍民終於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由此開啟了浴火重生的歷史新征程。

1 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戰略反攻

正面戰場的戰略反攻從滇緬戰場開始。1942 年中國遠征軍援緬作戰失利後，部分遠征軍在印度東北部的蘭姆伽（今譯拉姆格爾）整訓，組建中國駐印軍。1943 年 10 月，中國駐印軍新一軍在盟軍配合下，進行胡康河谷作戰，拉開緬北反攻的序幕。1944 年 3 月，中國駐印軍攻克緬北門戶孟關，日軍殘部向孟拱河谷撤退，胡康河谷完全肅清。6 月，中美聯軍進行孟拱河谷作戰並攻佔孟拱。8 月初，中國駐印軍與日軍血戰，收復密支那。10 月，駐印軍開始第二期作戰，先後收復八莫、南坎等地。

為策應中國駐印軍在緬北的反攻，駐雲南的中國遠征軍於 1944 年 5 月發起滇西反攻。5 月 11 日，中國遠征軍從七處強渡怒江，與日軍血戰後挺進橋頭、馬面關、瓦甸、江苴一線附近。5 月 22 日，遠征軍全部渡江，霍揆彰率右路集團軍向騰衝進攻，宋希濂率左路集團軍向龍



在印度蘭姆伽受訓的中國駐印軍

陵、芒市進攻。在右路，日軍依託堅固工事，死守來鳳山和騰衝城。7 月 26 日，遠征軍在空軍掩護下，以優勢兵力猛攻來鳳山四個堡壘羣，血戰至傍晚，最終攻佔來鳳山。此後，日軍龜縮騰衝城內殊死頑抗，中國軍隊傷亡甚大。8 月 21 日，遠征軍突入城區，與日軍展開激烈的巷戰與肉搏，9 月 14 日肅清騰衝全部敵軍。在左路，第 71 軍以龍陵為攻佔目標，第 2 軍以芒市為攻佔目標。第 71 軍新 28 師在松山遭遇激烈抵抗。日軍憑藉松山由堡壘羣、地道網構成的堅固陣地拚死固守，新 28 師 5 次攻擊均告失敗。7 月 1 日起，改由第 8 軍攻擊。該軍三個師輪番攻擊，仍不能取得進展。此後，第 8 軍工兵營進行地道掘進作業，用炸藥轟開日軍主工事。9 月 8 日，松山收復。第 71 軍主力於 6 月 10 日攻入龍陵市區，日軍從芒市反撲，龍陵幾度易手。在援軍配合下，遠征軍在 10 月 29 日向龍陵發起第 3 次攻擊，激戰五晝夜，於 11 月 3 日收復龍



中國遠征軍攻入騰衝，與敵巷戰

陵。11 月 20 日，第 2 軍在第 71 軍和第 6 軍支援下收復芒市。1945 年 1 月，中國駐印軍與中國遠征軍在芒友勝利會師，滇緬戰場取得決定性勝利。5 月，緬甸全境光復。

在中國內地的正面戰場，豫湘桂會戰之後，日軍戰線過長，已無力發動大規模進攻，在戰略全域上已經處於劣勢。然而，為摧毀中美空軍基地，破壞中國反攻，強弩之末的日軍於 1945 年 4 月發起芷江作戰（中方稱湘西會戰）。會戰中，日軍在攻勢階段即遭到中國軍隊圍攻，未能達到攻佔芷江的目標，傷亡 26,000 餘人。5 月，日軍從廣西逐步撤出，中國軍隊跟蹤追擊，於 6 月 30 日收復戰略要地柳州，7 月 28 日收復桂林。此外，中國軍隊還在閩東、浙南、贛南等地對日軍展開追擊，福州、樂清、吉安等地先後光復。



準備奔赴湘西會戰前線作戰的中國軍隊

在敵後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粉碎敵人的「掃蕩」、「清鄉」，為反攻積蓄力量。日軍發起「一號作戰」後，在華北、華中兵力收縮，各根據地軍民乘勢展開局部反攻。1944 年，八路軍山東軍區連續發動春、夏、秋、冬攻勢作戰，殲滅日軍 4,800 餘人，偽軍 54,000 餘人，反正偽軍約 11,000 人，攻克縣城 9 座，收復失地 4 萬餘

平方公里。八路軍晉冀魯豫部隊從 1944 年春季開始，連續對敵發動攻勢作戰。9 月起，日軍調回參加「一號作戰」的部分兵力展開「掃蕩」，晉冀魯豫部隊進行 10 餘次反「掃蕩」作戰，並實施奪取日軍後方城鎮與交通線的秋冬季攻勢。八路軍晉綏軍區對根據地內主要公路沿線的敵人展開進攻，拔除 3 條公路沿線的敵據點，將敵人壓迫至同蒲鐵路和太汾公路附近。1944 年全年，晉綏軍區共收復村莊 3,100 多個；晉察冀邊軍區攻克碉堡約 1,700 個，收復村莊近萬個；晉冀魯豫軍區收復縣城 11 座，收復失地 6 萬多平方公里。

新四軍蘇中軍區在 1944 年春季攻勢中發動車橋戰役並收復車橋，從而控制了淮安、寶應以東地區，打通了蘇中、蘇北、淮南、淮北四塊



1944 年，晉察冀軍區部隊越過長城，擴大抗日根據地

根據地之間的聯繫，改變了蘇中抗戰的局面。蘇北軍區在 1944 年的春季攻勢中，成功使淮海、鹽阜兩分區完全連成一片。淮北軍區從 3 月 16 日起，經過 50 餘天的持續戰鬥，在運河至津浦鐵路的範圍內攻克據點 51 處，收復泗縣、睢寧、靈璧、宿遷間的大片地區。在 1944 年攻勢作戰中，新四軍共殲滅日軍和偽軍 5 萬餘人，收復失地約 7,400 平方公里。

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主動出擊，連續向廣九鐵路沿線展開攻勢。1943 年 12 月至 1944 年 12 月，東江縱隊共作戰 300 餘次，擊斃日軍和偽軍 2,700 餘人。縱隊自身發展到 7,000 餘人，民兵、自衛隊達 12,000 餘人。



新四軍攻克阜寧後，舉行祝捷大會

1945 年，中共中央根據形勢的變化，提出敵後戰場的基本戰略方針：「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把一切守備薄弱、在我現存條件下能夠克服的淪陷區，全部化為解放區」。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軍、新四軍展開全面戰略大反攻。

1945 年 5 月，晉冀軍區發動雁北攻勢作戰，在 50 餘天內殲滅日軍和偽軍 1,100 餘人，擴大解放區 5,000 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約 40 萬。1945 年 4 月起，山東軍區發動了以膠濟鐵路東段為重點的大規模夏季攻勢。膠濟鐵路以南的魯中軍區討伐偽軍厲文禮部、濱海軍區討伐偽軍張步雲部，膠濟鐵路以北的膠東、渤海兩軍區發動進攻，以策應魯中、濱海軍區。在夏季攻勢中，山東軍區共計收復縣城 9 座。1945 年初，晉冀魯豫軍區連續發動道清戰役和豫北戰役，開闢了約 3,800 平方公里的豫北根據地，建立了 7 個抗日民主縣級政權，將黃河以北的太行、太岳根據地與黃河以南的豫西根據地連成一片。在 1945 年夏季攻勢中，八路軍共計收復縣城 33 座。

在華中，新四軍乘敵軍向沿海、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收縮之機發動反攻，攻克阜寧、睢寧縣城及重要據點百餘處。此外，新四軍主力一部揮師南下，渡江後與第 16 旅會合。1945 年 1 月，蘇浙軍區成立，開闢了蘇浙皖邊敵後新區。新四軍在春夏季攻勢作戰中，擴大根據地 8 萬餘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約 240 萬。

1945 年 8 月 9 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指出「為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實行廣泛的進攻」。從 8 月 9 日至 9 月 2 日，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向華北、華中、華南地區日軍發動大規模進攻，共殲滅日軍 13,700 人、偽軍 385,000 人，收復縣級以上城市 250 座，取得重大勝利。

2 日本投降與各戰區受降

1945 年 5 月，德國戰敗，日本完全陷入孤立。6 月，美軍攻佔沖繩，頻繁空襲日本本土，日本法西斯已窮途末路。7 月 26 日，美、英、中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政府無動於衷。8 月 6 日，美軍 B-29 轟炸機在日本廣島上空投下代號「小男孩」的原子彈。8 月 8 日，蘇聯正式對日宣戰，隨後突入中國東北。8 月 9 日，美國在日本長崎投下代號「胖子」的第二枚原子彈。日本朝野震動。

8 月 9 日，日本天皇召開御前會議，決定以保留天皇制為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8 月 10 日，日本通過瑞士、瑞典兩國政府，向中、



裕仁天皇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

美、英、蘇四大國轉達上述意向。同盟國答覆：天皇及日本政府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命令，確保投降；日本政府的形式根據《波茨坦公告》，可由日本人民的意志決定；盟軍常駐日本，直至《波茨坦公告》所規定之目的達到為止。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讀的《終戰詔書》向日本全國廣播，日本宣佈投降。

8 月 15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向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Douglas MacArthur）下達了關於接受日軍投降的《第一號命令》。命令中稱：「在中國境內（東北地區除外）和台灣、北緯 16 度以北的法屬印度支那的日本陸、海、空軍部隊，向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委員長投降。」蔣介石電示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要求其所屬日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派代表接受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命令。8 月 21 日，岡村寧次派遣今井武夫一行 8 人，飛抵湖南芷江與中方商洽投降事宜。當日午後，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接見今井武夫，面交何應欽致岡村寧次的《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備忘錄》。8 月 27 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冷欣率部由芷江飛抵南京，設立南京前進指揮所，安排南京受降事宜。

9 月 2 日上午 9 時，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軍「密蘇里號」（*USS Missouri*）戰列艦上，舉行了日本向盟軍投降儀式。中國、美國、英國、蘇聯、澳洲、加拿大、法國、荷蘭、紐西蘭等國代表參加。日本外相重光葵、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日軍大本營和日本政府，向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遞交降書，徐永昌上將代表中國簽字。

9 月 9 日上午 9 時，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大禮堂舉行。何應欽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受降。岡村寧次卸下指揮刀，在降書上簽字，日本中國派遣軍參謀總長小林淺三郎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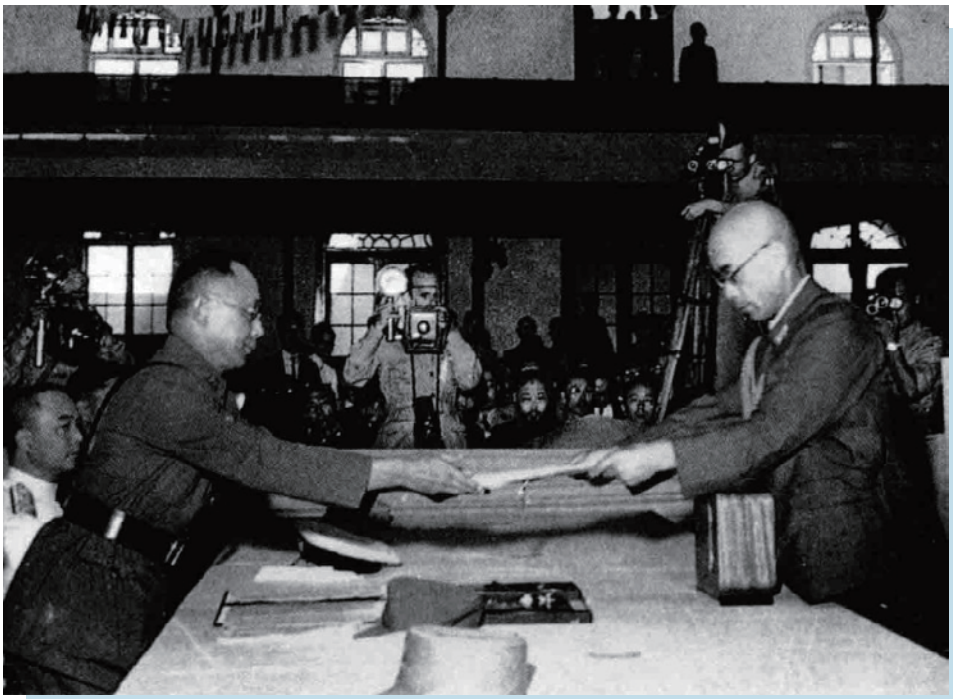
東京灣受降，盟軍最高司令麥克亞瑟在日軍投降簽字儀式上講話。左一為中國代表徐永昌

投降書呈遞給何應欽。中國陸軍參謀長蕭毅肅、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空軍第 1 路司令張廷孟、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盟軍代表等參加受降儀式。

按照盟國對受降區域的劃分，印度支那半島北緯 16 度線以北地區的日軍也應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投降，第 1 方面軍總司令盧漢率部前往越南受降。9 月 28 日，盧漢在河內主持了受降儀式。

中國戰區分地區接受日軍投降情況如下。

8 月 18 日，蔣介石命令第 2 方面軍總司令張發奎接受廣州、雷



何應欽（左）接受小林淺三郎（右）遞交的降書

州、海南等地日軍投降。9 月 16 日，張發奎在廣州接受日軍第 23 軍司令官田中久一投降。韶關、潮汕地區日軍，也由田中久一代表，向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投降。

8 月 18 日，蔣介石命令第 3 方面軍總司令湯恩伯接受上海、南京地區日軍投降。9 月 11 日，湯恩伯主持上海、南京地區受降儀式。9 月 14 日，上海日軍繳械。10 月 12 日，南京市市區及周邊日軍繳械完成。

8 月 18 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接到受降命令後，率部收復山西各淪陷區。第 7 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負責太原受降，第 8 集團軍副總司令楚溪春負責大同、雁北地區受降。

8 月下旬，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部署浙江、福建受降事宜。9 月 5 日，第 32 集團軍總司令李默庵在紹興接受日軍繳械投降。

9 月 6 日，第十戰區司令長官李品仙規定日軍第 65 師團師團長森茂樹在 9 月 6 日至 30 日期間，分別在徐海區、固鎮區、安慶區繳械投降。

9 月 14 日，魯道源代表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主持南昌、九江地區受降儀式，日軍第 11 軍司令官笠原幸雄代表日軍投降。

9 月 15 日，第 4 方面軍總司令王耀武在長沙嶽麓山舉行受降儀式，日軍第 20 軍司令官坂西一良代表日軍投降。

9 月 18 日，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在漢口主持受降儀式，日軍第 6 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代表日軍投降。

河南地區受降分別由第五戰區和第一戰區負責，9 月 20 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劉峙在鄭城主持受降儀式，日軍第 12 軍司令官鷹森孝代表日軍投降。9 月 22 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在鄭州舉行受降儀式，隨後，該戰區部隊接管鄭州、開封、新鄉等地防務，日軍分地繳械。

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負責接受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省地區日軍投降。9 月 26 日，第十二戰區開始解除日軍武裝。

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負責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等地區受降，副司令長官李延年負責濟南、青島、德州等地區受降。10 月 10 日為中華民國國慶紀念日，孫連仲在北平故宮太和殿舉行隆重的受降儀式，10 餘萬民眾參加，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代表日軍投降。



平津地區受降儀式在北平故宮太和殿舉行

抗日戰爭勝利，台灣重回祖國懷抱。1945 年 8 月 25 日，蔣介石任命陳儀擔任台灣澎湖地區受降主官，8 月 29 日，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10 月 25 日上午 9 時，台灣省受降儀式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日本前「台灣總督」兼第 10 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向陳儀遞交降書。陳儀宣告：「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受降儀式結束後，台灣民眾舉行慶祝光復大會，40 餘萬台北市民「老幼俱易新裝，家家遍懸彩燈，相逢道賀」。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了日本在台灣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洗去了甲午戰爭帶給中華民族的恥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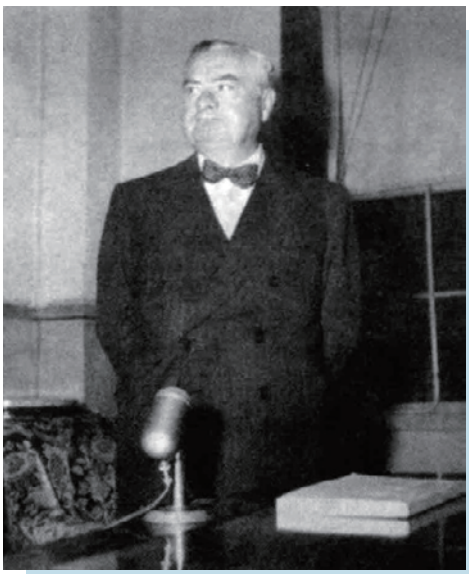


參加中國戰區台灣受降典禮的中方代表合影

3 軍事法庭審判

戰爭結束後，同盟國對犯下累累罪行的戰犯進行軍事審判。1945 年 7 月 26 日，中、英、美三國在《波茨坦公告》中明確提出：「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在內，將處以法律裁判。」1946 年 1 月 19 日，經盟國授權，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頒佈《特別通告》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宣佈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與懲處日本首要戰爭罪犯，這場大審判被稱為「東京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中、美、英、蘇、法、荷、加、澳、紐、印度、菲律賓 11 國指派的法官組成，法庭庭長為澳洲法官韋伯（William Webb）爵士，梅汝璈法官代表中國參加東京審判。

1946 年 4 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接受盟軍最高統帥部國際檢察處對東條英機等 28 名甲級戰犯的起訴。5 月 3 日，法庭第一次開庭，開始審理東條英機等戰犯的罪行。5 月 3 日至 4 日，首席檢察官季南（Joseph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韋伯



中國法官梅汝璈

Keenan）宣讀起訴書，歷數 1928 年至 1945 年期間，被告所犯反和平罪、戰爭罪、違反人道罪等。被告 28 人中，松岡洋右、大川周明、永野修身 3 人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因而實際受審人數為 25 人。1948 年 11 月，法庭宣佈判處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 7 人死刑，荒木貞夫、梅津美治郎、大島浩、岡敬純、賀屋興宣、木戶幸一、小磯國昭、佐藤賢了、嶋田繁太郎、白鳥敏夫、鈴木貞一、南次郎、橋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騏一郎、星野直樹 16 人無期徒刑，東鄉茂德 20 年徒刑，重光葵 7 年徒刑。12 月，被判處死刑的 7 名戰犯在東京巢鴨監獄內被執行絞刑。

東京審判持續兩年多時間，共開庭 818 次，419 名證人出庭作證，受理證據 4,336 份，英文審判記錄 48,412 頁。整個審判耗資 750 萬美元。法庭從 1948 年 11 月 4 日起開始宣讀長達 1,231 頁的判決書，直到 11 月 12 日才讀完。判決書認定日本在 1928 年至 1945 年期間的內外政策，皆旨在準備和發動侵略戰爭。



1946 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甲級戰犯

東京審判並未追究日本政府有關細菌戰、化學戰罪行等責任。蘇聯軍隊俘虜日本關東軍第 731 部隊和第 100 部隊官兵後，了解到日軍進行細菌戰、化學戰和人體試驗的罪行。1949 年 12 月，蘇聯濱海軍區伯力軍事法庭開庭審判日本戰犯，對山田乙三等 12 名細菌戰罪犯判刑。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開始審判日本戰犯。1945 年 11 月 6 日，國民政府設立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12 月中旬以後，國民政府分別在南京、上海、漢口、廣州、瀋陽、北平、徐州、濟南、太原、台北 10 個城市設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及戰犯拘留所。針對「南京及其他各地之大屠殺有關之首要戰犯」，國民政府指示應「從嚴處理」。同時，國民政府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出，將製造南京大屠殺的主犯以及罪大惡極的戰犯引渡到中國審判。1946 年，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乙級戰犯谷



戰犯酒井隆（左三）被押往南京雨花台執行槍決前強顏歡笑

壽夫被押解至中國，由南京國防部軍事法庭進行審判。1947 年，屠殺 300 多人的劊子手田中軍吉以及參加「殺人比賽」的向井敏明、野田毅等，也先後被從日本引渡到中國接受審判。至 1948 年 6 月底，全部戰犯審理工作大致完成。谷壽夫、田中軍吉、向井敏明、野田毅等均被判處死刑。此外，指揮攻佔香港的原日軍第 23 軍司令官酒井隆在南京被判處死刑。酒井隆是策劃侵華戰爭的重要推手，曾製造濟南慘案，炮製《何梅協定》，並在香港、廣東縱容下屬屠殺俘虜與非戰鬥人員。1946 年 9 月 13 日下午，酒井隆在南京雨花台刑場被槍決，他是國民政府處決的第一名日本戰犯。

對投靠日本侵略者的附敵份子，國民政府同樣審判懲處。從 1945 年 11 月至 1947 年 10 月，國民政府所屬各級法院先後審理漢奸案件 25,000 餘件。汪偽政府的主要人物陳公博、褚民誼、繆斌、梁鴻志、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等被判處死刑，陳璧君、周佛海、温宗堯等被判處無期徒刑。温宗堯是廣東新寧（今台山）人，早年入讀香港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曾參與創立輔仁文社，1895 年加入興中會，支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大浪淘沙，温宗堯晚節不保，1946 年病逝於南京獄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徹底清算日軍侵華罪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在瀋陽和太原設立法庭，對在押的日本戰爭犯進行公審。鑒於 1,062 名日本戰犯在關押期間接受了人道主義教育與改造，對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新中國政府決定僅起訴部分犯有嚴重罪行的戰犯。

1956 年 6 月至 7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在瀋陽和太原兩地開庭，審判 45 名日本戰犯。6 月 9 日至 19 日，特

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對前日本陸軍第 117 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等 8 名戰犯進行公審，判處他們 13 至 20 年有期徒刑。7 月 1 日至 20 日，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對偽滿洲國國務院前總務廳長武部六藏等 28 名戰犯進行公審，判處他們 12 至 20 年有期徒刑。6 月 10 日至 19 日，特別軍事法庭在太原對日本戰犯、特務富永順太郎進行公審，判處他 20 年有期徒刑。6 月 12 日至 20 日，特別軍事法庭在太原對城野宏等 8 名戰犯進行公審，判處他們 8 至 18 年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後分三批對 1,017 名罪行較輕、悔罪較好的日本戰犯進行寬大處理，不予起訴，釋放回國。1964 年，全部日本戰犯被釋放回國。這些人回國後成立「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等和平組織，反省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戰爭的罪惡行徑。在餘生，他們為反對侵略戰爭、促進中日和平友好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6 年 6 月，太原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

香港篇

太平洋戰爭期間，香港處於日本佔領之下，中英兩國都對殲滅駐港日軍、光復香港進行了規劃和準備。日本剛剛投降，中英之間就爆發香港受降之爭，雙方圍繞誰有資格接受駐港日軍投降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外交交鋒。最終，英國在美國支持下得以重佔香港，直至 1997 年，香港回到祖國懷抱。戰爭雖然結束了，但關於這場戰爭的歷史記憶在香港社會不斷迴響。

1 香港受降之爭

日本投降之前，英國政府內部已經形成共識，無論香港出現甚麼情況，英國都應當派遣軍隊從海上登陸香港。日本投降之後，中英外交角力正式拉開帷幕。1945 年 8 月 15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向盟軍最高司令麥克亞瑟下達《第一號命令》。根據該命令，香港位於北緯 16 度以北，處於中國境內，理應由中國戰區負責受降。中國外交部次長吳國楨在記者招待會上明確表示，中國將負責香港地區受降。此時，英國已經正式決定派兵重佔香港。8 月 16 日，英國大使館照會中國外交部表示，英軍正在前往香港，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並非《第一號命令》中所說的「中國境內」（within China）。當天晚上，吳國楨來到英國大使館遞交中方覆照。中方覆照援引《第一號命令》的規定，指出英國政府的決定與之不符，香港日軍應向中國投降。同時，吳國楨也奉蔣介石之命表明，中國不打算利用受降的機會佔領香港，香港問題待日後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但是，英國擔心的正是中國軍隊以受降的名義進入香港，無論中國

意圖如何，都會給英國恢復在香港的統治製造困難。8 月 18 日，蔣介石命令第 2 方面軍司令長官張發奎接受廣州、香港和海南日軍的投降。8 月 21 日，張發奎由南寧飛抵芷江，參加受降協商會議。第 2 方面軍命令第 13 軍 89 師沿梧州、三水、廣州道推進，以主力配置於廣九鐵路沿線，以一部推進香港，實施受降。

中英兩國都派出軍隊向香港進發，形勢一度劍拔弩張。中英雙方都決定求助於美國，希望美國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二戰期間，美國一度支持中國收回香港。但羅斯福總統去世後，美國開始在香港問題上偏袒英國。8 月 18 日，英國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表示，英方不能接受中方對《第一號命令》的解讀，請求杜魯門命令麥克亞瑟確保香港日軍向英國投降。杜魯門接到電報後，與國務卿伯恩斯（James Byrnes）和軍方會商，決定支持英國。同日，杜魯門覆電艾德禮，表示美國政府不反對由英國軍隊接受香港日軍投降，有關在該地區具體軍事行動的細節應由中英雙方進行聯絡與協調，麥克亞瑟將軍將命令香港日軍向英軍投降。8 月 20 日，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將美方的這一決定告知了吳國楨。

此時，中國仍將希望寄託於美國。8 月 21 日，蔣介石發電報給杜魯門。蔣介石表示，有消息說美國政府同意英國接受香港日軍投降。在此消息未經美方證實前，他希望美國能夠堅持原則。因為，對投降辦法的更改可能會「在香港以外之其他地點發生更嚴重之後果」。但如果消息屬實，他堅持香港日軍要向中方代表投降，美英雙方代表將受邀參加受降儀式。當受降完成後，他可以授權英國軍隊登陸香港，中方沒有藉受降的機會收回香港的意圖。杜魯門回電蔣介石，證實了美國政府同意英國接受香港日軍投降的消息，並堅持中英之間應當就此協調解決，以便香港日軍向英軍投降。

在此情況下，國民政府只能讓步。8 月 23 日，蔣介石分別致電杜魯門和麥克亞瑟，表示自己將以中國戰區統帥的名義「授權一英國將官接受在香港日軍之投降」。8 月 24 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常會和國防最高委員會聯席會議上講話，表示不會派兵接收香港，以免引起盟邦誤會。在這裏，蔣介石已經做出關鍵的讓步：他同意由英國受降，但條件是需要他先給予英國軍官受降權。這是一種「委託受降」的方式，是蔣介石基於「面子」的考慮。

然而，8 月 27 日，薛穆奉英國外交部指示告訴蔣介石，英國政府不能同意「委託受降」的建議，並且已經指派海軍少將夏慤（Cecil Harcourt）作為英國政府的受降代表。英方的態度令蔣介石憤恨不已。他要求薛穆告訴英國政府：「如其不接受此委託，而擅自受降，則破壞聯合國協定之責在英國，余絕不能放棄應有之職權，且必反抗強權之行為。」同日，蔣介石決定再次求助美國。他致電杜魯門表示：「余作此讓步受權於一英國將官接受該地投降，純出於余欲與吾人盟邦保持友好關係之願望，在作此讓步時，余曾獲得閣下之同意，如余再作此超出此辦法之讓步，不獨於盟邦各協定不合，且與余為中國戰區統帥之職責不符。」

在美國調解之下，英國最終決定接受「委託受降」的方案，同意夏慤以英國政府和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雙重代表的身份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並歡迎中美兩國各派一名軍官作為簽字儀式見證人參加受降。對此結果，蔣介石表示滿意。他評論稱：「英國對余委派英軍官接受香港敵軍投降之指令，最後仍承認接受，是公義必獲勝利之又一明證。惟英國侮華之思想，乃為其傳統之政策，如我國不能自強，今後益被侮辱矣！」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派遣潘華國將軍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赴港，準備參加受降儀式。

2 英國重佔香港

在英國艦隊抵達香港前，身處集中營的英國戰俘已經收到消息，港英政府前輔政司詹遜（Franklin Gimson）準備建立臨時政府等待軍隊到來。8 月 29 日拂曉，夏慤率領英國太平洋艦隊第 111.2 特遣分隊進入香港水域。這支艦隊包括旗艦「不屈號」（*HMS Indomitable*）航空母艦、「莊嚴號」（*HMS Venerable*）輕型航母、2 艘輕型巡洋艦、5 艘驅逐艦、1 艘潛艇補給艦，連同第 8 潛艇分隊和 6 艘澳洲海軍掃雷艇。同時，海軍少將丹尼爾（Daniel）率領第 111.4 特遣分隊也駛抵香港海面。兩支艦隊合併，統一由夏慤指揮。

按照夏慤的命令，一架飛機從「不屈號」航空母艦起飛執行偵察任務，飛行員未遭遇日軍抵抗，於是從啟德機場低空掠過，向日軍投送傳



1945 年 8 月 30 日，英國皇家海軍「迅敏號」（*HMS Swiftsure*）輕巡洋艦駛抵香港

單。傳單通知日軍指揮官，可以派一名軍官乘船來面見夏慤，或由英軍派一架飛機來接他。此外，傳單還告知日軍與英國艦隊聯絡的無線電頻道。雙方很快建立起聯繫。8 月 29 日下午 4 時，日軍發來電報，請求夏慤派飛機到啟德機場去接他們的談判代表。夏慤隨即接受了請求，派出飛機。與日方代表一同前來的還有柯瑞文（Craven）中校，他在戰前負責香港港口事務，戰爭爆發後被俘，雙方商談了英軍登陸的具體事宜。8 月 30 日拂曉，艦載戰鬥機和轟炸機組成編隊從航母上起飛，在香港上空巡邏，以防日軍襲擊。上午 10 時，夏慤率艦隊向維多利亞港推進，海軍陸戰隊在布朗（Brown）中校指揮下迅速佔領海軍船塢。之後，各艦艇依次跟進，在天黑前全部駛入港口，完成了佔領行動。當夏慤率領艦隊準備登陸前，一架偵察機報告，在南丫島索罟灣有大約一百艘「自殺艇」，其中 3 艘正從西面向艦隊錨地駛去。英軍立即派出飛機擊沉 1 艘自殺艇，剩餘 2 艘，1 艘擱淺、1 艘逃回港口。之後，英軍轟炸了索罟灣，在那裏俘虜了大約 260 名日軍官兵。

英軍登陸後，詹遜登上輕型巡洋艦「迅敏號」（*HMS Swiftsure*）與夏慤會面，並帶來一份向香港民眾宣佈進行軍事管制的演講稿。雙方簡短會談後，夏慤向詹遜出示命令，表示倫敦授權自己對香港實施軍事管制，詹遜的使命已經完成。8 月 30 日下午，夏慤來到赤柱集中營。他在日記中寫道：「到達時，我發現所有人都在等我們……他們為我準備了一個歡迎儀式——升英國國旗，他們一定要等我來才升旗。我們舉行了一個非常感人的儀式，當國旗在赤柱集中營升起時，伴隨着《天佑吾王》的歌聲，最後大家三祝陛下萬歲。那面國旗由一名海軍人員製作，香港淪陷時，他把它藏在了牀板裏，就是為了現在這個時刻。」

英軍登陸香港的同一天，中國第 2 方面軍司令長官張發奎抵達昆明。他獲悉，鑒於美國政府的態度，蔣介石同意香港由英國受降。張發

奎認為：「我們不應該同意這一更改，我們不應屈服於美國的壓力。」但這已於事無補，9 月 3 日，第 2 方面軍司令部收到何應欽轉發蔣介石的電報，正式取消受降任務。

9 月 1 日下午 1 時，夏慤對香港市民發表了廣播講話，宣佈建立軍事管制政府。他授權日軍指揮官通知所有日本軍民必須在 9 月 1 日撤出香港島，香港島治安將由英軍負責，九龍和新界的秩序則暫由日軍維持。當天，香港島的日本軍民集中在皇后碼頭，渡海至九龍兵營集中。至下午 4 時，最後一批日本人撤離香港島。9 月 4 日，3,000 餘名英國皇家空軍官兵乘「澳洲皇后號」（*RMS Empress of Australia*）輪船抵



英國皇家海軍少將夏慤準備宣佈英國海軍戰隊到達香港

達香港，接管啟德機場，開始負責九龍地區防務。9 月 7 日，麥道高率 12 名高級文職官員由印度馬德拉斯飛抵香港。麥道高在赴港之前被授予准將軍銜，以便參與香港軍管。9 月 11 日下午，由陸軍少將菲士廷（Francis Festing）率領的英國陸軍部隊登陸香港。菲士廷曾任駐緬甸英軍炮兵指揮官，一度困於仁安羌，後被中國遠征軍解救。9 月 13 日，麥道高正式被任命為軍政府首席民政事務司。第二天，軍政府下令日本軍票停止使用，恢復使用港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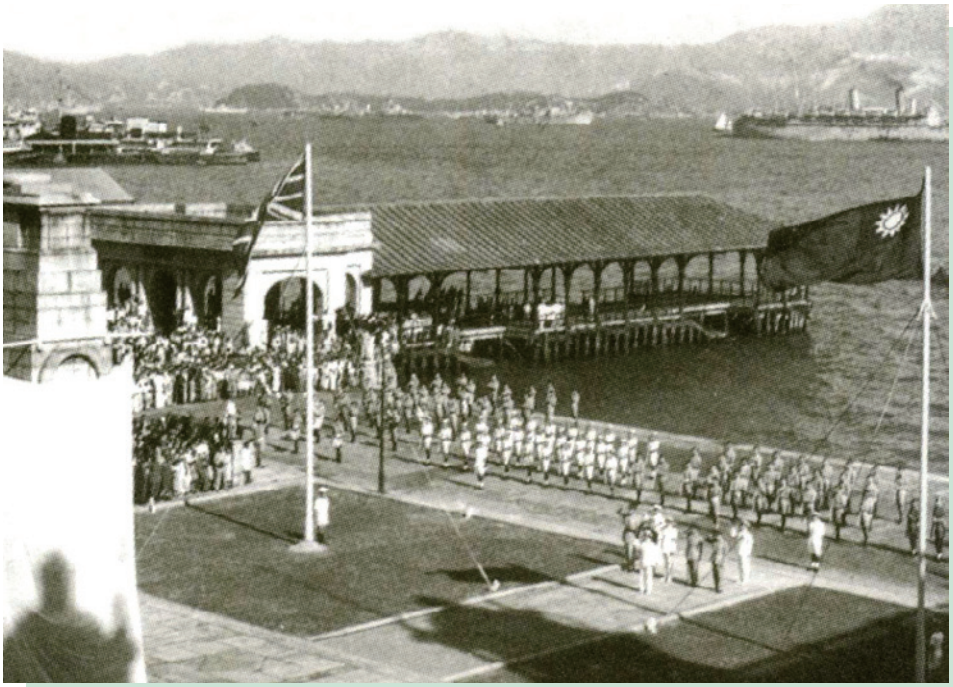
9 月 16 日下午 4 時，香港受降儀式在總督府舉行。潘華國、威廉遜（Adrian Williamson）和克里（W. B. Creery）分別代表中國、美國和加拿大作為見證人參加儀式。日本陸軍第 23 軍參謀長、駐港陸軍司令岡田梅吉少將和華南艦隊司令藤田類太郎中將在降書上簽字。簽字結束後，



在總督府舉行的香港受降儀式

藤田類太郎將軍刀解下交給夏慤，表示解除武裝。之後，夏慤代表英國政府和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簽字，接受日軍投降。日方代表退場後，夏慤發表演講，表示今後將致力於香港復興工作，並呼籲盟國緊密合作。

10 月 9 日上午 10 時，香港軍政府在中環維多利亞港畔的和平紀念碑前舉行追悼儀式。和平紀念碑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死難者而建，於 1923 年 5 月落成。10 月 9 日當天，和平紀念碑重新揭幕。出席儀式的有香港軍政府首腦夏慤、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潘華國、其他盟軍代表、平民代表等。中英兩國國旗在紀念碑草坪兩側升起，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樂隊演奏了兩國國歌。夏慤在紀念碑前獻花，英國軍艦鳴炮致意。儀式結束後舉行閱兵式。滙豐銀行總行外設置觀禮台，英國皇家海軍、海軍陸戰隊、皇家空軍、陸軍等部隊由德輔道沿租庇利街及干諾道行進受閱，皇家空軍戰鬥機飛越儀式現場上空。



在和平紀念碑前舉行的慶祝勝利紀念儀式

同日，香港民眾在灣仔修頓球場集會，慶祝抗日戰爭勝利，潘華國將軍出席。市民和團體向愛國基金捐款，學生紛紛響應。集會結束後，香港民眾舉行盛大巡遊。隊伍沿電車路向中區進發，沿途表演舞龍舞獅、踩高蹺等節目。當日，香港許多高樓大廈都懸掛盟國國旗，大批九龍居民渡海到香港島參加活動。晚上 7 時 10 分，夏慤在香港電台發表講話，表示當局會全力重建香港，讓社會各階層得到公平待遇。9 時，維多利亞港內的英軍軍艦燃放煙花，並用探照燈照亮了夜空，整場煙花匯演時長 20 分鐘。當晚，許多華人家庭點亮燈籠，香港沉浸在抗戰勝利的氛圍中。



香港市民在皇后大道舉行遊行慶祝活動

英國重佔香港後，着手逮捕和審判戰犯。1946 年 7 月，在約 1 萬名被拘留於香港的日本人當中，有 239 人被列為戰爭罪行嫌疑犯。其中在香港受審的 122 名嫌犯中，21 人被判死刑，2 人被判終身監禁，85 人被判半年至 20 年有期徒刑。

3 抗戰在香港的迴響

歷史的聲音，總是以特有的方式在現實世界中不斷迴響。戰後很長一段時間，香港華人社會的戰爭記憶偏重淪陷三年八個月的苦難生活，港英政府則將香港戰時歷史與英國二戰歷史貫通紀念。1945 年英國重佔香港後打造以「英軍保衛香港」、「英國光復香港」為歷史場景和主旨內容的戰爭記憶。從 1946 年開始，港英政府將每年 8 月 30 日定為「香港重光紀念日」，紀念英國於 1945 年的該日重佔香港，並列入公眾假期。後來，重光紀念日日期進行過調整，一般是每年 8 月最後一個星期一。1997 年之前，每逢重光紀念日，香港總督與港英政府各主要部門首長、聖公會及天主教香港主教、現役與退伍軍人均會參加紀念儀式。西方國家駐港領事、英聯邦成員國軍人代表也會到場。在儀式上，全體參加者在號角聲中默哀，之後，英軍士兵列隊向天鳴槍。當天，香港各政府部門、銀行、學校等均休假。港英政府將重光紀念日視作戰後香港發展的新起點，賦予其重要歷史意義。

在戰後撫恤方面，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在香港修建西灣國殤紀念墳場並擴建赤柱軍人墳場，安葬陣亡的英國、加拿大、印度等盟國官兵。1991 年，香港立法局通過《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條例》，列入香港法例第 386 章，旨在向太平洋戰爭中對香港防衛有貢獻或在該

戰爭中遭受苦難的人以及這些人的配偶，支付一項撫恤金及其他利益，並設立一個委員會以就關於這些撫恤金及利益的事宜提供意見。然而，港英政府的相關紀念活動、撫恤政策等並不涉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港九大隊。

儘管被有意遮蔽，香港社會並未遺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戰。抗戰期間，烏蛟騰村是港九大隊活動的重要據點，在 1942 年 9 月日軍一次「掃蕩」中，村長李世藩與多名村民拒絕供出游擊隊員身份，被折磨至死。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初建於 1951 年 10 月，由抗戰時期烏蛟騰村原兒童團團長、村民李漢等人籌劃，旅居南洋的李源勛支持，在該村比較隱蔽的一處山坡下建成，碑名為「烈士紀念碑」。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英國華人社團「烏蛟騰海外聯誼會」專門成立「烏蛟騰烈士紀念碑修葺籌備委員會」，在海外僑胞和香港同胞中發起籌款，於 1985 年 10 月完成修葺工程。20 世紀 80 年代初，抗日老戰士劉錦文、梁超、鄧振南、黃冠芳、張興、張婉華等人倡議在西貢建立抗日英烈紀念碑。1984 年 9 月，原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到訪西貢，獲悉籌建紀念碑一事，表示大力支持，為紀念碑題寫碑名。12 月，西貢各界熱心人士成立「抗日英烈紀念碑籌建委員會」，為紀念碑選址並募集資金。1989 年 1 月，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建成揭幕。

抗戰精神在一代又一代的香港青年中傳承。1970 年美日私相授受釣魚島引起發海內外華人羣情激憤，留學美國的香港學生多次組織遊行示威，參加保釣組織。1971 年 2 月，香港成立「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多次組織民眾前往日本駐香港領事館遊行示威。7 月 7 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在維園舉行保釣集會，參加者千餘人，圍觀者約三四千人。當天，發生了警員與學生之間的衝突，有學生被警

員毆打，這一場面成為一代香港學生的共同記憶。8 月 13 日，「香港保衛釣魚台聯合陣線」在維園舉行集會，出席者多達約 3,000 人。青年學生提出團結所有中國人、反對帝國主義和提高社會意識三大訴求。選擇 7 月 7 日和 8 月 13 日進行集會，充分體現了抗戰歷史對香港保釣運動的影響。1996 年 7 月，日本右翼團體在釣魚島興建燈塔，激起香港新一輪保釣熱潮。9 月 6 日，市民陳毓祥與數十名保釣人士，成立「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並租用一艘貨輪於 9 月 22 日向釣魚島出發。9 月 26 日貨輪在釣魚島海域遭多艘日本艦船攔截，陳毓祥跳下海中宣示主權，不幸溺亡。為悼念陳毓祥，香港保釣人士和支持者於同年 10 月再次前往釣魚島，成功登島並豎立國旗。

1997 年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對抗戰歷史的宣傳和教育愈加重視。1998 年 10 月 20 日，行政長官董建華將港九大隊烈士名冊安放於大會堂紀念花園的紀念龕中。特區政府宣佈港九大隊烈士家屬、傷殘軍人等依據《香港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條例》享受撫恤待遇，具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港九大隊隊員及其家屬享受公務員醫療待遇。特區政府取消重光紀念日公眾假期，新增 8 月第三個星期一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2009 年，特區政府出資重建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並遷到現址。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經表決通過，確定每年 9 月 3 日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將每年 12 月 13 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8 月 26 日，特區政府宣佈將於每年 9 月 3 日及 12 月 13 日舉行官方儀式，分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及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此後，特區政府每年都會舉辦相應的紀念儀式，一些教科書也擴充了抗戰相關內容。

然而，回歸後一段時間，由於種種複雜因素的影響，抗戰歷史在一

段時間成為本土分離勢力的攻擊對象。2019 年「修例風波」期間，發生了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被塗污破壞的嚴重事件，引發各界憤慨。隨着香港實現由亂到治、開啟由治及興新階段，如何紀念抗日戰爭、如何評價香港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如何對待本地多元化的戰爭記憶，是需要認真面對和思考的重要問題。

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是世界性的侵略戰爭，英軍和加拿大軍在香港的抵抗既是為了維護英國統治，也具有反法西斯性質，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組成部分。作為軍人，英軍和加拿大軍的抵抗和犧牲已為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銘記。作為盟友，中國從來不否認盟軍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正面貢獻。然而，説英軍 18 天的抵抗是「香港保衛戰」，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港九大隊敵後游擊戰的影響和價值有待繼續發掘，且更值得香港社會珍視。港九大隊之所以得到香港人民支持，是因為他們才是為保衛自己的國家、保衛香港而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港九大隊是香港淪陷期間唯一一支成建制、始終堅持抵抗的武裝力量。英國人承認，沒有港九大隊幫助，盟軍無法進出香港。港九大隊在地域狹窄、山小林稀、海港阻隔、敵軍林立的環境中艱難生存，於無政權、無後方的情況下力謀發展，不斷襲擾破壞敵軍及其軍事設施，使日軍長期處於緊張疲憊狀態，有效制約了香港作為日本太平洋戰爭後勤基地的正常運作。港九大隊不僅營救中外平民和盟軍戰俘、飛行員，亦為盟軍的空襲和反攻計劃提供軍事情報，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罕見的游擊戰範例，彰顯了敵後游擊戰的國際影響與國際貢獻。

香港社會戰爭記憶的多元化與豐富性值得珍視。愛國團體在烏蛟騰、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和劉春祥抗日英雄羣體紀念碑的紀念活動，

體現出對香港抗戰中流砥柱港九大隊的敬重和高度肯定。退役華籍英兵團體舉辦二戰悼念活動體現了對軍人職責與榮譽的堅守，肅穆的西灣國殤紀念墳場也是這座城市獨特的歷史印跡。在珍視多元歷史記憶的同時，我們也應當明白，國家利益仍然是當今世界的主軸，民族情感依舊是人類文明價值的重要內容。

香港回歸以後，特別是 2017 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提出「對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傳有待加強」以後，在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支持之下，香港學者和愛國團體在弘揚抗戰文化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他們出版了《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日軍在港戰爭罪行》、《港九大隊志》等有關香港抗戰的重要著作，並克服種種



劉春祥抗日英雄羣體紀念碑（劉蜀永教授提供）

困難，推動建立了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和劉春祥抗日英雄羣體紀念碑兩項大型抗戰紀念設施。

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位於新界沙頭角石涌凹，由「香港抗日一家人」羅家祖業羅家大屋改建而成。羅氏族人以每年 1 元的象徵式租金，把大屋永久借出予紀念館使用。香港廣州社團總會為紀念館籌款和房屋整修重建做了大量工作。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義務承擔撰寫展覽內容和版面設計工作。從籌辦到落成，耗時 5 年的紀念館於 2022 年 9 月啟用，成為香港首個抗戰紀念館。館內的常設展覽內容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東江縱隊與港九大隊的抗戰歷史，第二部分為「香港抗日一家人」羅家的抗日事跡。2022 年 9 月 3 日，紀念館舉行隆重揭幕典禮。特首李家超連同一眾特區政府官員及立法會議員、中聯辦何靖副主任等逾 100 位嘉賓出席，盛況空前。紀念館已成為香港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開幕不到 3 年，已有 9 萬多香港市民線下、線上前往參觀。

2023 年 5 月，在劉蜀永、劉智鵬等歷史學者推動下，經過新界鄉議局等愛國團體和人士的努力，劉春祥抗日英雄羣體紀念碑在香港屯門龍鼓灘落成。這是繼烏蛟騰和斬竹灣之後，香港第三座大型抗戰紀念碑。站在紀念碑前眺望大海，那裏便是 12 位英雄魂歸之處。香港同胞保家衛國的抗戰精神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的勇氣與自信在獅子山下這方土地奔流與匯聚的縮影，更加值得尊重和銘記，這段歷史也更具照耀前路的價值。

結語

從鴉片戰爭的屈辱到抗戰勝利的榮光，百餘年風雨兼程中，香港與祖國始終命運相繫。無論是抗戰初期成為華南抗日救亡中心和援華物資內運樞紐，還是淪陷後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在鄉村和離島燃起的戰鬥火焰，都在訴說着「國家興亡，香港與共」的鐵血誓言，香港同胞的救亡與抵抗從來都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不可分割的壯麗篇章。

中國著名戰略家蔣百里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不久去世，臨終叮囑：「可以贏，可以輸，就是不要和它談。」華僑領袖陳嘉庚提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這些話都揭示了當時中國各界的共識：只有抗戰到底，才能向死求生。中國人民忍受巨大戰爭痛苦，大學、工廠不遠千里西遷，無數的人們默默承受生離死別，戰時通貨膨脹使工薪階層的生活水準下降到戰前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超過 3,500 萬人犧牲，財產損失不可估量。香港同胞承受三年八個月的黑暗歲月，不少鄉民為掩護游擊隊備受日軍折磨甚至獻出生命，許多同胞永遠倒在被迫「歸鄉」的路上，更有 115 位港九大隊烈士為國捐軀。這些，都沒有擊垮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中國人民前仆後繼、浴血奮戰，最終贏得抗戰的勝利。

烽火硝煙中，戰時首都重慶在敵人殘酷轟炸下持續運轉，延安指揮着各抗日根據地軍民堅持抗爭，香港同胞冒着日軍炮火開闢國際運輸線，港九大隊積極救助盟國人士並與盟軍並肩作戰……這些場景共同組成了香港與國家風雨同舟的壯麗畫卷。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牽制了大量日軍，打亂了日本制霸東亞和太平洋的戰略部

署，為戰爭勝利作出不可替代的貢獻。作為中國大陸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連接點，香港敵後抗戰逐步癱瘓了香港作為日本太平洋戰爭後勤基地的功能，加速了日本崩潰。在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中，中國第一次以完整的主權國家姿態躋身反法西斯同盟四大國之列。而香港的命運轉折，恰是中國從積貧積弱走向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歷史註腳。

當國家遭遇危機，沒有任何一片土地能夠獨善其身；當民族挺起脊樑，每一寸山河都將迸發不屈的力量。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是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的抗爭史詩，也是中國與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書寫的正義史詩。這段承載着民族抗爭與人類良知的歷史，將永遠鐫刻在人類追求正義與自由的精神豐碑之上。

主要參考論著

一、專著、史料集、地方志

小林英夫、柴田善雅：《日本軍政下的香港》，田泉、李璽等譯，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6 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編：《日軍侵華罪行紀實（1931-1945）》，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 年。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江蘇地方簡史（1921-2021）》，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 年。

《中國近代史》編寫組編：《中國近代史（第二版）》下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

卞修躍：《侵華日軍反人道罪行研究》，北京：團結出版社，2015 年。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香港作戰》，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王建朗：《中國抗日戰爭史・第五卷（戰時外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

王建朗、曾景忠著，張海鵬編：《中國近代通史（第 9 卷）：抗日戰爭（1937-194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

加藤陽子：《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章霖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 年。

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李忠傑主編：《江蘇省抗日戰爭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 年。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 2 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 年。

香港地方志中心編纂：《香港志・總述・大事記》，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0 年。

孫揚：《無果而終：戰後中英香港問題交涉（1945-194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

孫揚：《國民政府對香港問題的處置（1937-1949）》，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 年。

高添強、唐卓敏編著：《香港日佔時期》，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 年。

張俊義、劉智鵬：《香港與內地關係研究》（《中華民國專題史》第 17 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

莫世祥：《日落香江：香港對日作戰紀實》（修訂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 年。

莫世祥：《中共革命在香港（1920-1949）》，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2 年。

莫世祥編：《香港抗戰親歷記》，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3 年。

陳瑞璋：《東江縱隊 ——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年。

《港九獨立大隊史》編寫組著，劉蜀永等校訂：《港九獨立大隊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2 年。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年。

黃道炫：《鐵水流：戰時中共革命系統的運作，1937-194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4 年。

楊奎松著，張海鵬編：《中國近代通史（第 8 卷）：內戰與危機（1927-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

劉智鵬、丁新豹主編：《日軍在港戰爭罪行：戰犯審判紀錄及其研究》，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 年。

劉智鵬、劉蜀永編著：《香港史 ——從遠古到九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9 年。

劉智鵬、劉蜀永主編：《港九大隊志》（增訂版），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25 年。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 年。

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研究室編：《香港學運的光輝》，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 年。

鄧野：《蔣介石的戰略佈局（1939-194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

謝永光：《香港淪陷：日軍攻港十八日戰爭紀實》，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5 年。

謝永光：《香港絕不能忘記的三年零八個月 ——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香港：明報出版社，2005 年。

鄺智文：《重光之路 ——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5 年。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 年。新版《孤獨前哨：再論一九四一年香港戰役》，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4 年。

二、論文、論文集、網路文章

吳樹燊：《香港抗戰第一家 ——沙頭角石涌凹羅氏》，劉蜀永主編：《香港史話（二）》，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20 年。

李恩涵：《日軍對晉東北、冀西、冀中的「三光作戰」考實》，《抗日戰爭研究》1993 年第 4 期。

李翔：《東江抗日根據地選址考析》，《歷史研究》2019 年第 1 期。

胡玉海：《東北義勇軍抗戰的歷史地位》，《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5 期。

孫揚：《論抗戰後期中英處置香港問題之方略（1943-1945）》，《抗日戰爭研究》2014 年第 1 期。

孫揚：《抗戰時期中共國際統一戰線在香港的實踐》，《歷史研究》2024 年第 2 期。

孫輝、林曉光：《中國軍事法庭對日本侵華部分戰犯審判概述》，《史學月刊》1984 年第 4 期。

陳敬堂等編，香港歷史博物館編製：《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香港：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4 年。

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 年。

游海華：《抗戰時期香港祕密大營救若干問題考辨》，《黨的文獻》2020 年第 4 期。

黃道炫：《中共抗戰持久的「三駕馬車」：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抗日戰爭研究》2015 年第 2 期。

黃道炫：《抗戰時期中共的生存和抵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網站，http://jds.cssn.cn/newzxdt/202101/t20210128_5301704.shtml，2025 年 6 月 30 日查閱。

趙佳佳：《抗戰時期的香港救亡團體述略》，《重慶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6 期。

劉智鵬、劉蜀永：《香港抗戰的中流砥柱 ——紀念港九大隊成立八十周年》，《紫荊》2022 年 2 月號。

劉蜀永：《從英國陸軍部檔案看日軍在港戰爭罪行》，《紫荊論壇》2023 年 9-10 月號。

鳴謝

本書所刊登的部分圖片，承蒙下列人士／機構提供，謹此致謝！

劉蜀永　教授

王　騰　研究員

香港地方志中心

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Libraries

本書部分圖片由於版權資料不詳，無法聯繫，若有疏漏之處，請合法之版權持有者與本公司聯絡。

香港與國家風雨同舟的抗戰史

孫揚　鄧奕 著

責任編輯　楊紫東　潘沛雯
特約編輯　梁韻廷
裝幀設計　黃明輝
排　　版　楊舜君
印　　務　劉漢舉

出　　版　中華教育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1 樓 B
電話：（852）2137 2338　傳真：（852）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20-248 號
荃灣工業中心 16 樓
電話：（852）2150 2100　傳真：（852）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版　　次　2025 年 8 月初版
© 202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規　　格　特 16 開（240mm×170mm）

ISBN　978-988-8914-63-0

在抗戰勝利 80 週年之際，**《香港與國家：風雨同舟的抗戰史》**應時出版。全書結構別具匠心，每一篇章都分為國家篇和香港篇兩部分，既清晰呈現香港抗戰重大事件的國家背景，更深刻彰顯香港與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連的緊密聯繫。這部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著作，立足國內外學術研究，是了解國家與香港共同抗戰歷程的入門讀物。在抗戰勝利 80 週年的重要時刻，本書不僅緬懷先烈、銘刻歷史，更啟迪吾輩居安思危、珍視和平、以史為鑒，共同擘劃未來。關心香港與國家歷史及發展的朋友，值得細讀珍藏。





ISBN 978-988-8914-63-0
9 789888 914630
定價：HK$128 NT$580
建議上架分類：中國歷史 / 抗戰史
聯合出版集團 Published in Hong Kong
中華教育